民國叢書

第五編

·79·



延安一月

趙超構著

南京新民報文藝叢書之六

延安一月

每冊實售
（外埠酌加寄費匯費）

民國三十五年一月滬初版

有著作權
翻印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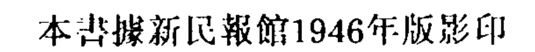
著作人：趙超構

發行人：陳銘德

出版者：南京新民報館

印刷者：辛利印刷公司
上海小沙渡路337弄50號
電話三七三五〇

總經售處：上海
福州路
東華里六號
教育書店


本書據新民報館1946年版影印

關於「延安一月」

陳銘德

收在這本書內的作品，都是本報主筆趙超構兄參加中外記者團參觀西北的通訊稿，其中「延安一月」自然是全書最主要的部分，無論在觀察分析，描寫報導各點上，都可以看出作者是用過心思的；然而比這些更使我們滿意的，是作者具體的提供了一種立言的態度。對於延安事物，雖然有時是介紹，有時是批評，但自始至終，看不到有一句話是離開國民的公正觀點的。

因爲是站在國民觀點的報導，所以凡是好的，我們都樂於介紹，凡是壞的，我們都免不了要表示惋惜。我們相信，在擁護抗戰擁護政府的大前提之下，忠實的介紹與自由的批評，是新聞記者應有的責任，而且對於國家這也是必要的。

「西京——延安間」是比較不重要的一章，但如果將這一節和「延安一月」倂起來看，就更可以看出作者之忠於他的記者責任。他不僅要讀者知道延安人的苦幹，同時也希望讀者能從「潼關巡禮」「山西新姿」的熱情描寫中，給堅守河防的將士和艱苦奮鬥的克難坡人物以適當的敬意。

本書雖不過是新聞記事性的作品，但在我們未能清楚認識延安眞面目的現在，這一些輪廓的報導，多少可以破除一些不應有的隔膜。而這一點也正是我們印行本書的主要意思。

三十三年十月

序

我常和朋友討論，近人研究史學，自比從前人高明得多，有了科學手腕的解剖，還有合乎邏輯的論斷。但有一個毛病，喜歡主觀的翻案，翻案自是可以的，然而他們往往是像畫家畫畫一樣，先打好了一個輪廓，然後順了這輪廓佈局。所以他們是先有了翻案的準備，然後去找翻案的證據。並非是有了證據再來翻案。這樣的著述，雖多是新奇的，可是嚴格的說，人生治學的精神，不應如此，這實在不誠實。

大概我和我一班說得來的朋友，寫東西或從事新聞報導都有這個態度，這次趙超構兄去延安訪問，事先曾和朋友們商量，應當取一個什麼態度？我就很簡單的貢獻一點意見，觀察最好一切客觀。至於你的觀感如何，有什麼批評，那倒主觀一點也可以。事實的存在是一件事，你對於這存在的事實作何感想，又是一件事，最好不必混爲一談。趙兄對我這點意見，相當的採納。其實他向來在報上作評論的態度，也是如此，毋需說我是附合他的意見。

自後，趙兄在報上發表的文字，大概就本這個意見立言的。我很欣羡我們的意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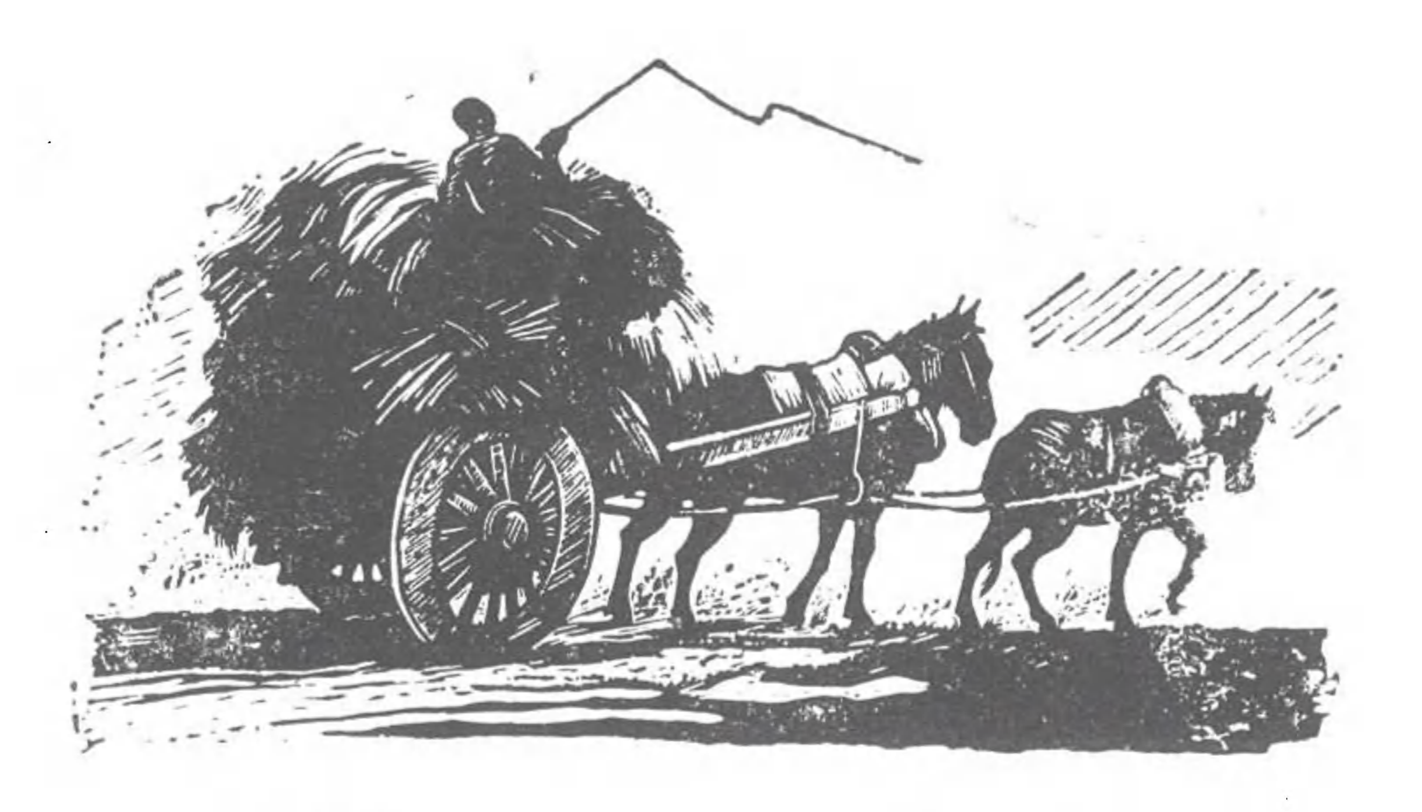
大體不謀而合。（自然也有小出入處，那因爲我們究竟是兩個人。）現在這些敍述，已蒐集出來印單行本，趙兄要我再寫一篇序，猶之乎他臨走，要我在報上送他一段話一樣，要我表示意見，以供讀者參攷。

我們是天天見面的朋友，自不宜蹈互相標榜的惡習，那麼就得說得有點意思，所以我就由對現代治史學方法的感想說起。延安一月，雖不是一本史書，現在的新聞報導，就是將來的史。你不見敦煌石室裏的小唱本，都是現代的寶貴史料？我以爲向來有心著史的人，其史就難於靠得住。陳壽作三國誌，就敲過人家的竹槓。學理一點說，三國誌這部書，當下筆，就不會客觀。我相信，這延安一月，決無陳壽那個寫三國誌的態度。

我這有點捧朋友過火嗎？不！「舜何人也」？這不過是一個比例。延安一月，自不是斗方名士作山水遊記式的東西，也不是採風問俗的小玩藝。我們也可以說回來，不必期望爲將來史料的竹頭木屑。但至少，不失爲現在讀報的一點參考材料。最後，我代他聲明一句，全篇的敍述或批評，都是很忠實的。

三十三年十月廿八日於新民報經理室大雨窗下張恨水

西京——延安間



運草　　古元作

目錄

西京——延安間

延安一月

延安一月

延安一月

延安一月

西京情調

記者團到西安第二天的日程是參觀市容。

西安是沒有清道夫的，當局規定：「各人自掃門前雪」，無論大街小巷，總是一樣的整潔。

馬路特別寬闊，有如南京的中山路。幾條主要的馬路，全取着直線，從高處下望，好像棋盤格子。方方正正，可以表現出它在歷史上經過無數次人工計劃的建設，決不是自然成長的。

隨便在那裏看看，都可以發現古都的氣魄。立體的建築不多，四面望去異常空曠，不像重慶那樣礙目。從每一條馬路上出發，都以一個城門爲終點。因爲地面空闊。蒼穹也顯得特別高大，在樓上就可以看到四邊的地平線，「星垂平野闊」，是最適當的形容。

但是西安的特色還不在大街，而在小巷。

任何一條小巷，都使我們感到古氣盎然。矮屋短牆，黃色的房子配着青瓦，對於我

們江南人完全是新感覺，屋背大都長着棕色的瓦葱，這表明了房屋的古舊，也更增加我們荒涼之感。

房屋的式樣是千篇一律的，進了矮小的門，無例外地擺着一座小小的土地廟——只有書架那麼大——這個擺設，每家都有，小巷轉灣之處，往往聳立着「太山石敢當」的石柱。一切都使我們看出古城的閑靜。

也有很可愛的地方。我走過一條王家府巷，那是普通人的住宅區，黃色的背景點綴着如火的石榴花，綠槐掩映，鳥雀喧呼，可以代表古城的一種蕭閒的境界。

初次在西安街道上散步，總覺得，好像缺少了一樣什麼東西，使它不能成爲像昆明重慶那樣熱鬧的城市。

到底缺乏些什麼東西呢？終於想起來了，只是缺少「摩登」的女人。

這裏一般婦女，端莊凝重，鄉下氣十足；普通的裝扮是短衣褲，着旗袍大概已是了不得的摩登女性了。而那種旗袍的式樣，長到脚背，直得有如紙糊的，如果是重慶女郎，恐怕是死也不肯穿的。

在此三天，想找一個把嘴唇染得血紅，燙髮，或着腰有曲線，足履高跟的女郎終於一個也沒有。

因為「摩登」的女性不多，所以男人們也就省了許多事情。街道，酒樓，戲院，完全是男性的天下，市容上沒有一點嬌柔的表現。在我所到過的大都市中，西安可以說是最硬性的一個都市了。

聽說此間有五所公園，我所走過的，是蓮湖公園。

比起重慶的所謂『公園』來，這公園的規模的確很大，也很不錯。在裏面足足走了半小時，但據熟人說，還只走了一半。

從重慶來的人，看見這裏的樹木就覺得舒服。一例是綠槐，濃得穿不過陽光。我們走了半天，始終在樹底下打轉。

所謂蓮湖是有的，但只是兩塊凹地，地上已長着雜草，水是一點也沒有，婦女兒童三三兩兩，在湖底挑着一種「灰菜」，雖說是公園，閑靜得有如野外，就祇見幾個白髮老人在那裏悠悠然踱着方步了。

在蓮湖公園，還看到一件不愉快的事情。

公園裏有一座抗戰戰士紀念碑，碑前跪着漢奸汪精衛陳璧君的鐵像。

汪逆的頭上，滿是遊客的唾沫，這是不足為奇的。所謂「唾罵」，大概就是這樣的

罷。至於陳逆璧君，那頭上並無唾沫，代替了「唾罵」，那個像是鑄成上身裸體的模樣，兩個奶頭露在外邊，於是乎那些憤慨的人便以摸一下陳逆的奶頭表示輕蔑，鐵像是黑的，銹了，只有陳璧君的兩個奶頭亮得像鍍了鎳，這可見它被人撫摩是歷有年月了。

我總覺得這種愛國的表現，有點低級。

十九日下午，我們參觀西北青年勞動營。

爲了勞動營所訓練的是那些思想上有問題的青年，所以特別引人關心。尤其是友邦記者，他們預想勞動營大概是和「集中營」一樣的變相監獄，所以抱着很大的好奇心，然而一經參觀之後，我們便覺得這種好奇心是無根據的。收容在勞動營中的青年，雖然沒有怎樣舒服，也沒有像一般預想那樣壞。

當我們的車子進了勞動營的時候，天色陰沉，廣大的土場疏疏地放着一排一排的黃土平房，心裏還起了一些黯淡的感覺。住在那裏面的，就是那些不幸的青年麼？我這樣想着，跟着領導人進去。

走了一程路，我們轉入一個中隊去參觀教室，中山室和寢室。中山室內挂着蔣羅邱史的肖像，並沒有省略掉史達林委員長的一幅。

教室裏，一位青年教官在講着「唐代的文化」。另一個教室，在討論尼采的超人哲學與法西斯主義的關係。

至於寢室，看起來很不舒服，在磚砌的床上鋪着竹席，每人只有兩條軍毯，但是後來看到戰幹團的宿舍，也不過如此，那麼，大概是這邊軍事學校的普通情形罷！

學生們的臉色，表情，和軍官學校的學生沒有什麼兩樣，嚴肅而沉默。衣食待遇，亦與軍校平等。

學程兩年，第一年政治訓練，第二年職業訓練，職業訓練分十班，爲藝術，農業，化工，新聞等。半月前約有一千餘畢業生離營。現在散佈河南陝西各地軍中工作。

參觀後，幾位外國記者分別和各學生作個別談話。每個學生都有一篇辛酸的經歷，結論却都是差不多的，從學生的談話中我們只能知道這是一個嚴格的訓練機關。

參觀以外，我們還和一部份學生舉行一次座談會。雖然教官們也在座，有幾位同學泰然地吸起捲烟來。這頗使我們奇怪，後來才知道除了上課外，吸烟是不受禁止的。

營中還有一個女生隊，約莫四五十人。在她們的中山室中，掛着孫夫人蔣夫人居里夫人的畫像。另外還挂着蘇聯的柯崙泰女士，這使一位美國記者大大地驚異起來，因爲他想不到蘇聯共產黨的婦女領袖，竟會在這裏發現。

關於學生的來源，據該營負責人報告：一部分是從陝北歸來的青年，一部分是戰區來的流浪青年。也有一些自動入營的。除了學生來源特殊一點之外，其餘一切都照軍事學校辦理。

根據我們四小時參觀所及，這個勞動營似乎並沒有像外界所傳那麼神祕。它有點像修道院，也可以說是一種特殊的政治訓練和職業訓練。因此我們曾向營方建議，以後索性公開一切，讓外邊人自由觀察。

臨潼小駐

二十一日，從西安城內出發，我們分坐着兩部汽車，向臨潼出發。這是我們參觀路線所必經之地，同時，也因爲那裏有着出名的華清池和驪山——說起來，遊覽西安的人如果不探訪一下華清池和驪山，就等於到了南海不見觀音一樣，是要被人恥笑的。所以，參觀團出發的第一個節目，便是在臨潼停止四小時，領略一下華清池之浴，然後訪問驪山，瞻仰　領袖蒙難之處。

現在單說那天的情形：車是下午三點從西安出發的，雖然是初夏，天色陰沉，穿着夾衣猶覺微涼。在一望無際的麥田中，車子駛了一點多鐘，直到一個山麓下停止，那就是華清池了。驪山緊靠在後，臨潼在右，這是假定站在華清池的門口而言的位置圖。

華清池雖以池名，它的建築也有些特色。如果就一個浴池而言，這無疑是最風雅的浴池了，有亭，有閣，有花有木：但是當作風景看，則實在說不上什麼。亭台樓閣，擠在一堆，廊檻雖然曲折，却是一望無餘，祇須三分鐘便可遊覽完畢，决沒有引人第二次來遊的魅力；倒是那幾朵老石榴，正在盛放，綠葉紅花，迎風臨水，好像在那裏歡迎我

們，有點使我們留戀不捨。

在華清招待所略進茶點之後，我們紛紛入浴。那天我感受了一點風寒，正有些發燒，所以首先並不洗身，只是躲在水裏浸着，倒有工夫靜靜地鑒賞溫泉水色。那水，的確是好的，不僅清得透底，而且煖得可人，不冷不熱，也沒有氣味，水面微微飄盪着一些蒸氣，浸在裏面，不像普通沐浴那樣使你感得氣悶。兩三分鐘後，你便可以感到凡是筋骨不如閒的地方，都弛鬆如常了，好像睡飽了覺起來一樣。然而，這種感受，恐怕也只是有意的人才能領略，那些專以洗除塵垢爲目的，一入了池中便嘩啦嘩啦地洗起來的人，是無福領略這種美處的。

在華清池取浴的人總要聯想到楊貴妃的「春寒試浴」，可是說句老實話，我那天就一點兒也沒有想到她。現在的池盤是白磁磚砌成的，全是洋味，一點也不能令人作思古之幽情了，反之，浸在池中的時候，「齋戒沐浴」，朝拜驪山，這種想頭却的的確確浮上我的心頭。因此，我自以爲這次的取浴，除了藝術感外，還有一點宗教的虔敬之感。

浴罷振衣，朝拜驪山。

驪山和華清池是一體的，科學地講，華清池不過是驪山的每小時流量一萬加倫的鑛泉，所以、要瞻仰驪山，只須從華清池後面拾級而登便是了。

爬上了驪山的小徑，同行的許多人已包圍着領導人，指手劃脚，探問雙十二之變的情形。幾位外籍記者，更是研究得認眞。

驪山的山色，不能算是美。在風景上她是沒有位置的，旣不秀，也不高，和普通的山一樣，平凡，呆板，沒有表情。

山上沒有長許多樹，也沒有多少險峻的峯脊。從黃土小徑逐步上升，看來看去，還是一樣的面目，沒有變化，沒有曲折。

倒是從山上向下看，還有些意思。公路從西而東，蜿蜒曲折好像一條帶子被隨便丟在驪山前面，公路的那一邊，四四方方的，是臨潼縣城。城內擠着一排一排的瓦屋，城外，平平坦坦的全是麥田。

小麥青青，大麥正黃，麥田是長方形的，青黃間雜，好像鋪着地氈。

走到 領袖蒙難的地點，坐在石上，俯瞰平原，腦中不禁生出了無限邦國的思緒。雙十二之變本是一件大禍，後來却成爲復興的轉機，這事發生於驪山，驪山在歷史上可以不朽了。

然而，雙十二雖然意外良好地解決了。雙十二的餘波，似乎到今天還未停止，團結雖已告成 團結的力量還待充實。

面對雙十二事變的重要碟幟，一種重大的責任感，不覺沉重地壓在我們身上了。

潼關巡禮

駛向潼關的汽車，到了一個山傍的小村落，由急行而逐漸慢下來了，在山脚最狹隘的路上，立着一座石灰牌坊，上面大書「五虎村」，車子便向牌坊下面開過，我正在思索「五虎」的取義，是不是從前人在此打過五隻大蟲？忽然，迎面而來，又是一座牌坊，兩邊塑着兩句聱句：

「五內若裂，虎視風陵」

問題終於獲得解答，原來這就是潼關城外了，觀乎「五內若裂，虎視風陵」八個字，我觸電似的感到潼關精神是壯勇，同時又是沉痛的。這樣反覆地想着，車子在城門已停下來，二十幾個人散亂地向城內前進，陡然緊張起來。潼關城內似乎不大，又經過六年的砲火轟炸，差不多沒有一間完整的房子。沿街看去，祇是牆脚和屋基，一般民衆，自然早已疏散，留居未動的老弱，看起來不到百人。在充沛的陽光照耀之下，廢墟的寂寞景象，甚於我們在照片上看到的龐貝古城。

大家正在沿街憑吊戰蹟，不提防迎面來了一位軍官，老遠地便揮着手。我們知道大概是來迎接我們的，便也加快走上去，一一握手，互通姓名，輪到我時，只聽得一聲：

「我是蔣緯國！」

大家立卽包圍着他，中語英語雜亂地交談。一直到了防守潼關的陣地，在那裏，我們又拜見了梁春溥師長。

在營地中，我們先參觀了潼關陣地的模型，隨後便參觀那一段河防工事。我們被引導在壕溝中穿來穿去，看了一個陣地，我們從瞭望哨觀察黃河對岸的敵人，在最近的處所，只有七百公尺。想起來未免有些胆寒，但是這天在潼關的經驗却是輕鬆，我從每一個哨口伸首觀看風陵渡和鳳凰嘴，並沒有看到敵人的動靜。黃河水流似乎很急，壕溝外面，雜草怒生，時常有兩三隻老鷹，悠然地在河面打圈。對岸的風陵渡：貼在河邊，分不清楚。鳳凰嘴却是壁立在河岸，看起來比這邊高些，這六年來，每天都從那邊送過幾顆砲彈來，但是不爆發的多。普通的砲彈一百八十公斤，老百姓檢到，可賣廢鉄萬餘元，這是一位弟兄告訴我的。那種砲彈，我們也見到四顆了。

關於河防工事，因爲我是十足的外行，所以無從說起，我只覺得我們參觀的心情是輕快的，但在那裏守衛的弟兄，却確實緊張，每一個槍眼，橫着一隻槍，槍旁兩位弟兄，筆挺地站着，眼睛釘住對岸，有如鐵鑄的人，沒有分毫的轉動，儘管我們蜂擁進出，他們是那樣的專心，沉默。風陵渡淪陷了六年多，隔着千公尺河面的潼關，始終屹立，敵人渡河的企圖一試再試，終於束手，那理由，與其說是工事堅固，毋寗說是我們河防官兵小心沉着絲毫不懈的緣故。就在我們參觀以前一星期，據說敵人曾集結了一些船隻在對岸，準備渡河，當時就被我們瞭望哨發現了，被我們的砲火掃射了一陣，敵人只好又死了心。

且說我們參觀了河防工事之後，又回到街上來，杲師長先讓我們看一下潼關的古蹟，說起這古蹟，眞是大大有名，那便是曹阿瞞割鬚棄袍的所在。那裏有顆樹，樹幹大如圓桌面，樹上有孔，據說『馬超一槍刺去，刺不到阿瞞，却戳進這顆樹上去了。』這故事是熟習的，但我從來未想到它是發生在潼關的。

乘着參觀後的餘興，大家興奮地談着河防呀，馬超曹操呀，以及這裏的人物如何如何呀，一直到蔣上尉提出『是吃飯的時候了』，於是又一擁而到了一間比較完整的店面

，打着『戰地酒保』的招牌，這自然是軍中的營館了，大家對於『酒保』兩字，似乎感到特別有趣。一進門，便聽到盈耳的『八匹馬』呀『五金魁』呀，弟兄們三三五五地正在猜拳，看見長官們來了，臉紅紅地站起來，長官們也只是相視而笑。壕溝生活也並非是完全枯燥乏味的，在河防的掩蔽壕中，我們還看到弟兄們下棋呢！

『戰地酒保』的風光，寫起來又該是一大篇。那眞是戰地酒保。那花瓶，就是各式各樣的砲彈筒。我們一邊聚餐，一邊聽着聚師長給我們記者的過份歡迎詞，蔣上尉替他翻譯。聚師長並且表示，在他的弟兄守護中，決不使潼關有一絲一毫的變動，決不讓敵人過來！我們拍掌。聚師長又附帶地報告，前天我們有位弟兄划船到風陵渡，生俘了一名敵兵叫森本利則，（廿三歲，大阪人，敵六十九師團一等兵），我們又是一陣拍掌，接着的節目，是約了兩位弟兄和記者團的中外記者兩代表猜拳，代表外報記者的愛潑斯登君連輸三拳，他本來生得矮，輸了拳還故意縮了一下頭頸，那樣子眞使人非笑不可。連酒保中的小堂倌們也忍不住笑起來了。

在戰地酒保中，我們有機會更清楚地觀察蔣上尉，銀鈴似的清脆的聲音，瘦長的身

村，清癯的臉型，靈活的動作，機敏的應對，口角老是帶着微笑，無處不顯示他的英俊。這一次聚餐會中，他週旋中外記者，沒有一分的空隙，活躍極了，然而他最活躍的地方，還是戰場。據他的同事告訴我們，蔣上尉所守據點乃是河防中最緊張的一個，他所駐的營房乃是給敵人大砲射擊最多而且最破爛的地方。他生活相當嚴肅，然而活潑有趣。我幾次想問他對於四年來的戰地生活，有些什麼感想，終於沒有機會。但是向不喜歡請名人簽字的我，居然也請蔣上尉在我的日記本上題幾個字，作為對本報的贈言。他題的是——

「消息靈通是打勝仗的條件之一。」下面署名「上尉蔣緯國」。

當我們正起勁談話，喝酒，歡祝　領袖健康，向河防將士致敬，種種熱鬧的呼聲中，有人報告胡將軍到了，他是從某地趕來會我們的。我們剛靜下去，他人已進來。梳着長髮　紫褐色的臉，很闊的眉毛，深沉靜默的表情，在普通軍人所有的姿態中又顯出一些不平凡的樣子。和我們會面的話，只是一句簡潔的「很高興」。當他坐定，自然一切問題都向他提出來了。他的回答總是簡單有力的兩三句話。他告訴我們，中原戰事，我們已經開始好轉。他希望我們參觀潼關河防，特別要注意到我們官兵戰鬥情緒之健旺。

此外還說了一些話，他又匆匆地趕前線去。胡將軍是我們所最希望瞻仰的人物之一，尤其是幾位外國同業。可是據此間幾位朋友告訴我，他是最不喜歡有人拿他做新聞資料的。那麼，我這裏所寫的或許已經過多了，雖然只是幾百個字。

胡將軍走後，我們的時間也到了，我們還須趕路，跟着也就告辭。在離潼關開返華陰的途中，我們再一次審視沿途的景象，一面體味今天在潼關的經驗。隨車的弟兄告訴我們，當我們在戰地酒保正熱鬧的時候，敵人向西門開了六砲三槍。我們奇怪何以聽不到砲聲，那位弟兄道：「誰知道，它們的砲彈裏面大概都是草料吧！六砲只打兩砲響！」他說着顯出一副輕蔑的表情。車中爆發了一陣笑聲。但是，當我們經過幾所寺廟，看到那些泥菩薩們斷頭殘臂露天默坐的慘況，再念一下「五內若裂，虎視鳳陵」，我們又不能不轉而嚴肅地想到潼關是具體地代表了我們民族的堅苦奮鬥的精神的地方。

大荔。郃陽

二十一日下午回到華陰，立刻向大荔出發，一路順利，但將近大荔時，忽然意外地耽擱了七小時。

從華陰到大荔，須渡渭河。車子到了渭河，一望盡是沙地，風沙撲面，景象蕭索，公路就在沙中穿過，但是走不了多少時候，車輪就陷在沙中，再也開不動了。

此後便是一番說不盡的忙碌與費勁，推哩，拉哩，用木板填起來走哩，大家忙做一堆，用盡了力氣，還是沒有什麼用。有時費了許多工夫，把車子拉出陷穽了，可是開不了幾步，又陷了下去。

最後我們絕望了，只得步行，讓車子留在沙灘，我們先過浮橋，到了大荔縣所屬的渭陽鎮。在鎮公所洗臉吃茶。由他們發動民夫牲口去拖車子。

這樣足足等了四個鐘頭，我們還在這小鎮上徘徊，地方本來荒涼，一到晚上更是淒清，聽說，當地的人以為我們是什麼委員下鄉，嚇得不敢出門了，我們悄悄地坐在十字街頭，犬聲斷續，夜風淒其，只有天上熠熠的明星，充任我們的主人。

一直挨到十點鐘，車子才來，得了三百個老百姓的幫忙，幾乎是一步一步拉過河來的。

十一點半抵大荔，蔣堅忍專員，還在街上靜候我們，匆匆吃了晚餐，疲倦已極，連一個「謝」字都來不及說，就趕着找床舖睡覺了。

二十二日清晨參加大荔各界的談話會，九時，到涇洛工程局參觀水利工程。

陝西的水利事業是很有名的。但因為我是外行人，終於走馬看花，毫無所得。參觀前，我以為這工程既是李儀祉先生創辦的，應該可以看到一點李先生的手跡來；但在那裏，只見到幾張李先生的照片，想問一問李先生在此經營的情形，竟沒有一個人能答覆。

幾位盟邦記者，對於這工程技術方面，似乎也感不到多大興趣。相反的，却詳細訪問此間工人生活的狀況，以及童工之待遇等等。這情形使我發生一點感想。我覺得在技術方面，我們實在夠不上給友邦人參觀，我們以為了不得的，對於他們，或許是家常便飯；他們所感興趣的，似乎在我們的人事和制度方面；他們正要從這些地方察看我們有沒有現代化的能力。所以我希望以後各實業機關請外人參觀時，與其專門誇示技術，不如同時兼顧到管理制度，與工人福利等問題。

廿二日下午三時到了郃陽，郃陽縣縣長給我們一個古香古色的歡迎大會，最精彩的

一節，是在朗讀歡迎詞之前，司儀高喊奏樂，於是我們享受了一節用鑼鼓琴簫合奏的國樂。

郃陽街道齊整，公共建設尤佳，我們參觀郃陽初中，校舍之大，簡直可以辦一所戰時大學。

紳士階級在此地似乎很有力量。那天的歡迎會中，我們就看到許多許多穿馬褂的農會代表等等人物，雍容揖讓，居於導演人的地位。

韓城。黃龍山

在郃陽過一夜，第二天向韓城進發。

在這條路上，窰洞漸多，邱陵起伏，已不像前幾天那樣的平坦了。車子有時開入狹長的土衖中，有時在邱陵的邊緣行駛，四圍景物寥寂，令人昏昏欲睡。

兩小時後，抵一村落，小橋流水，綠柳紅花，居然有江南之美。我因此想到，北方的「枯山惡水」並不是自然的。黃土色彩的單調，很可以用綠色來調劑，為了美化西北，造林也是緊要的事。

到韓城已是午後三時，因為時間還早，我們大家上街，參觀市容，就帶便買些日用品。有一位朋友想買黑人牙膏，那店家索價四角，我們大為驚奇，再問他要多少，他又減到三角五了，我們叫他照實價賣，他死也不肯，雙方相持了半天，有點像鏡花緣中君子國的買賣。後來碰到另外幾位同伴，他們也有同樣的經驗，賣人丹的索價只要二元，據說是表示歡迎。可是這種歡迎的結果，是我們一致不好意思買東西。

當天晚上，我去聽本地的「秦腔」，所演的「紅鸞禧」，演作與京戲沒有差異，祇

是音調高亢，有點刺耳，我本來只想見識見識，至於戲詞，是一句也不懂。

觀衆全體是穿軍服的人。連台上敲鑼打鼓的都是穿灰色軍服的，因爲這裏和敵人只隔一條黃河，所有的人都組織成地方警備隊，因而也就沒有一個人不是穿軍服的了。

從韓城去宜川，路越發難走了，地勢愈走愈高，中間還經過黃龍山。

我們起初經過黃龍山麓，公路蜿蜒在峽谷中，怪石迭出，草木亂生，沿着公路，還有一條清奇的溪澗不斷送來水聲。在黃土塵砂中趕了幾天路程，到這麼一個山明水秀的所在，愉快極了。幾位外國朋友更是起勁，車一停下來，他們就下去採摘那種種不知名的草花，編成花球。那些花多是我們未見過的，嬌艷美麗不可描寫。

但是，這一帶的百姓却窮苦極了。在一個叫做「柏村」的地方，老百姓告訴我，山中只能種一點點麥子，只够納糧，至於他們自己，能够有包谷吃，已算不錯了，柏村有百來戶人家，大都就在山上挖一個淺淺的窰洞作爲住宅，我們經過時，拖着鼻涕的小孩子們都遠遠地躲着我們，即說小孩子，這邊的也絕不若南方的活潑。

享受了兩小時的峽谷風景，汽車開始爬行了。此後便是三十里的上山路程。

山道險峻，公路又壞，人在車中，被顛簸得頭昏腦脹。

整個黃龍山是許多山頭簇聚攏來的，公路在這許多山頭中打轉，如像一條長蛇纏繞着無數個圓筒。在這個山頭穿到那一個山頭的每一段中，幾乎無例外的都成了S形，公路下臨深谷，俯視陡峻，令人心悸，汽車行進在這裏，一面怒吼着向上爬行，一面隨時作很大角度的轉折，大家一齊注視在司機的駕駛盤上，緊張萬分。

這樣爬了大約個把鐘頭，司機一路上嘆氣，說走過了這條公路大家都將少活十年，最後，總算到達了本山的主峯了。領路的人宣佈險要的路程已經過去，大家鬆了一口氣。到這裏才看見我們剛才所繞過的山頭，一個一個從下面向着這座主峯朝拜，它們好像許多衛星，受着主峯的吸引。而這座主峯則傲然峙立，有如衆山的保護人。

到達了山頂的平地，又開始急峻的下降，下降雖然省力些，但那轉折也很緊張。車外的風景已與南面的完全異樣了。剛才從南面上山，沿路樹木陰森，雜花滿山，到了山北下降，我們就只看見一些苔鮮短草，不然就是乾乾淨淨的黃土堆，再也看不見樹木了。

黃龍山本是荒山，未闢爲墾植區，現在，設立了一個治局管理。這一個治局的轄地，是從宜川濾水等六個縣境劃出來的，現在有六萬多開墾的農民。大多是河南老鄉。初

來的時候由公家貸款購買農具種籽，分六年還淸。但據說從去年起，已停止接受移民了。

渡河入晉

過了黃龍山，已入宜川縣境，依然是山地，但公路都沿着山麓，無須作費力的爬行了。這一程我們行進得很快，經過許多山麓，山高而壯，滿舖青草，谷曠而深，散放牛羊，斜陽慘白，氣候陰森，使我們想到高原的氣象。

宜川縣城小得可憐，小城小街，矮牆矮屋，只費五分鐘，我們已把整個縣城巡視過了。商店不多，人口似乎也不多，然而奇怪，同業公會却特別多。差不多每隔四五間門面，就掛着一個某某業同業公會的招牌。這是什麼緣故，我至今不明白。

在宜川城內，擾過縣政府的午餐後，我們集體洗澡去。浴室爲了我們換了乾淨的浴巾單布，我們人據一榻，抽烟喝茶娓娓清談，所有今天經過的顛困疲勞，這時一起都消逝了。

宜川是晉陝交通線邊緣之一點。從宜川渡河，便是山西省政府所在地的克難坡。廿五日一大早，我們就上路，汽車把我們送到桑柏村，就停止前進了，因爲從此向

前，已無公路，我們得換乘馬匹。

桑柏村已有閻司令長官派來的人招待我們，爲我們設午餐，還替我們準備馬匹，我們被引導到窰洞中休息，外面赤日炎炎。進洞倒頭便睡。下午兩點鐘，才接到出發的通知。

幾十匹馬已在等候我們，會騎馬的朋友爭着挑選好馬，興高彩烈，我是不會騎馬的，自然也不會選馬，結果得到了一匹最瘦的，那馬伕說，這匹馬的脾氣很好，只是不會跑。我說這倒是我所喜歡的，我本來只要走不要跑。便騎上去了，搖搖擺擺的跟着大家走：瘦人瘦馬，不禁有點像吉軻德先生。

由桑柏村到黃河渡口，走的是下坡路，膽小的朋友紛紛下馬步行。一直走到渡口，我們在河岸上欣賞了一下大河風景。這時河水不大，兩邊河岸都露在上面，若將兩邊的河床合起來而想像洪水期的黃河，那應該是十分壯闊的。兩岸都是呂梁山脈，黃河是山脈的大缺口，所以風勢特強。一座鐵纜組成的木橋在河上。這座橋也是敵人時常轟炸的目標。據說有一次敵機三十架輪流轟炸，整整一日，投了炸彈百餘，結果只炸斷一根鐵纜。

就在那橋上，俯視黃水，滚滚東流。仰觀兩岸，雄山對峙，大風吹來，橋身動盪，

我心中忽然也動盪起來。我一向只見過江南的山明水秀，從未實地體味過如此的高山大河，「泱泱大邦」的境界，到今天才能領會。國土是可愛的，不必翻歷史，只要從地理上領略也就夠了。我想像假如能夠在河濱露宿一夜，燃着熊熊的營火，烤吃野味，痛喝汾酒，該是如何痛快的享受啊。

渡河之後，沿岸騎馬，我忽覺得配着這樣雄偉的境界，慢條斯理地騎着瘦馬，未免喪氣，於是也加鞭快跑起來。那知道不跑則已，一跑起來，我就只有工夫照顧自己了，什麼雄偉呀壯闊呀的想像都丟在馬後去了。

山西新姿

克難坡，是我們所經過的惟一的山西省境。在抗戰前，這裏只有三戶人家，現在却成了山西省政府與戰區司令長官的駐在地了，因而帶來了相當密集的人口——然而也不過一萬多人，幾乎可以說，全是公務人員和他們的眷屬。

要了解克難坡的地理位置，却很困難。因爲這地方太不出名了，地圖上是沒有的，簡單地說，這是瀕臨黃河西岸的一座山頭。黃河沿岸的山，幾乎千篇一律，一律是黃土，一律是方塊的饅頭形，根本無法分出這座山頭和那座山頭有什麼不同。克難坡也便是這種山頭村落之一。我們從黃河岸上騎馬上山，爬過幾條轉折的山徑，到了山上的平地，看見許多比較考究的窰洞，我們就知道到達目的地了。

照理說，克難坡也可以照重慶先例，加上『山城』的稱號。但是，更恰當一點，我們應當稱之爲「窰城」。因爲在這裏，除了窰洞之外，不曾發現別的建築。機關住宅，都在窰內；閻司令長官的私宅，就是一所大窰洞。我們記者團還一囘自然也大過其窰中生活。

那些窰洞，一排一層地挖在山頭，密集有如蜂窠，似乎不見得舒服。可是，窰內的

情形，却有我們意想不到的適意。以我們所住的而言，闊度可以容納兩張床和一張方桌，長度可以容納六張床鋪，穹形的窰頂，糊着潔白的紙張，兩面有窗，光線充足，陰涼而又爽朗，在重慶，我就未住過如此舒服的房子。

沒有商店

克難坡市面上有一個特點，便是沒有商店，因而也沒有市招。

依據這裏的經濟管制，私商是完全消滅了，其詳情，下面再說。消滅了私商之後，一切生活用品的分配，均以合作社代之。因此，私人的店號，這裏是一家也看不到；當地的報紙上，絕對沒有商業廣告。除了接受合作社分配的東西，或合作社購銷部所供應的一些東西之外，你絕對無法看到什麼商品。

沒有商號，也就沒有了後方都市那樣倚賴商業的繁榮現象。不僅節約了商業本身的浪費，一般人的消費也自然節約了。例如香烟，就等於禁止。合作社不分配香烟，全山西境內的工廠也不許製造香烟，各地的香烟又沒有私商來轉販，那結果自然不禁自絕了。

一切的奢侈品，在這裏都和捲烟同命。沒有分配，也沒有販賣，一切商品在合作社一切工廠由政府控制，所有的物資分配都由公家掌握，任何私人的商業不能存在。我

想，就是蘇聯大革命後的情形，也不過如此吧？

那麼，這裏的生活，是不是有點枯燥呢？重慶的朋友請想想。沒有香烟，沒有口紅，沒有電影，是不是有點難以過活？

告訴你，完全不是那回事。論物質的享受，這裏的確談不到；但是，在這裏，我初次見到所謂「精神」這一種力量。

沒有「官氣」

我們在重慶，根本就沒有想到有這麼一個地方。我們雖然聽說過山西有它一套政治經濟的辦法，但我是一向不相信「辦法」就是事實的。到這裏一看，才使你不能不相信它。

和我們記者經常接觸的人物，在山西都可以說是「首腦部」。我對於什麼委員呀，局長呀，向來是敬而遠之的，而這裏的人物，却沒有一個人給我一個做官的印象。所有的官氣，也經抗戰抗掉了。

服裝一律的是草綠布的中山裝，橫腰一條皮帶，根本就和平民一樣，也無所謂「平民化」了。說話談論，沒有那種「然而……不過」的官腔，年紀在三十到四十歲之間，他們每天辦八小時的公事（這叫做「抗戰勞動」）。另外還要幹四小時種菜，養雞，養

猪，等工作（這叫做「生活勞動」）臉孔無例外的都晒成紫色的了，這就是我一向敬而遠之，而在這裏却變得朝夕親近的委員局長們的剪影。

在閻先生督導之下，山西的政治口號是「幹部第一」。的確，活躍於山西政治舞台的，只有幹部，並沒有「官」。

一切都歸於樸拙

爲了說明這裏軍政人員的精神生活，不妨舉一兩件事爲例。

雖然是僻地，戴眼鏡的人似乎特別多。於是有問題了，眼鏡破了怎麼辦。他們的辦法，是在破片上貼外科手術所用的膠布。在這兩天中，我就發現貼了膠布的眼鏡五付之多。

除此以外，公務員們的勤勞也是可佩的。在我們到此的第二夜，承他們的好意，演劇歡迎。看戲的都得自帶櫈子。

於是在散場的時候，我們就看見成千的公務員，每人肩上抗着一條長櫈，排隊而過。這是我有生以來所第一次見到的奇異的行列。

凳子，是這裏惟一可以坐的工具。除了在閻先生的私宅，我們曾看到幾張椅子外，

在旁幾位機關長官的私宅中，就沒有見過椅子。

我們每天所吃的，眞是好到無可再好了。但是所用的餐具，則顯然是臨時湊合的。酒杯有深有淺，菜皿有磁的也有鐵的。

出乎意外，這裏居然有電燈，發電機上有許多東西，只是汽車零件湊合的。一切歸於樸拙，要說明克難坡的生活，只要用這一句話就夠了。

市容與市氣

觀察一個城市，我們常着重於市容，而不知市氣。但，市氣確是有的。例如在重慶，我們就不難嗅到脂粉氣和酒肉氣。

克難坡的市氣，說起來不大好聽，是濃厚強烈的馬糞氣。不管你到那裏，馬糞氣總跟着你走。

就是那些機關裏，也總除不了這種氣息。那天晚上看戲，我們就在馬糞氣中足足坐了三個鐘頭。

如前所述，克難坡是呂梁山山脈的一個山頭，汽車是無法通行的，往來上下，全靠獸力。驢馬成了惟一的交通工具，那麼馬糞氣之重，也是理所當然的了。對於重慶客的

鼻官，這氣味似乎太刺激，然而一看到這邊的驢馬，在那血淋淋的皮肉上面架着鞍子負重爬山的樣子，則我們對於這一點點不愉快的氣息，如何還能表示不滿呢？

儘管嗅得難受，但我以爲比起重慶城內的脂粉氣和酒肉氣來，克難坡的馬糞氣也是健康的！

家長政治

關於克難坡的情形，沒有什麼可以再說的了，現在應該略爲介紹一點山西的人事和制度。

說到這個題目，我們必須先了解，山西的政治空氣，是和別的地方有些不同的。不同的第一點，是家長政治的氣味特別重。

山西的組織好像特別複雜，村縣的行政和檢察機關，軍和政的臨時組織，以及革命同志會等各種團體，我們一時還研究不清楚。然而有一點是確定的：閻伯川先生領導一切。所有的組織，是以閻先生的人格爲中心的組織；所有的工作，是以閻先生的理想爲幹骨的工作。

整個山西軍政兩界，好像一個大家族，各種幹部，都是子弟，而閻先生則居於家長

地位。戰區政治會議有一種公報名「革命行動」，裏面刊佈閻先生的手諭文電，那些話，不像一個長官說的，却像一個家長對於子弟的家訓。同時，在各種公共場所，在各機關長官的辦公室內，時常貼有閻先生的手諭，那些話語，亦樸素得有如格言，簡直不像公文，說到這裏，我們必須知道閻先生在山西的領導歷史，已經有三十年了。三十年的時間，造成了他深植在民間的地位，而後來受他提攜的幹部，無疑的都和他有着歷史的關係。因爲這個緣故，閻先生在當今少壯輩中，十足成了祖父級的前輩人們。要在山西民間抹去「閻錫山」三個字的權威，幾乎是不可能的。一切新進的人，惟有在他的領導之下，才能獲得發展的機會，這樣自然而然的，造成了閻先生的家長地位。

山西現在正試驗一套新政策，這些政策對於現社會的變動頗大。假如沒有閻先生的地位。假如沒有他在山西一貫領導的歷史，這些辦法在任何地方都將歸於泡影。但是山西居然順利施行了，這不是制度問題，老實說，還是「閻錫山」三個字的力量居多。

閻宅談話會

二十七日下午三時，我們接到通知，首次拜會閻伯川先生。

閻先生的公館在我們所住的窰洞的左首，不過幾十步的距離，走進一個矮牆的院落

，並排列着三個窰洞，那就是這在山西經營了三十多年的大家長的住宅了。

除了比較潔淨一點之外，這個住宅簡直樸素到有些荒涼，院落的一角，圍着短短的的竹籬，裏面稀稀疏疏的長着一些青菜。在進口的門屋上，擺着一具木頭蜂箱，蜜蜂兒三三五五在附近飛舞，看樣子，這房蜂也不見得繁盛。

三個窰洞中，中間一個是會客的，就在那洞口壁上，我發現一個凹進去的神龕，裏面供養着一張花花綠綠的紙條，上面印有「天地三界十方眞靈主宰之位」，神龕的外邊則貼着「天地交泰」和「天天須進步」「地地要劃分」的對聯。這大概是閻先自己的手筆吧！

我眞想不到在閻先生的住宅會發現這一類的擺設。因而特別感到興趣。看了這菜園蜂箱以及神龕我不由得想起閻先生的爲人來。我彷佛已從這些地方窺見了這所住宅的主人翁的品性了。

我感到閻先生的思索力是可驚的，他的吸收新思潮，適應和進步的精神也是可佩的，然而，他究竟是祖父輩的人物啊，新理論中屬雜着舊的習慣，舊的思想，於我們或許這個缺點，但在六十二歲的閻先生身上，這種不調和，不正是應該的麼？在那「天地三界十方眞靈主宰」的神龕上題着「天天須進步，地地要劃分」的對聯，不正是閻先生的

眞精神麽？

中國的儒家是講究中庸的。閻先生的思想與行爭，正充分表現了儒家的中庸之道與人情味來。所以，我對於這所神龕是抱着好意的。

談話會開始，我們傍着一條長棹，和閻先生對面而坐。

閻先生給我的印象，是意外的蒼老。雖是個胖胖的北方人的身體，但是鬚髮白了，臉上已失去豐潤的光彩，那表露老年的縐紋，已經密集在他的眉梢嘴角了。

帶着老花眼鏡，穿着灰色軍裝，頻頻翻閱面前中外記者所提的書面問題。眼光時時從眼鏡上面看出來。那茫然的神態，據我推想，也許是一種寂寞的表情。

對於每一問題，他都委婉地答覆了。發言柔和，吐辭紆緩，沒有一些躁急之狀，我們坐在那裏聽的人，也不自覺的心氣和緩了。

我們所提到的，大多數是本戰區政治上最感困難的問題。他毫不遮飾的加以說明。抗戰期中，山西的處境確是特別艱難，當面有敵人，背後則有共產黨的存在。負責這一戰區的人，一面要應付強敵，同時還須和中共作『革命競賽』，閻先生說到這一點，容光黯淡，語調低沉，特別使我們感動。

說到山西的新經濟政策，他的眼光忽然發亮，顯露興奮的情緒，非常有系統的從這

一段說到那一段。從他敍述之富有條理，我們不難知道他對於這方面問題之具有特別的興趣。

窰中光線，略爲陰暗，簾外則是一片夕陽，談話會就在這幽靜的空氣中流暢進行。當領導的人請我們注意閻先生的休息時間時，我們才知道已打攪了他三小時之久，不能不告辭了。閻先生卸下眼鏡，點頭送客，這時，我猛然想起，他的面型頗有點像老年的興登堡將軍。

閻先生的一日

閻伯川先生每天的生活情形，據他的左右告訴我，經常如左：

晨四時起床，早餐後，寫訓話，五時半開朝會。

六時半，到訓練班訓話半小時。

七時到十點，批閱公文。

十點鐘，再進早餐。

十一點到十二點睡午覺。

十二點到一點，看國內外的廣播新聞。

一點到兩點，會見賓客。
二時正，進午餐。
二時五十分至四時，會客或辦公。
四時至七時，主持各種會議，經常每天主持四個會議。
七時正，進晚餐。
八時至九時，處理臨時發生的緊要公事。
睡覺的時間不一定，早則九時，晚也可以遲到十一時。
閻先生沒有什麽嗜好，最感興趣的是計算和建築，時常就蹲在地上，用樹枝在地上計算各種數字或繪畫圖樣。我相信他那一套新政的計劃和理論，和他愛好建築的氣質是有關的，他的個性，似乎帶有古羅馬人愛好制度和法律的特質。在從前，閻先生還喜歡研究新武器，他自己也常常描繪圖樣交給兵工廠試造，據說山西省造的手榴彈在國內居第一，就是由他設計改良的，但是現在他却沒有這種工夫了。
閻先生有公子五人，大公子和二公子都已去世，現在僅有四五兩公子隨侍身邊。四公子名志敏，十九歲，五公子名志慧十八歲，家裏有個學塾，聚合親友子弟一起受教，這兩位公子也在內求學。

雖然是閻先生家裏的人，每天仍然要做「生活勞動」兩位公子都領有「份地」，每天種菜。此外，還有一個閻先生所最鍾愛的孫女，是已死的二公子所遺留的。今年才十一歲，據說也學會紡紗了。

民族革命同志會

爲說明得更詳細一點，我們不妨來看一看山西境內的惟一政治組織——民族革命同志會。

這個組織的性質頗難說明。論他的主義和政策，可以算是國民黨下面的政團，它的負責人物，同時就多是此地黨部的負責人。

但是這個組織却又不能算是通常的黨團。因爲它是極富有人格中心的色彩的。它的組織系統採取會長制，閻先生是會長，對於本團體有絕對的權威。

同志會的會員差不多有十一萬人，這些人現在都是山西各地方基層政治的幹部。也可以說，山西省政的一切措施，都須經過他們才達到民間。推行新政的是他們，支持抗戰的也是他們。

同志會裏面的人，對於這個團體的政治性質是取着否定的態度的。他們認爲這完全

是戰時工作團體。同時也是復興山西的有力機構。他們曾坦白的表示，在廿七年六月，山西情勢最惡劣時，假如沒有組織這個團體，則山西省政能否繼續維持，都是問題。

客觀地批評，我們可以承認這個團體是山西省惟一有組織的力量，它是以閻先生的「人」為中心的組織，假如無視了這個團體的作用，我們將無法了解晉省今日所推行的複雜政令。

兵農合一

「經濟政治化，政治土地化」，是山西最近提出的口號

經濟政治化，就是用政治力量管理經濟；政治土地化，就是農本主義的意思。

為了抗戰，必須足食足兵。為了安定戰時社會，必須穩定物價。因此，山西省的新政便包括了兩個大綱目，第一是兵農合一，用以足糧足兵；第二是合作社和合作劵，用以分配物資，增加生產，穩定物價。

在解說山西的新政時，我們必須先了解這一套辦法，不在理論而在事實。新政的理論雖然還有可以辯論的餘地，但事實上確已解決了許多我們後方其他都市所難解決的問題。其次，我們還得承認這一套新政策，是靠着閻先生在山西的歷史地位而推行的。在

缺少這個「人」的條件的他省，能不能推行這種辦法，也是疑問。

如字面所示，「兵農合一」的意思。就是「寓兵於農」。辦法的要點是：在每村中，教役齡的（十八歲至四十七歲）壯丁自由組織三人一組的「兵農小組」。這三個人中，有一個人須去入伍當常備兵。留下兩人充當國民兵，在家種地。凡是充當國民兵的壯丁，都可以領到一份地，叫做「份地」，份地的大小視各地情形及土地的高下而不同，但以年產量純收益二十石小麥或小米為標準。那一位出征士兵的家屬生活，就由這兩個同組的國民兵共同負責優待，每年供給出征士兵家屬以五石食糧十斤棉花並隨時的照拂。至於確定何人出征，何人種地，由三個人自己商量，商量不決，則以抽簽決之。出征士兵自服役之日起，三年一退伍，退伍後之頂補，也由同組兩人中之一充任。

至於份地的來源，或者是壯丁們自己的，或者是屬於地主的。假如是地主的，那地地主必須將土地交出，由公家劃為份地，除了承認他的所有權外，關於土地的使用全由公家支配給各兵農小組。種地的國民兵，按規定給地主納租，納租標準按糧銀正額，譬如地主過去所繳的糧額是一畝一升，即由領種份地的人給地主每年一畝地交一升租。如此一來，地主階級幾乎可以說被推翻了，除了可收很少的租外，對於他的土地已不能顧

問；同時出征士兵的家屬生活既有同組的兩個國民兵負担，逃役的事情也減少了。在這個辦法下，沒有人願意瞞住自己役齡，因爲瞞了役齡，也就領不到份地；而且也少有逃避兵役，因爲逃避兵役的人既不在兵農小組以內，也就沒有資格領份地。

一個人出征兩個人種地，三家人家共同靠着這兩份地過活，這樣足食足兵都顧到了。可是，那些老人小孩子怎麼辦呢？她們既非役齡壯丁，沒有份地，如何過活？那解決的方法很簡單，便是幫助國民兵耕種。領有份地的國民兵叫做「主耕人」，而這沒有份地的老少婦孺，便做「助耕人」。主耕人每年給助耕人以一定的報酬。

照一般情形說，一個國民兵耕種一份地的收支如下：田賦及抗戰負担約估產量的百分之三十，地租約估百分之五，肥料等約估百分之十五，餘糧約估全產量百分之五十。還百分之五十中，還須分出一部份給助耕人。

上面不過是一些要點，至於詳細情形，還包括許多技術方法問題，這裏且不談。開始實行這辦法，是去年八月，實行以後，據說意外地順利，其顯著的效果是：（一）消滅了地主的勢力，（二）增加了耕種的面積，據說在某一縣中，畫分份地以後，比畫分以前多出四十萬畝。

在出征的常備兵方面，對於這辦法的歡迎是無須說的，因爲這辦法保證他家屬每年

收到優待糧花，同時，他家裏的老人小孩還可以充任助耕人收取一些報酬：等退伍回家便可以領一份地：萬一戰死，他家屬仍可以受三年的優待糧花，（三年以後的生活，則入於救濟撫卹的範圍了）。因此據說，逃兵與避役的比率大大的減低。凡是逃兵的家屬不僅失了優待權，並且還須負担糧花優待同組出征士兵。倘想逃避兵役，那就根本沒有領地資格，也就根本無法生活了。

合作券

山西省經濟管制的大特色，是沒有商人之存在。

其辦法是：第一，用政治的力量，禁止私人經營商業：第二，將所有的工廠收歸公營，所有產品，統由政府收購！第三，集中一切物資於合作社和平價購銷處，合作社負責供應與分配，購銷處負責調劑盈虛。

此外，還加上一種特別的制度，那就是「合作券」。

什麽是合作券？我們少談理論，且說事實，它是代表人工的一種證券（照閻先生的理論講，合作券所代表的是工本），它也有一元十元等名目。每十元合作券代表一個人每日的勞動，比仿說，做一雙鞋子需成人兩日工夫，那價值就等於二十元合作券。

合作劵而上有地名，流通範圍，不出一縣。同時還規定，合作社社員買東西，必須用合作劵。所有參加生產的人，以成品送交政府收購，他所得的亦是合作劵。合作劵清算了物資分配。至於法幣，只在經濟管理局對省外購買物資時才用到。

因此，就發生了這樣的情形：向合作社購買東西必須用合作劵，你想獲得合作劵，就得勞動，不勞動，縱有千萬不勞而獲的法幣也買不到你所需要的東西。所以一般說來，不勞動即不能生存。人人勞動的口號，多少可以實現一部份。

其次，因爲合作劵的流通範圍，不出縣境，而購買省內物資，又非合作劵不可。所以只有合作社和平價購銷處，有收購物資的可能。淪陷區的敵人，即使吸收了我們的法幣或合作劵，也斷然套買不到我們的物資。

其三，工廠由公家控制了，只許生產幾種必需品，私商被禁止了，沒有偷販奢侈品的人，省外的貿易也由公家獨佔了，不必需的物資無輸入可能，因此節約經費，定量分配，做得很澈底。

其四，因爲合作劵是永遠代表人工的，物品的製造過程不變，用合作劵所代表的物價也就不變，商人已絕跡，沒有人能夠操縱市面，所以物價比較平穩，它的漲跌，祇在對法幣的比價上。但是，一年以前，合作劵每元折合法幣二元，如今也不過折合六元，

只漲了三倍（從法幣算）。據說西安買三千元的紗，在這裏只合到一千三百元。關於合作勞「造產」「增產」的作用，因爲我沒有見到確實的統計，只得暫時保留。至於上面四點，則是我們所實地見到的。我們應該承認它的確有試驗的價值。

山西所試驗的新政策，表面看來甚爲複雜，但是它的綱領只在兵農合一與合作勞兩點上，了解這兩點，其餘各事如管理機構，組織系統，都是不重要的了。

新的作風

辦法雖然好，還是需要人來推動的。因此風氣如何，便成爲「辦法」的嚴重試驗。在這方面，山西省當局也做到了相當的標準。閻先生一再提出了打破「紙面政治」「空文政治」的口號，成效如何，我們雖不知道，不過上面的人旣能如此領導，我們沒有理由可以懷疑在他下面的人不向這條路上走。

一般公務人員，過着儉樸的生活，這情形和我們後方各都市沒有什麽差異。但是，此處的公務員的勤勞却值得特別介紹。

按照規定，公務人員除八小時的「抗戰勞動」外，每日還得從事四小時的「生活勞動」。種地的種地，作工的作工：從事生產，增加個人的收入。

我們看見楊愛源氏的辦公室外，有九方丈的菜圃，便是屬於他的生活勞動場。我們還看到，省府甯祕書長的公館，擺着兩架紡紗機，這或者也是他的生活勞動吧？

反過來說，當局對於不法公務員的懲戒。似乎特別嚴格，尤其是貪污，幾乎不分輕重，一律處死。我們見到去年的報告：六月份處死刑的有五十二名，七月份處死刑的有五十八名，這一個數字，很可以表示當局刷新政風的决心了。

革命競賽

在戰前，山西是比較保守的省份，尤其在經濟制度上，經過戰爭的動盪，山西變成另一個世界了，無論在什麼地方都顯出「變法」的努力。爲什麼會如此突變呢？我曾以這個問題向這裏負政治責任的人探詢。

那答覆大意如左：「山西的變法和新政，一部分由於閻先生善於思索的頭腦，但是主要的原因，却是環境所影響，非如此就不足以維持正常的政權。」

「不完全是戰爭」，他坦白地說，「據我們的經驗，爭取戰區民衆，還是比較輕鬆的工作，因爲敵人的殘暴是衆目昭彰的事實。我們所最感困難的，是社會主義的宣傳。爲了維持正常的行政系統，我們不能不講求應付之道」。

我接着問，「應付」的辦法如何？他說：『正是爲這個，所以我們要實施新政策。我們認爲，對於共產主義的活動，最好的應付方法，决不是盲目的反對或征服，而是健全自己的民衆組織，改善民衆生活的弱點。我們應該說，共產黨的動機雖可批評，其技術與精神上之優點也是無可否認的。本戰區迫近陝北，看得格外清楚，所以我們便提出一個口號，叫做「革命競賽，眞理戰勝」。我們願意友誼地和共產黨競賽一下，用事實來證明那一方的理論合乎眞理。』

這一段談話坦白地表露了此間當局實施新政的動機，也最可以表示山西省今日的處境。現在特別抄在這裏，作爲本文的結語。

延安道上

五月三十一日清晨，我們告別克難坡，在馬上走了八小時的旅程，下午五時到達過河入陝的平渡關。

這一天，我們全部時間沿着河岸北行，時而放馬奔馳，時而挽轡緩步。有時迂迴山徑，路狹谷深，免不了有些戰戰兢兢，然而一到了河岸沙灘平闊的所在，我們便可以放開馬來儘情馳逐，童年的好勝心理在我們身上復活了，大家爭着向前跑，簡直來不及仔細領會黃河沿岸的壯美景色。

一直到了渡頭，下馬候船，我們才得到半小時的休息，就躺在河邊。我們見到血紅的落日，聽到黃河的吼聲。而在黃河西岸的那一邊，陰沉沉的為陽光所照不到的地方，就是我們所要處的涼水崖。

渡河只費十分鐘的工夫，踏上陰暗的沙灘，有三個穿青布學生裝的男人前來迎接，我們知道自己到了共產黨所統治的地界，不自覺地緊張起來、再看這三個接客的人，除了通報姓名說明來意之外，再也不肯多說一句話，更使我們感到異常沉悶。

陽光已經離開地面，我們不出一聲，跟這三位沉默的接待員向山坡上面去，在那裏，有一所包括四個窰洞和一個大院子的地方，便是我們今晚住宿之處。

在緊張而又興奮的心理中，我們進入這所臨時的宿舍，一看，除了幾張板凳，什麼設備也沒有。接待員讓着我們『請坐，請坐』，我們游疑了一會，只好席地而坐。接着，有人送茶來，茶具是兩隻開水壺和幾十個粗碗。碗少人多，大家這時毫不客氣，搶起來喝了。

晚餐相當豐富，雞蛋，肉片，一缽子一缽子的送來；却因爲沒有棹子，我們只得站在院子裏吃。一位外國朋友很幽默的說：「我們做了半個月的貴賓，今天開始做難民了」，他當然並無不滿之意。

大家聽了這句話，不禁狂笑，笑的作用是偉大的，這幾位共產黨員，一直保持着沉默，也在這一陣笑聲中，開始和我交談起來。他問我對這一塊最初踏入的邊區土地有些什麼特別的感受，我不禁脫口而答道：『到這裏，我們不得不放棄我們的紳士架子了』。

雍容揖讓的紳士禮儀，在這裏失却效用了。這裏所要求的是眞刀眞槍的吃和喝，疲倦了便坐在地上休息，這種無拘束的生活，使我們不自覺的也有點粗野化起來。

第二天早晨，當我們準備出發時，十八集團軍三五九旅的王震旅長帶着一大批的牲口趕來接我們。

說起這位王旅長，在邊區是大大有名的，他是湖南人，四十多歲，平漢路工人出身，又是老幹部；當年二萬五千里長征時，揮着朱德的大旗，開路通過大雪山的就是他。然而，除非經過介紹，你休想知道他是這樣有名的紅軍軍官。穿着和士兵一樣的軍服，沒有符號領章，惟一可以使人辨認他的特徵，只有整天吊在他嘴上的烟斗。

從這裏到延安，我們還須騎五天的馬，王旅長前導，經過許多蜿蜒的山路，上坡下坡，每走兩小時的光景，總可以發現當地的老百姓已經準備了茶水接待我們。大樹蔭下，駐馬牛飲，是我們這一路上最愉快的享受了。

馬上的趣味漸漸單調，一路都是山地，人烟稀少，草木不生，使我們感到這裏特別一點的景象，就是沒有荒地，幾乎沒有一處是荒廢的，所有的山地都成了田陌。我直感到邊區的開荒運動，確是名不虛傳。

到達臨固，已是上燈的時候，我們這批人被接入縣政府內住宿。說是縣政府，其實

不過是從前一所鄉紳的住宅。

晚上，臨固縣府給我們一頓很合款式的晚餐，陪客的人，有一位是勞動英雄，名叫范富庭。

這一位范英雄，是以耕地的成績被選的，從表面上我不能發現一個勞動英雄和普通農夫有什麼異樣，可是事實上我們知道每一位勞動英雄，都成了農民中的「貴族」，他要負責領導一般農民，同時也不斷的和黨政人員接觸，這一種訓練，大大地提高了他們的自信心，使他們和我們共同聚餐時居然應對如流，毫無一般鄉農的鈍拙模樣。

因為當天夜裏下了一陣大雨。主人方面通知要等路乾了才可繼續前進，所以我們在臨固多住了一天。

這第二天上午，還是淅淅瀝瀝的下着雨，雨天無事，已夠沉悶，何況還在旅途之中，冒雨出去，想看看縣府附近的市面，結果知道這裏本來是一個鄉村、縣政府是新近移來的，除了十幾戶農家，根本無市。

雨中眺望了一會，只有三五個鄉農蹲在大樹下抽着旱烟談天，縣政府前面數十步，一個紅軍很無聊的在那裏站崗。

下午雨停，王旅長開了一個茶會，報告他開闢南泥灣的經過。開闢南泥灣，是三五

九旅最得意的一件事，也是王旅長最受延安當局寵信的一件事。

六月三日到達延長。

延長縣的焦縣長，也可以算是這邊的名人之一。他是從土地革命時翻身出來的幹部，現在趕着幹生產運動，他親自參加担養、翻地、鋤草、收割。這一般事情，林伯渠先生曾在邊區政府提出報告過。

縣長是否應該担糞，這是值得我們考慮的問題，不過邊區裏有這麼一位縣長，也是我們應該知道的。

在延長的第二天，參觀延長油礦，油礦雖然很有名，但因爲技術落後，產量不多。從延長到金盆灣這一天的行程，是我們途程中最美麗的一段。這一天經過許多谿谷叢林，飽領峯迴路轉之美，每一個谿谷都鋪着勻厚的青草，每一個谷口都堆着幾片花雲，當穿過某一處茂密的森林時，同行的楊君還發現兩隻金錢豹的蹤跡。

下午四點鐘，出了叢林，以後便是平坦的大道，我們放開馬來大跑特跑，一會兒就到了西村。馬背的旅行結束了，在此換乘卡車，五點鐘的光景，在金盆灣王旅的旅部下車。

金岔灣原來是一個荒村，經過開荒的努力，現在已有市面。我們到時，斜陽滿山，田陌如織，晚餐以後，王旅還舉行一個月光會歡迎我們。就在這淸涼的月夜，我第一次欣賞秧歌，也在這鑼鼓聲中，我們接到開闢第二戰場的消息。當王震旅長宣佈這個佳音的時候，全場鼓掌歡呼。在這一陣興奮中，我相信在場的人，無分中外，不問黨派，欣慰的情緖是一致的。

在差不多一星期的行程中，王震旅長始終照料着我們，因此，我們對於他的爲人，也逐漸增加了認識。他是直爽人，可是有一點陝北人所說的「牛皮氣」。在延長，曾經爲了一場辯論而對某幾位記者發生了不愉快的情感，在金岔灣的第二天，這種情感似乎還在繼續增長。平時的隔膜使我們和邊區人士之間失却互相諒解，因而王震旅長的過於直爽的表示，一時頗使我們感到拘束。這一場小小的誤會，一直到延安之後，才得到解消的機會。

但是在照拂我們這一方面說，王震旅長並不是一個難於接近的人，我想，一個喜怒立刻形諸顏色的人，也許比那些不可捉摸無表情的人來得容易理解些罷？

在金岔灣宿一夜，參觀傷兵醫院，在參觀時每一個醫務人員都向我們說明藥品之缺乏，這種基於人道理由的申訴，加上擺在眼前的傷病呻吟，極富煽動感情的力量。幾位

外國朋友顯然受了激動，王旅長和他的隨從，激昂地演說，要求記者團對這事有所表示。外國記者中的普羅金科，愛潑斯登兩人，提議電請政府運輸藥品。最後我們表示對這裏的傷兵醫藥問題，甚爲同情，但藥品缺乏，則是全國共通的現象，我們願意在記者的崗位，把這邊的情形傳達給政府，請求注意。

除傷兵醫院之外，王旅長還引導我們去看他們的步兵營和砲兵團，他讓我們看了許多從敵人手裏奪獲的武器，有三八步槍以及各型的山砲。他們的參謀人員和連排長，不厭煩地說明每一門大砲的來歷，是在那一次戰鬥，和怎樣的情形下面奪來的，他們努力要使我們相信他們的軍隊是從敵人手中爭奪武器，裝備自己。

在金盆灣先後共留了兩天，在南泥灣幹部休養所又留了兩天。參觀南泥灣軍墾區，是這一路上的最大節目。我因爲貪睡，那天竟沒有去。後來才知道開闢南泥灣是邊區生產運動的大事，便道經過，放却機會，甚覺歉然。

這樣一路上走馬看花，終於在六月九日中午，到達風塵撲面的延安。

踏進延安

延安！延安！在路上揣測了半個多月的延安，終於映入眼簾來了。

車子進入延安，我找尋了半天，不知道哪裏是延安市。這就是延安市麼？在南方，只能算是較大的村鎮罷了。

兩面山坡，中間流着一條溪澗似的延水，東岸展開一條狹長的平地。這就是延安市精華所在的地方。

這裏的山，只不過是一顆青色樹木也沒有的土堆；成百個窰洞挖在山腰，看去好像圍了一條帶子，至於延水，當它枯水期間，則是小孩子也可涉水而過的。它不洶湧，也不輕柔。

小小的膚施縣城，廿九年受過敵機的轟炸，現在只剩下一些牆腳屋基，滿長着青草。延安人澈底放棄了縣城，把市面移到南門外來，就是如今所稱的新市區。

延安古城假如還在，那麼即使不會怎樣光華璀璨，也總有一些幽暗深沉的古蹟舊屋，讓我們憧憬一下悠久的過去，但如今的延安完全是新建的，所有的建築，都是匆匆忙

市的面目來。

忙中完工的，簡單合用，却是粗糙。就是最繁榮的新市區，也處處現出一個未成熟的都市的面目來。

商店的貨物似乎很豐盛，但只限於日用品的若干種，窗櫃的裝飾，純粹是搖鼓担式的老手法。

市面上最可注意的，是打鐵鋪之多，在三百家門面中，打鐵鋪至少要佔五十家。即在深夜，我們還可以看見熊熊的爐火映着赤膊的鐵匠緊張工作。這一點可以充分表現延安還是十足的農業都市。

慣於享受都市趣味的人，到延安來一定要感到悲慘的失望。因爲這裏不僅沒有好山好水，也竟沒有一個可以散步的草坪，沒有一個可以駐足的樹蔭。一眼望去，灰塵滿目；沒有一點鮮豔的色彩。

除了打鐵鋪的丁丁當當，我們只能享受騾馬的嘶聲。那一種粗糙枯啞的音調，和延安的市容到很合拍的。

女性的氣息，在這裏異常淡薄。絕對沒有穿旗袍的女人，絕對沒有燙髮的女人，也沒有手挽着手招搖過市的戀人。一般女同志，很少嬌柔的做作。在服裝上，和男人差別很少。如果誇張一點說，延安大概是最缺乏性感的地方了。

第一天延安給我們的印象，是粗糙，幼稚，然而頗爲剛健的農業都市。

我們這一批記者，都還是第一次到延安的人。在最初的感受和最後的感受之間自有很大的差異。

這裏先說一說我最初的感受。

延安當局招待我們的殷勤，是十分可感的。交際處處長金城先生矮胖近視，足不息步，爲我們奔走接洽，這一份熱情，尤其使我們難於忘却。假如我們只是做客而來，那就應該承認，我們這樣的享受，可算是任何慷慨的主人給予客人的最高待遇了。但我們的目的，顯然不是爲享受，因此不能不對延安方面存着更苛的要求。那便是：信任我們。

而在最初幾天內，從主人的表情，詞令，眼光上，我看出了他們對我們中國記者團，熱情、謙和、殷勤，可是頗有拘束。

因爲我們摸不清延安人在這幾年來所蓄積的心理與感情，同時延安人也不了解我們來訪的誠意與動機，雙方的談話，都不敢放肆。沒有理解，便沒有信任，沒有信任，便不會有坦白的表露；因此，我們不敢隨便提什麽問題，不願發表什麽批評，可是主人方

而又覺得我們只要求參觀而無意見，一味客氣而無所表示，也許反覺得我們的態度近於敷衍了。

在重慶，我是頗為饒舌的，在出發時，我沒有想到國內有一個地方能使我停止饒舌。抱着這樣的樂觀與自信而來，延安人的拘束態度，使我不能不自制，不能不閉嘴。而這種不敢饒舌的經驗，一方面威脅着我個人的自尊心，一方面也動搖了我這一回旅行的興趣。

有時，我也和延安方面的幹部交談，愼重觀察他們的顏色，細心體會他們的語意，時時刻刻警戒着自己，不要跳出合適的範圍。再也沒有比這種談話更乏味更苦痛了。在整整一個星期中，我們都在茫然之中過去；我敢說，假如我們所停留的時間只有這一星期，則我們這回的訪問，將不僅徒勞，一定還要帶回嚴重的誤會。

幸而在一星期後，主客之間，終於逐漸了解，談話和交際在黑暗中摸索前進，我們終於懂得這邊的感情，並且看出共產黨在這邊所做的一切，雖然不盡為我個人所喜歡，却不能不承認其若干事情的強處。

現在，我特別寫出這一段最初的感受，證明有許多不幸是「誤解」造成的，也證明誤解是可以由合理的態度消除的。

毛澤東先生訪問記

毛澤東先生招宴，是在六月十二日下午六時，那天早上便發來了淺紅色的請柬，招待人同時說明，希望我們在下午四時就去，爲的在晚餐之前可以先和毛先生作長談。

對於一個中共領袖的宴會，我們是沒有理由敢於遲誤的，大家都準備好了，上車的時候，我發覺自己穿着新買的涼鞋，又是赤足，未免不鄭重，而頗想去穿一雙襪子，但招待人堅決的保證說，毫無關係，「到了那裏，你將發現比你穿得更隨便的人。這邊是不講究這些細節的」。

渡過清淺的延河，駛行了十分鐘，在山谷中露出一所長方形的洋式建築，那便是中共辦公廳和大禮堂了。再駛近一看，環繞着這建築的山腰，排列着無數的窰洞，那是辦事人員的住宅，車子一直駛進大門。門口站着兩名衛兵，是我到陝北來所見到的最整齊的紅軍。

我們被引導入大禮堂後面的客廳休息。

這個客廳，也是延安最漂亮的了，又長又寬，兩邊陳設沙發，中間是一排可以坐四

十個人的丁字形桌子，潔白的桌布，擺着鮮花，壁上除了四大領袖的肖像外，還有兩幅巨大的油畫分掛兩邊，一幅是史丹林委員長，另一幅是毛氏本人的。

客人們紛紛到來，各找着對手談話，我發現許多延安幹部穿着草鞋來會見他們的領袖，這頗使我安心。因此，我也就坦然靠在沙發上，依着我的習慣，伸着赤裸裸的兩隻脚，點上一支此間最名貴的曙光牌烟捲，解除了所有做客人的侷促與矜持。

等候了半支烟的工夫，毛先生昂然走進來。

由周恩先生介紹，毛先生和我們一一握手。

身材頎長，並不奇偉。一套毛呢制服，顯見已是陳舊的了。領扣是照例沒有扣的，一如他的照相畫像那樣露着襯衣，眼睛釘着介紹人，好像在極力聽取對方的姓名。

談話時，依然滿口的湖南口音，不知道是否因爲工作緊張的緣故，顯露疲乏的樣子，在談話中簡直未見笑顏。然而，態度儒雅，音節清楚，詞令的安排恰當而有條理。我們依次聽下去，從頭至尾是理論的說明，却不是煽動性的演說。

這就是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毛澤東先生。

聽取談話中，我有更多的餘暇審視他。濃厚的長髮，微胖的臉龐，並不是行動家的模樣，然而廣闊的額部和那個隆起而端正的鼻樑，却露出了貴族的氣概，一雙眼睛老是

向前凝視，顯得這個人的思慮是很深的。

談話會大約繼續了三小時之久，先由毛先生說一段話，再分別答覆各報記者提出的問題。

九十分鐘的話，如拼作一句講，就是「希望國民政府，國民黨，及一切黨派，從各方面實行民主」。他認爲惟有在民主的基礎上才有眞正的統一，也惟有民主的政治，才能發揮最大的力量。這種議論本是我所預料的，我並不感到多大的驚異。使我覺得意外的，倒是他的詞句異常的審愼平易，語氣雖堅決，可不像一般延安朋友那種「張脈僨興」的樣子。我當時想，假如把毛先生這一番關於民主的談論摘出來，放在重慶任何一家報紙上做社評，也不至於引起特別感覺的。事實上，對於民主的原則，我們任何人間幾乎沒有什麽異點可資辯論，至於民主的程度，以及這一黨對於那一黨派所施行的民主作怎樣的估計，那就難說了。

一邊想着，一邊傾聽，日色漸漸向晚，通紅的夕陽映得滿堂輝煌。我一眼看到毛先生背後的油畫上，史丹林委員長左手倚着桌子，伸着右手，攤着掌心，眉飛色舞地面對我們，似乎在雄辯，又似乎在向我們說教。

這時候，一種思潮驀然在我腦中起伏。史丹林不是一個偉大的坦白的現實主義者麽

？他從來不創造什麼空中樓閣的漂亮議論，他的議論一貫是爲現實的鬥爭而存在的。所以我們對於承受史丹林作風的中共領袖們的議論，與其從議論本身去理解，實在還不如從他們環境的需要去理解——只有這樣，才易於接觸眞相吧！

晚餐以後。我們在大禮堂看戲。

這是由此間的平劇研究院演出的，演的是『古城會』，『打魚殺家』，『鴻鸞禧』，『草船借箭』四齣。

對於平劇缺少修養的我，這四齣戲，算是比較能夠理解一點的，在開幕前的鑼鼓聲中，我靜坐在最前一排，胡亂地思索着這四齣平劇是否也有共產黨的宣傳意味，『打漁殺家』之爲革命劇，大概是無異議地可以通過了。『鴻鸞禧』是否表現戀愛與物質環境的關係？『古城會』有沒有強調關羽精神？而『草船借箭』是否有類乎此間所傳說的游擊戰故事？

用這類的眼光來看戲，本是大殺風景的事；以這樣的觀點來評戲，實在也是很幼稚的，但在當時，却無論如何驅逐不了這樣的思攷。在不知不覺中，忽然發現坐在我右側，和我並肩的，正是毛澤東先生。

一時，我有點感到侷促，但立刻便覺坦然了。因爲此時見到的毛先生。並不是今日下午坐在主席位上肅然無笑容的人，而是一位殷勤的主人了。大概是吃了幾杯酒吧，兩頰微酡，不斷地讓茶讓烟，朋友似的和我們談話。

戲早已上演了，他非常有興味地聽，看，從始到終。對於「古城會」的張飛，對於「打漁殺家」中的教師爺，對於「鴻鸞禧」中的金老頭，對於「草船借箭」中的魯肅，他不斷的發笑，不是微笑而是恣意儘情捧腹大笑，當演出張飛自誇「我老張是何等聰明之人」那一副得意的神情時，當教師爺演出種種沒用的醜態時，當金老頭在台上打諢時，他的笑聲尤其響亮。

在這時，我理解到毛先生是保有和我們一般人所共通的幽默與趣味的。他並不是那些一讀政治報告，便將趣味性靈加以貶斥的人物。他雖自謙「對於平劇沒有研究」，但也承認：「很喜歡看看」。

散場時，已經夜十一時，毛先生以微笑送客。在歸途上，缺月銜山，淸光似水，朋友問我今天得到了什麼印象，我明快的答道：

「完全出乎意外的輕鬆」。

在這裏，不妨帶便談一談我對於毛澤東先生的印象。

不管我們喜歡不喜歡，毛澤東目前在邊區以內的權威是絕對的。共產黨的朋友雖然不屑提倡英雄主義，他們對於毛氏却用盡了英雄主義的方式來宣傳擁護。凡有三人以上的公衆場所，總有「毛主席」的像，所有的工廠學校，都有毛氏的題字。今年春節，延安書店所發售的要人圖像中，毛氏的圖像不僅超過其他要人的圖像，而且是兩三倍的超過。

「毛主席怎樣說」，雖然不是經典，但是『響應毛主席的號召』依然是邊區幹部動員民衆的有力口號。毛澤東說一聲「組織起來」，於是通過幹部，通過報紙，以至於無知識的鄉農都說「組織起來」。口號標語是共產黨宣傳工作的有力武器，而毛先生所提的口號。其魅力有如神符，在工農份子眼中，『毛主席』的話是絕對的，保險的。

自然，單從宣傳的作用上去理解毛氏的權威，是不是公道的。在造成毛氏權威的因素中，他本身的特點也決不能抹煞。他本身的特點在那裏呢？我曾以這個問題就教於許多共產黨人，同時自己也冷眼的觀察，綜合起來，可以這樣說：「毛澤東是一個最能熟習中國歷史傳統的共產黨行動家！」

我們知道共產黨是舶來品，在過去所有的共黨領袖中，都有一個共同的缺點。那就是原板翻印共產黨理論，却不知道怎樣活用到中國的社會來。在以農民佔大多數的中國社會，這種作風的不受歡迎，是無可避免的。毛澤東則不然，他精通共產黨理論，而同時更熟悉中國歷史。據說，從中學生時代起，歷史是他最喜歡的課程，在他的行動中，資治通鑑和列甯史太林的全集有同等的支配力。中國的史書包括許多統治民衆經驗，同時也指示許多中國社會的特性，精通了這些，然後可以知道在某種程度以內尊重傳統的力量，或利用舊社會的形式，以避免不必要的摩擦：此外，再加上共產黨所有的組織宣傳，以及列甯史太林的經驗，毛澤東成功了。

邊區有許多事實可以證明上面的論斷。這個有機會時再說，我現在先提一兩件小事爲例。

在我們想像，邊區一定是共產理論像洪水一樣泛濫的世界。然而不然，馬列主義固是邊區的基本思想，但已經不再以本來的面目出現了；因爲現在邊區馬列主義已經照毛民所提的口號化裝過，那便是「馬列主義民族化」。換一句話說，馬克斯和列甯，不再以西裝革履的姿態出現，却已穿起了中國的長袍馬褂或農民的粗布短襖來了。小如變工隊，秧歌隊，合作社，大如新民主主義，我們都可發現，是馬列理論的內容和民族形

式的外衣的綜合品。在邊區，開口馬克斯，閉口列甯，是要被笑爲落伍的表現的，「打倒洋教條主義」是他們整風運動之一點，毛澤東給共產黨員的教訓，是在尊重農民社會的舊習慣與舊形式之中播種共產黨的理論與政策。

毛先生另一點長處，是綜合的工夫。不論是一場辯論，不論是一個問題的檢討，他最善於綜合各種意見，而做一個大家認可的結論，或者綜合過去的經驗，而決定以後的方針，這種工夫，也不妨解釋爲熟讀史書的成就。

我無意介紹共產黨黨員對他們領袖的印象，因爲他們的批評或者有溢美之處。我也不想在這裏判斷毛氏在政治上的功罪是非，因爲這是頗費口舌的工作。我現在只分析了毛氏比他們的一般幹部有什麼特別優長之處，這是每一個關心國事的人們所應該知道的。

朱德將軍的招待會

朱德將軍招待記者團，比毛澤東先生的招待會還早兩天。地點就在副長官部所在的王家坪。

延安市街上是舉目無靑的。王家坪副長官部的園子裏居然有二三十株不算很小的樹木。樹蔭下擺着二十來張矮桌，採取露天茶園隨便談話的方式。這天被邀參加的人相當多。雖然主人是軍方，其目的却在讓新來的記者們，多多認識延安人物，所以陪客之中，差不多已網羅了延安軍政黨三方面的名流。

朱副長官年逾六十，雖然是久經風濤的人物，可是樸素如鄉農。一套軍服穿得總不合身。招待客人時，帶着笑容，很少說話。

比朱副長官更不會說話的是林彪師長。他穿的不是軍服，而是平整的學生裝，面容蒼白，看起來與其說是帶兵的軍官，不如說是剛出校門的大學生。他不僅沒有和我們交談，並且露出憂鬱傷心的表情，眼睛老是向地下看，似乎有意避免他人的煩擾。

賀龍師長和林彪師長恰成極端的對照。他有軍人的儀表和氣概，有一撮鬍子和一副

方正的面龐，說話的態度非常憤激，頗有做慣了指揮官的威儀。他是師長，兼任留守兵團司令，又是聯防司令，在邊區掌握實際的軍權。

我們還在這裏會見了邊區政府副主席李鼎銘先生。他年已老邁，瘦得可怕，門牙都已脫落，戴着一副大框的眼鏡，幾乎要佔去他臉孔的二分之一。有人說他在前淸中過舉，但是他自己不承認。他很客氣的說；「風燭殘年，早該息影田園了，只是爲着大衆的事，不能不出來服務」。他是陝北米脂人，帶着濃厚的鄉音，頗不易懂。後來有一回，他曾對我們大談其易經，使我們記者團中最有經驗的記者，也爲之擱筆。

對於不懂易經的朋友，博古先生總可以成爲談話的好對手。他是「下江人」，一口上海官話，笑聲爽朗，議論風生，很有勾引對手交談的本領，可是對於我們記者，從沒有提起馬克斯列甯的理論。他是共產黨理論家之一，解放社社長，掌握着全邊區的出版事業。

那天的聚餐採用中菜西喫的辦法，四個人一桌，聚餐後我們接着參加音樂晚會。

音樂會由魯迅藝術學院及西北戰地服務團演出。大小節目三十個，其中包括西洋現代的戰歌，陝北的民歌小調，以及他們非常自負的「黃河大合唱」。

那天我們最感興趣的，還是民歌這一部份。

照我們沒有音樂修養的人聽來，西洋歌總是那個樣子，好聽，而不親切。不親切，就是說沒有鼓動陶醉的力量。本國的民歌就不然，那全是我們自己的鄉村情調，所有民歌中所含畜的感情趣味，全是我們所共通的，雖然音節比西洋歌簡單，對於聽衆的移動作用反而大些。

音樂假如要向民衆開放，民歌無疑的還有利用的價值。

黃河大合唱是一隻大鏡頭的歌曲，裏面分六個小節目，有獨唱，合唱，對唱，表現平靜的河邊生活，也表現雄偉的黃河吼聲，而以暴風雨一般的「保衞黃河」「怒吼吧黃河」兩個節目結束。所用樂器，中西雜陳，鑼鼓在這裏顯着最大的效果。但是，這種演奏對於外國朋友的耳官似乎不大適宜。外國人受不起這樣的噪聲，甚至批評黃河大合唱是「喊出來而並不是唱出來」的。

在延安幹音樂工作的，主要是魯迅藝術學院的音樂戲劇系。但是，像那天晚會這樣大的演奏，在延安也是不容易有的。他們的音樂運動重心在歌詠，因爲這個容易普及。爲了普及，自然特重民歌。舊曲新調，非常流行，就是新創作的曲，也都脫不了民歌的氣息。樂器方面，鑼鼓琴簫和鋼琴梵啞林合奏，也頗覺別緻。有一個創作的歌名「慶祝、

勝利」，中間還利用「嗩吶」表現歡樂興奮的情緒，據說在民間很受歡迎。音樂本來是藝術中最貴族化的，有些音樂家甚至以爲「曲高」一定「和寡」，普及的一定不是有價值的，倘依這標準來批評，那麼延安的音樂運動是粗野的；可是，延安人爲了政治的理由，甯願遷就民衆的趣味以求普及，使得音樂發揮了「羣」的作用，也是事實。

民衆大會

六月十四日是我們是延安居留中最不平常的日子，因爲那天是聯合國國旗日，延安舉行民衆慶祝大會，我們借此也參觀了他們羣衆運動的場面。

會場在北門外的文化溝，兩邊斜坡，是天然的看台，中間平坦，分設主席台和指揮台，主席台前面聯合國國旗以八字形向前依次豎立，另外有一幅巨大的中原戰事形勢圖，平鋪在主席台之下。

那天到會的人數，據宣佈有四萬人，在開會前，先進行各種半娛樂半宣傳的活動，我們到會時，一種「活報」名「開闢第二戰場」的正在上演。這是一種化裝的宣傳，上場的有希特勒與東條等，劇情是無須敍述的，總之，是採取時事，加以渲染，表現希特勒東條的狼狽。其性質正如「活報」兩字，是準備給不識字的羣衆以時事知識。

活報之外，還有秧歌劇「一朵紅花」，由魯藝演出。此外有些民衆秧歌隊，和打四川連響的，也各據一方，吸引一部份觀衆。

會場內情形確是熱鬧，鑼鼓和人聲溪在一起，使得沒有興趣參加集會的人，也不禁

要擠進去看一看。事實上，造成這種熱鬧的氣氛，正是吸引羣衆的一個巧妙的方法。

然而最使我們外來人感覺興趣的，還不是這些零碎熱鬧的歌曲，而是一隊一隊的自衞軍。他們一律白衣黑褲，頭包白巾，身佩馬刀，手執紅纓槍，這一切，使我們看來，好像是傳奇中的人物。他們是邊區武力中最低層的一種，平時不脫離生產，戰時也只是參加後方勤務，維持他方治安。

我不能在這裏多敘那天開會的情形。因爲宣佈開會以後，意外來了一個大題目，吸引了我們全部的注意力，使我們忘記了留心大會別方面的情形了。起初，我們以爲是一個通常的慶祝會，臨時我們才知道大會的主題，並不在慶祝，而在「保衞西安，保衞西北」的口號，這個口號，配合着中原會戰之後，靈寳緊張的時機，對於羣衆確有刺戟的作用，當場沒有一個人知道正當開會的時候，靈寳軍事已在好轉，但卽使我們知道，也無法教大會的羣衆安靜下來。因爲有的在演說中間，羣衆一受暗示，便高呼口號，聲震山谷，就是指揮台上的總指揮，也難於制止他們。我老是聽見總指揮台上高喊「不要喊了，同志們！」。無如這一隊的呼聲停止，那一隊的口號又起，此斷彼續，一個人的演說總要打斷好幾次。要不是最後天上洒下雨點，提早結束了這一場集會，我眞怕台上總指揮的喉嚨都要喊破了。

關於邊幣

到延安後，除了入地生疏以外，使我們最感覺強烈的客地情調的，就是我們每日接觸的「邊幣」。

邊幣的印刷並不漂亮，但是票面的數字很可滿足我們窮書生的消費慾。有一次我隨便買一些泥娃娃之類的小玩意兒，就花上了萬餘元，這對於我們完全是新的經驗。

拿着邊幣，我同時還發生一種下意識的「優越感」。在重慶，在西安，我只覺得法幣的身價在下跌；在延安，居然發現還有一種貨幣比法幣的身份更低，一千元的法幣可以變成八千五百元邊幣！這就使我感到法幣的「優越」，正如在重慶使用美金者的「優越感」一樣。

然而，這一切都是我們對於數字的幻覺，因爲我們是依賴法幣生活的，所以對於數字看得特別認眞。延安人却不然，他們並不十分重視貨幣問題。他們不承認貨幣是生活上最重要的東西，在別種事情上，他們不肯吃虧，不肯自降身份，可是在邊幣上他們毫不在乎地容許從最初的一比二跌到今日的一比八點五。他們不承認邊幣的發行，是出於

什麼政治的理由。邊幣只是「必要」的產物，這個「必要」，可以有兩種解釋：其一，為了保證邊區的生產可以受邊區當局自己支配，為了嚴密管理邊區和邊區外的物資流通，所以有限定用邊區自己的一種貨幣以交換物品的必要；其二，為了促進生產與辦實業，邊區需要一種籌碼，而這種籌碼既不能由外邊供給，那就不得不由自己來印刷了。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邊幣的作用，主要的是公的：而在私經濟方面，邊幣和延安人的生活遠不如法幣和重慶人生活之密切。因為他們的一切工作人員的生活，並不依賴薪資，而靠着實物的「供給制度」，他們自然感不到貨幣問題的迫切。一般農人，有的是自己生產的米麥，貨幣的漲與落，他們也毫不在乎。嚴格地說，延安人計算的標準，不是邊幣若干，而是細糧幾斗幾石。關於邊幣和法幣的兌換率，除在邊區以外的貿易上成為問題外，在邊區以內絕對不是嚴重的問題。

邊幣這種性質，表現在延安的政策上的是「擁護法幣，鞏固邊幣」。它排斥了法幣的流通，但仍容許法幣向公家兌換，為的他們畢竟還需要區外的物資進口，從遠處看，法幣和邊幣的關係將視他們「自給自足」的程度而定。因此在他們看來，生產問題比貨幣問題、現實得多了。

標準化的生活

我說過，延安一般機關人員對於貨幣看得不像我們這樣嚴重。原因是他們的生活，並不靠薪資而靠供給制度和個人的生產。

供給制度有一個公家規定的標準。這標準依着物資情形，每年都有修正。依據今年的標準，一個人基本生活，如衣食住日常用品，以及醫藥問題，文化娛樂，大體上都有了保障。

但是這種生活品的供給，並不是全部由邊區政府發給的。有的機關，幾乎全靠本機關人員生產來自給，有的機關，自給一部份，另由邊區政府發給一部份。完全自給的如三五九旅，除了不要政府負担外，每年還能繳幾萬担公粮給政府；不完全自給的，如中共直屬的機關，自給百分之四十，政府供給百分之六十，自給的程度，各機關也不一致，大體上，各機關總儘量生產，不足之數由政府負責。

除了基本生活，以外的消費就須靠自己生產。所以，每一工作人員的生產，可以分爲兩部份，一部份爲本機關生產，一部份爲自己生產。因此我們可以說，延安各機關學

校部隊工作人員的生活，大體是標準化的，卽有差異，距離也不會過遠。至於發生差異的情形，只有下面三種：

第一，是供給標準上規定的差異，譬如食米，機關幹部每人每天一斤三兩，部隊每人就有一斤八兩。高級幹部每人每月吃肉四斤，普通幹部每月每人吃肉二斤。技術人員每月另有五千元邊幣的津貼，普通人員就沒有。

第二，要看本機關的生產情形，生產努力的機關，除了按標準供給生活品之外，還有多餘。這一部份多餘的生產，就可以用在本機關人員的福利上去，或者每人多吃幾斤肉，或者每人多分到若干日用品。

第三，還要看你個人生產的情形。個人生產除一部份歸公外，另一部份是自己可以支配的，當然生產得多些，生活也可以比較好一些。

所以，綜合起來講，邊區政府所規定的供給標準，事實上祇是一個標準。公家並不保證標準以上的生活。但如果機關的生產努力或個人的生產豐足，則超過這個標準的生活也是容許的。

對於工作人員的家屬，能工作的，當然生活照標準保證，不能工作的，公家幫助他們學習生產，而給以一部份的補助。

就我們在延安觀察，一般工作人員的生活享受，雖說有小小的差異，也只是量上的差，而不是質上的異。沒有極端的苦與樂，這件事對於安定他們的工作精神自有很大的作用。

除了生活標準化，延安人的思想也是標準化的。

我在延安就有這麼一個確定的經驗，以同一的問題，問過二三十個人，從知識份子到工人，他們的答語，幾乎是一致的。

不管你所問的，是關於希特勒和東條，還是生活問題，政治問題，他們所答覆的內容，總是「差不多」。

在有些問題上，他們的思想，不僅標準化，而且定型了。說主義，一定是新民主主義第一，這不算奇；可怪的是，他們對於國內外人物的評判，也幾乎一模一樣，有如化學公式那麼準確。

也不僅限於公衆問題，就是他們的私生活態度，也免不了定型的觀念，甚至如戀愛問題，也似乎有一種開會議決過的戀愛觀，作爲青年男女的指導標準。

在延安，我有好幾次向他們表示，這種千篇一律的答案，刻版一樣的思想，是不是

黨和政府有意造成的？

但是，他們一致堅決否認黨和政府對他們的思想有直接的管制，他們承認大家的思想的確是差不多，至於差不多的理由，則由於大家對事實的認識一致，大家對黨策的理解一致。

據我的觀察，他們這種解釋一部份是對，但並不全是，我以為延安人的思想標準化，應該從下述三方面去理解：

第一，我們應該承認他們的生活是差不多標準化了的，因為生活標準化，對於生活的希望，需要，趣味，感情等等也逐漸趨於統一。這是由於生活決定了意識，是自然而然的結果。

第二，我們應該認識他們的小組批評，對於他們的意識觀念有絕大的影響力。所謂「對事實的認識一致，對黨策的理解一致」，就是通過小組討論來實現的。

最後，由於邊區和大後方的隔膜，思想文化的交換陷於中斷，就延安看來，簡直是在閉關狀態之中，許多延安人都向我們申訴過書籍雜誌進口之困難，這使得他們的認識不得不局限於邊區以內所能供給的資料之中。

這種標準化的精神生活，依我們想像，是乏味的。但在另一面，也給予他們的工作

人員以精神上之安定，而發生了意志集中行動統一的力量。

和延安人士接觸多了，天天傾聽他們的理論，慢慢地使人感覺某種氣氛之缺乏。什麼氣氛呢？現在才想起來，缺乏「學院氣」？

延安人不像我們，我們大都是受了正常的教育，而且憑着這種教育在社會上經營職業生活的。我們的教育訓練我們「英美」「大陸」各宗各派的理論，一提起筆來，講壇上的思想學說就不自覺的露出來。

在這一方面，延安人的空氣是淡薄的。當然，延安並非沒有留學生和大學生出身的人。不過我很懷疑他們過去所學的有無應用的機會。他們口口聲聲以羣衆爲第一，少數服從多數，卽有少數的「精神貴族」，恐怕也免不了向羣衆低頭。因此，假如在延安提出什麼英美派，大陸派的學院理論，無疑會飽受嘲笑。他們稱呼些這理論曰「洋教條主義」。一個幹部倘犯了洋教條主義，是免不了要受批評和淸算的。

延安的作家總算不少，據我所知，其中有幾位作家的文藝修養是可以在任何講壇上立足的，可是在我們和他們的文藝性的交談中，他們多深自掩藏，決不提到外國某作家或某一派的文藝理論。他所談的，只是毛澤東先生在文藝座談會上所談的一番話。有一

位作家說：『我們覺得，動不動就搬出外國名字來嚇人，是可恥的』。所以他們情願『大智若愚』。

這種風氣，自然也有其強處。打倒了『洋教條』，所有工作人員都從事實中建立樸素的理論，使得一般人都能了解接受，這無疑的要比那些漂亮然而脫離實際的學院議論有效些。延安人就堅持着這種意見。他們以爲一個大學生學習英美式的經濟學，不若精通邊區的合作社和騾馬大店。

這種空氣同時也有其弱點。因爲摒棄了學院派的學說，延安青年幹部所賴以求知的途徑，只有向經驗探索。雖然他們還保留着「馬恩列史」的學習，但也可以說他們的理論水準，將以馬恩列史的理論爲最高的界線。這結果，免不了要形成偏狹的思想，並且大大地限制了知識的發展。

有一次，我不客氣的把上面這一節感想告訴一位延安人，這位先生的回答很妙：「看情形，我們現在不需要洋教條，所以要打倒它；等我們需要的時候，不妨把它請回來」。

我非常記得往這一句話，這句話是最簡明的表露了共產黨的所有政策，是依着客觀的需要而定的。

延安所最缺乏的空氣是「學院氣」。或「書卷氣」，這個，在前節已經說過了。另一方面，我覺得延安又有一種氣氛，是過於濃厚了，濃厚到幾乎使人窒息。這便是過度緊張的空氣。

生產運動差不多把每一家人都捲進過度的忙碌的生活裏面去了。這雖不是強迫的，却也帶有精神上之強制性。報紙小册子好比球場上的啦啦隊，提高嗓子，向勞動英雄不斷喝彩。每天解放日報第二版上所披露的，十九是生產消息，什麼人半夜就上山開荒；什麼人開荒多少，打破紀錄；那一家的婆姨每天紡紗幾兩；勞動英雄吳滿有的生產工作進行得怎樣；所有這些消息，跟着一陣喝彩的聲音，送到窮鄉僻角去。於是有人向某人「看齊」了，有人向某人『挑戰』了，眞是『火熱的太！』

這風氣，不僅已普遍於民間；就是機關部隊學校以及工作人員的眷屬，也夠得上說努力。所有機關部隊學校的生活供給，多少要自給一部份，個人的零用，更須自籌，所以不生產也實在不行。每個工作人員，在種地，紡紗，捻毛線三者之中，必有一種。每天十一小時的工作，七小時辦公，二小時學習，二小時生產。實際上，有些人爲貪圖收入，生產時間超過兩小時是極普遍的。一星期中，除星期日外，延安街道上的行人眞是

寥寥可數，星期日是頗爲別致的，家家戶戶，掛上國旗，顯得是忙了六天，好讓他們舒暢一下。也只有忙壞了的人，才覺得星期日掛旗祝賀的滋味。自然，這其中還有許多人是犧牲了星期日在生產的。

在延安，我們也參觀過好幾個工廠。所得的印象也是緊張，工作時間普通是十小時，但由於時間排列的緊湊，和精神刺戟的力量，十小時的產品必定不止通常的十小時，這是從「趙占魁運動」的成績上可以看出來的。

總括起來講，忙，實在是延安生活的特徵。因爲過於忙，空氣也似乎過於緊張。緊張的情緒還不止於生產忙，而在「計劃」的嚴格，在機關學校部隊工廠工作的人，差不多每人都有一個計劃。毛澤東，朱德諸氏，也每年在報上宣佈他們的生產計劃；不識字的鄉農，也會有地方的勞動英雄替他們擬訂計劃。計劃的結果，就是一年到頭的緊張。趕不上計劃的被批評，『加油』『超過』的被鼓勵，人類的好勝心被發揚到極點。勞動力的利用也達到了極點。我眞要懷疑延安人除了『忙』以外，還有什麼生活。

特別要附帶一筆，延安的作家們的生活是比較安閑的，雖然他們也生產，却沒有一般人那樣嚴格的義務。

太緊張的工作，太短促的時間，對延安人的精神生活發生了顯著的影響。這影響，一可以說是好的也可以說是壞的。就好的方面說，延安市上很少「閒居終日，言不及義」一種惰民；從壞處說起，則是剝奪了精神的餘裕和生活的趣味。雖然每星期一日的休息權還是被保留的，而每星期六的晚會也多少可以解除一下疲勞，但在什麼東西都帶着新民主主義氣息的情形之下，這種娛樂也無時不給人以緊張之感。它給你的感受，與其說是安慰，不如說是刺戟。

多數工作人員，對於他們的工作都很自信自負，這是唯一的安慰，除此以外，我不能發現他們還有什麼悠裕的心境。一般地說，都因為工作過度而失却了輕鬆的情緒。在我的記憶中，在邊區時從無機會使我們解放開來大笑一場。我們看到的延安人大都是正正經經的臉孔，鄭重的表情，要人之中，除了毛澤東先生時有幽默的語調，周恩來先生頗善談天之外，其餘的人就很少能說一兩個笑話來調換空氣的。至於空閒時間的享受，烟和茶，始終難於令人滿足。酒却很多，有梁酒，有高粱酒。說起酒，我記起了一位酒徒，簡直可以算是「延安的人瑞」了。那是在我們參觀一個酒廠時，在那個蒸溜燒酒的地方，遇見的一個老工人。他坐着看管，手裏就拿着一小瓶的酒，插一支竹管，不斷吸啜，兩頰通紅，醉態陶然，一面只是笑，不斷地自讚「好燒酒，好燒酒！」據管事的告

我們，這位老頭子是整天喝酒，每天在醉鄉中的，外面什麼事他都不曉得。據我個人的感覺，全延安恐怕只有這個酒徒還能保有他自己的悠閒的享樂——大有你們忙你們的，我還是喝我的酒的意思。

我們很知道，延安是一個緊張工作的社會，一時忙於衣食，還沒有工夫理會細膩悠閒的享受。所以我寫了這一節，其意不在批評，而在報導延安生活的一方面，自然，人總是人，在長期的緊張生活中，總免不了感到枯寂單調。就這點說，我覺得這樣的延安生活是不能給人以滿足的。

共產黨員

進入邊區以後，首先使我們注意的，當然是共產黨員。共產黨員是怎樣的一種人？一個共產黨員要具備怎樣的品性和氣質？這是值得我們知道的。

我不能依照共產黨的資料來解釋這些問題，以我們非黨員的地位來觀察，有的地方雖然不免隔靴搔癢，但也許能夠比他們自己所說的客觀一點。據我看來，共產黨黨員，除了他的黨員身份以外，就很少有他個人的身份。假如世界上有所謂純粹的政治的動物，那大概就是共產黨員了。

再詳細地說，共產黨的最大本領，在乎組織，黨員的最大義務，也就是服從組織。這樣說，似乎很滑稽，因爲天下旣沒有無組織的政黨，會有不服從組織的黨員麽？但是我們應該知道，共產黨之所謂組織，是比我們所說的組織有更大的約束性的。一般政治組織所要求的，只不過是個人一部份自由之讓與；共產黨所要求於黨員的，則是貢獻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自由。換作他們自己的說法，就是「一個共產黨員，應該在任何時候，任何問題上，都要估計到黨的整個利益；都要把黨的利益擺在前面，把個人的問題，個

人的利益擺在服從地位。」這就是所謂「黨性」。而他們還不斷的在厲行「增強黨性」，增強黨性的意義，卽是減弱個性，要求黨員拋棄更多更多的個人自由。

共產黨員並非了不起的人物，倘就知識水準來說，一般共產黨員的文化教育頗使我們失望。就是共產黨本身，也並不絕對要求黨員精通黨義和政綱，他們所要求的是忠實服從；至於頭腦，則最好在進黨之後，由黨來負責教育。這種特別的徵求黨員的態度，是由於共產黨的特性所決定的。他們的黨以工農階層爲基本，所以工農入黨手續特別容易，而所謂知識份子或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人入黨，則比較煩難。因此，一般共產黨黨員的文化水準，不得不停留在一定的階段。

但是我們若就另一個觀點來看，把這些黨員的農工身份來對比他們現在的知識，則我們不能不承認他們的知識，已經提高了許多。他們本來對於國家社會是茫然無知的，而現在接受了共產黨的教育，已多少懂得了一些，正因爲他們先前還未受過教育，所以更易於接受共產黨的教育，而把整個的頭腦定型於共產主義，無條件的接受着黨的指導。

一個知識份子，或小資產階級入黨，就沒有工農入黨那樣順利。第一步，所需要的介紹人要多一些；其次，候補的期間也比較地長。這是因爲知識份子多少有點知識，不

僅「去舊迎新」頗費氣力，就是品性方面，也需要長期的克服工作。

因此，我們可以了解共產黨員的一種特質。是入黨之後，仍須不斷接受訓練。所謂「黨性」之增強，一方面靠組織的力量，同時也依賴那無時無刻不灌輸到腦中來的黨教育，它使得每個黨員，依照黨的要求來改造自己。

共產黨的另一個特異之點，是「精兵主義」。他們固然希望很多的同情分子，可是他們對於所謂同情份子，頗意尊重，努力爭取，却決不信賴。在歐美的政黨，凡是承認黨綱經常贊助黨的人，總可以被接受爲黨員，共產黨則要求黨員必須親身參加黨的組織，整個獻身於黨，他們不以爲所謂同情者或贊助者一定可以成爲黨員。過多的吸收同情分子，對他們是要發生冲淡黨性的危險的。因此共產黨情願在文化水準比較低下的工農之中，選拔堪以施教的黨員。對於黨員出身的成份之重視，共產黨比任何政黨都嚴格些，據說，現在共產黨就在停止招收新黨員的狀態中。

在如此嚴格要求之下，共產黨員還能保留多少的個人自由，是可以想見的。由於黨性，同志愛必然超過對於黨外人的友誼；由於黨性，個人的行動必須服從黨的支配；由於黨性，個人的認識與思想必須以黨策爲依歸：由於黨性，決不容許黨員的「個人主義

」，「英雄主義」，「獨立主義」，「分散主義」，「宗派主義」。

這樣說來，共產黨黨員豈不是精神上的苦行頭陀麼？這個，在我們觀察，確是如此的。但在他們的黨員們，却並不自覺如此。他們認爲他們黨的組織，是集中同時又民主，也就是所謂「民主集中制」。他們自覺民主的一點，是在小組討論或會議中，不管黨員的大小新舊，都可以儘量發言批評。所有黨員的意見感情，在這裏都獲得宣洩。根據他們的原則，黨員中如果有某一種錯誤，則大黨員所受的批評要比小黨員所受的嚴厲些，老黨員所受的責難要比新黨員所受的苛刻些。黨員和非黨員共犯錯誤，對於黨員的處分要比非黨員重大些。再根據他們的原則，黨員相互之間倘有不滿意的情緒：也可以在會議中當面批評責難，却不許在背後攻擊。這叫做「鬥爭」。這一切，使得每個黨員自覺言論自由思想自由了。但在另一方面，批評一經總結，討論得到結果，則每個人都要服從，不能再堅持個人的私見了，這就是所謂民主集中制。

我無意討論這樣辦法的民主程度。因爲我們沒有機會參觀這種黨內的民主批評。不過，這種辦法的作用是不難估計的。第一，它至少給黨員以說話的機會；第二，它也給黨員以認識黨策的機會，使得共產黨的教育能夠實施；第三，它用說服辯論的方式，貫徹上級的決定，而儘可能的避免了強迫與命令；第四，它使得黨內的糾紛，立刻獲得合

理的解决，而不至於積蓄仇恨，形成內鬨。

以一個黨外人來批評共產黨，究竟沒有他們自己人批評的親切。一部「整風文獻」就充滿了他們的自我批評。從那裏，我們可以看出共產黨內也有若干的弱點。但就大體說，共產黨員給人的印象是一個人身加上百分之九十的黨性，再加上百分之十的個性。他們不是了不起的英雄，却是結實的細胞。

共產黨黨員中，最可以作爲代表的類型的，不是那些出了名的模範黨員，而是「女同志」們。從那些「女同志」身上，我們最可以看出一種政治環境，怎樣改換了一個人的氣質品性。

所有延安的「女同志」，不管是本地的還是外來的，倘要考查她們的過去，她們都可以供給你一篇曲折的故事。她們的故事大多是現實的，苦楚的。在到延安之前，她們都是在時代的大風雨中飄泊過來的。她們充分領略過社會生活，充滿着人事經驗，所以再不是那種天眞，脆弱，和易受情感所牽制的女性了。

她們有的來自天津北平，有的來自上海，有的已在各淪陷區工作過，長遠的旅途以及工作的經驗，加強了她們的倔強性。一般說起來，「女同志」的好勝心理，都超過男

的，她們惟恐受到「弱者」的批評，所以尤其要特別表示她們的倔強性格。

另外有一部女黨員，是從工農出身的，舊時代的家庭生活磨折過她們，因而她們此時的急進，也甚於普通人。

所有這些「女同志」，都在極力克服自己的女兒態。聽她們討論黨國大事，侃侃而談，旁若無人，比我們男人還要認眞。戀愛與結婚，雖然是免不了的事情，可是他們似乎很不願意談起。至於修飾，服裝，時髦……這些問題，更不在理會之列了。

凡是女黨員，多在機關工作，家庭生活已經減到非常簡單的程度，所有的孩子都在托兒所或學校裏。在他們那裏，男黨員和無黨籍的女人結婚，是有的；至於女黨員的丈夫，那就一定是有黨籍的人；女黨員嫁給非共產黨的男人，可以說絕對沒有。

有一次我曾放肆地向那邊一位C女士說：「你們簡直不像女人！」

她反問道：「我們爲什麼一定要像女人？」

這種執拗的答辭，竟使我無辭可駁。

政治生活粉碎了她們愛美的本能，作爲女性特徵的羞澀嬌柔之態，也被工作上的交際來往冲淡了。因此，原始母權中心時代女性所有的粗糙面目，便逐漸在她們身上復活了。而我們也可以從他們身上直感到思想宣傳對於一個人的氣質具有何等深刻的意義！

23/A 6

共產黨怎樣做羣衆工作

陝甘甯邊區的人口，大約是一百五十萬，活躍於這塊舞台的共產黨黨員，據說只有四萬人。

四萬個黨員統治着一百五十萬的人民。這就是說，在每一個共產黨員的後面，幾乎有四十個老百姓跟着他走。他們用什麼方法帶着這大批的民衆走上共產黨的道路呢？他們憑着什麼本領，把自己的表情教給老百姓做效的呢？

這照共產黨的口氣來說，就是所謂「領導羣衆」的問題了。

整個共產黨的活動，可以分做兩部份說明：其一是政策，其二是作風。關於共產黨的政策，我將另外說明，關於他們的作風，我們可以大胆加一評語，是「全盤承受蘇聯共產黨的經驗」。中國共產黨是根據蘇聯——也就是列甯史達林兩人的戰略來做羣衆運動，來鼓勵民衆從事一切工作的。

執行這樣戰略的人，把「羣衆」分作三部份，其一是「積極分子」，其二是「中間的游疑分子」，其三是「落後分子」。假如把抽象的羣衆描成具體的形象，那就是雞蛋

形的，兩頭小，中間大。換句話說，中間分子最多，積極的和落後的都佔少數。成功的羣衆工作者，「必須善於團結少數積極分子作為領導的骨幹，並憑藉這批骨幹去提高中間分子，爭取落後分子」——這是共產黨對於羣衆的認識論。

根據這認識，共產黨先在羣衆中配備幹部作為「領導核心」。以這個核心為樞軸，轉移四週的羣衆。

這樣，我們又可以把共產黨的羣衆運動，描成天文學上的彗星形，即是幹部作為核心，核心之外，團結着一批積極分子，作為領導骨幹；吸引着中間分子；而在這一切的後面，拖着一條「落後分子」的細長的尾巴。核心是凝結的固體，越到外層，結合的力量越鬆，至於那一條尾巴，則已不是固體而是被固體吸引着運動的稀薄的塵埃。

核心的任務，不僅在團結積極分子和爭取其他分子。它必須通過骨幹，將羣衆中分散零亂的意見願望，集中起來，加以研究整理綜合，化為有系統的方針與意見，而後又向羣衆宣傳解釋，使這種方針化為羣衆的意見，「並使羣衆堅持下去，見之於行動，同時在羣衆行動中考驗這些方針是否正確」，再集中，再整理，再向羣衆推行，循環地轉進，一次比一次增加經驗，一次比一次適合羣衆，這就是「從羣衆中來，到羣衆中去。」的具體說明。

所以做着這樣工作的核心分子，除了須善於「聯繫羣衆」之外，還必須具有分析事實，總結經驗的能力。

以上所說的是他們的「戰略部署」。「戰術」呢？可以說明的有三點：

其一，可以稱爲「攻取據點」。那就是推行某種工作時，除了一般號召之外，負責人還必須選擇若干機關學校部隊，親自指導，個別的具體的觀察情形，取得經驗。再從這些據點出發，擴充推行的範圍。

再一方點，可以稱爲「集結兵力」。那就是「在一個一定的時間一定的地方，只能有一個最中心的工作。」動員全部的人力來突破這個中心工作。次要的工作是可以有的，但決不可以妨礙中心工作的進行。譬如說，生產是中心的工作，而教育與生產不能並行時，他們就暫時犧牲教育，讓那些學齡兒童留在家裏幫助生產。一個縣長或鄉長，可以分別輕重緩急，選定中心工作來做，不想「百廢俱舉」而其實一事無成。

最後一步工作可以稱爲「上下呼應」。他們推動一事，儘可能的避免強迫的命令。普遍的方式總是這樣的：攻取據點，集結兵力之後，在上者一聲高呼，在羣衆中的核心和骨幹，便在各據點向外進行宣傳說服討論批評的工作，鼓勵羣衆響應上面的號召。這一層響應的工作，必須做得十分完美，必須做到由羣衆自已來發言要求的地步，不由少

數的核心分子來包辦。因爲包辦的呼聲只可以敷衍上面的面子，却不能對羣衆發生推動的作用。

這是共產黨推動羣衆的理論，實際做的工作是否有如理論那麼好，因爲考察時期不長，我未能確切判斷，不過，從理論上，我們也可以了解四萬名共產黨怎樣統治着一百五十萬民衆的秘訣了。

幹部政策

如上所述，共產黨的羣衆工作中，幹部的優劣是成敗的關鍵。爲此，共產黨有所謂「幹部政策」。例如「提拔幹部」「配置幹部」「保存幹部」等，都成爲幹部政策中的問題。但是我現在不想談這些問題，一是因爲我們黨外人無從知道他們人事配置的祕密。二是因爲這些也並不是基本的問題。

共產黨幹部政策的基本問題，不在於如何提拔如何訓練，而在他們怎樣造就幹部。我現在可以說，他們所要求的幹部是依着季米特洛夫所定的四項標準來定的：「無限忠心」，「聯繫羣衆」，「有獨立工作能力」，「遵守紀律」。爲造就合乎上面四項標準的幹部，共產黨辦有若干的幹部學校，如中央黨校，軍事學院，延大，魯藝等等。依着性質抽調幹部入學，施行業務，政治，文化理論四項教育。

然而這還是一般的幹部教育，眞正的幹部教育則是在羣衆工作中。

倘說我們社會的人才流動，有如選手制度，卽是各地的優秀份子，一級一級的向上發展，向大都會集中，則共產黨的幹部政策恰是相反。他們的方針是優秀幹部向羣衆中

去，向四方分散開來。

共產黨的幹部中，有一部分幹部是本地工農出身的。他們文化低落，知識不足，可是因爲出身工農，對於地方情形和工農生活非常熟悉，他們的經驗對付羣衆是遊刃有餘的。例如各地有許多縣長鄉長，儘管一字不識，幹起生產運動來却比知識分子內行得多，對於這一部分幹部，黨政當局的方針是，選拔他們到各校上課，提高他們文化理論的水準，然後再放他們回羣衆中去。

另一部分幹部，出身於知識分子，多數還是從外邊來的。他們有理論的頭腦，却缺之實地的經驗。因此，他們的見解不免於「主觀主義」，他們的行動容易脫離羣衆，成爲「官僚主義」。對於這一部份知識幹部，共產黨給了他們一個嚴厲的訓令：「向羣衆學習」。這所謂「學習」包括多方面的意思，不僅要接近羣衆，和羣衆一起生活，學得羣衆的語言與行動，並且要熟習羣衆的思想感情，從羣衆中吸取經驗，使得羣衆認你爲自己人。

這種學習要費很長的時間。倘是大都會來的知識分子，學習的期間至少須得兩年；甚至有許多有名的作家，當我們問他何以缺少作品，他們的回答也是「我們正在向羣衆學習」。

所學習的也不限於農村的知識，就連「小資產階級」的品性，也得在學習之中盡力克服。邊區文協的負責人柯仲平先生告訴我下鄉學習的經驗；「在鄉農家裏吃饅饃，即使給蒼蠅釘過了的，也不可剝皮；和鄉農一起睡覺，即使生了蝨子，也不可埋怨」。蒼蠅和蝨子，是鄉農的好朋友，每一個學習的人，也就得有勇氣和它們成為朋友。

當一個知識分子向羣衆學習，到了農民看不出他一點知識分子的氣味，而認他為自己人時，那麼這個知識分子就可以成為合格的幹部了。他伏在羣衆裏，順從羣衆的心理，用羣衆的語言，而散佈着他們所需要散佈的政策。

文藝界座談會

因爲談到了延安作家的生活，不妨帶便敍一敍六月廿六日延安文化界座談會的情形。

那天的座談會，可與十四日文化溝的羣衆大會先後輝映。延安當局在十四日的大會中教我們看一看延安羣衆的「顏色」；而在文化座談會中，則把延安作家的戰鬥情緒充分表現給我們看了。

那天情形有如戲劇，主演人是吳伯簫和艾青，配角是蕭軍。作爲一幕戲劇來看，主要的觀客是外國記者，並非中國記者。

閒話少說，讓我把那天的情形依次敍下去：

在步入邊區銀行的大樓時，我們看見，已有四十來位作家們在場了。邊區文化協會的領導人吳玉章先生，是那天的首席主人，也已到場等候我們。

起初是很輕鬆的自由談話。中國記者紛紛找他們所要找的人。因爲大家都是第一次見面，所以滿場都是照例的客氣話。

柯伯年先生首先爲我介紹丁玲。

她大眼，濃眉，粗糙的皮膚，矮胖的身材，灰色軍服，聲音宏亮，一有一點像女人

在朱副長官的園會中，我曾向鄧穎超先生談起過丁玲和陳波兒。因此，在其後數日的邊區政府宴會上，主人方面就把她們兩位排在我一席內。但是她們都沒有到。這事丁玲也知道了，所以我們的客氣話就從此事開端。丁玲說明，因爲那天下雨水漲，過不了河。

然後輪到我問話，我就說了「有什麼新作品沒有？很想拜讀拜讀！」這問題，費了她五分鐘的解釋，說是爲了「學習」，一年來很少寫作。末了，她反問我對邊區的文藝「有什麼觀感」？

我率直地說，「我感覺這裏只有共產黨的文藝，並沒有你們個人的作品」，爲了這句話，她又作了五分鐘的解釋，總其言，是「爲了大家服務，應當放棄個人的主觀主義的寫作」。

這時，包圍丁玲的人多起來了，我便轉到座隔去和陳學昭女士談話。

陳學昭女士臉容豐腴，髮髮修整，很別緻的裝束（白羊毛背心外加「茄克」，西裝

襌，青布鞋）。態度嫻雅，一口緩慢而清晰的上海話，依然帶一點「巴黎回來的女紳士」的丰度。

她首先以迫切的態度詢問重慶許多朋友的情形，可惜我於她的重慶朋友竟是一位也不認識，使她非常失望。然後她以低緩的音調，敍述着延安作家的生活，我突然發問，「你是學過西洋文藝的，你滿意於共產黨這邊關於文藝的簡單理論麼？」

她避開了文藝理論，只是披瀝她自己的心境道：「我是學文藝的，當初很想在國內幹些文藝工作，但是回國以後，發現我所學的對於多數人毫無作用，我希望文藝對於民衆能發生改善生活的效果。後來證明這是夢想。因此，我才覺得在求精美的作品以前，有先求通俗與普及的必要。我是因爲這樣，才斷然拋棄了過去所學的。」

我表示所謂通俗與普及，不過是托爾斯泰平民文藝的推繹，而依我的意見，這種理論未免過於功利主義了。倘依這個標準，則如國內有許多作家的許多作品，顯然是不適合大衆的，「你們將給他們怎樣的估價呢？」

他說，那些作品不必爲大衆所理解，却可以作爲「文藝幹部」的營養，所以「我們仍應給以很高的估價」。

我知道，相互的說服是不可能的。在我抬頭思索應當如何換一個題目來談下去的時

候。一眼看見另一邊門旁有一個穿軍裝的男子，面目黧黑，瘦削。輪着小小的眼睛，一聲不響的枯坐着。學昭女士告訴我，那就是成仿吾，剛從晉冀察來的。

料不到這個打鐵匠似的人，就是創造社老將之一的成仿吾。沒有經過介紹，我就找他去了。我知道他久已放棄了文藝工作，也就不談這些。他談了些晉冀察那邊的教育和通過敵區的情形。因爲他正是那邊聯大的校長。他問起郭沫若先生和最近的作品。他說，除了一本「屈原」，其餘的都未拜讀，他希望有機會讀到其餘作品。

這時，吳玉章先生站起來報告，要把大家分別介紹一下。他介紹延安的作家，我們的領隊謝保樵先生介紹記者團。介紹之中，我聽到很多熟悉的名字，歐陽山，柯仲平，張庚等，然而人太多了。無從一一請教。

接着，吳先生顫巍巍地致歡迎詞，他是共黨五老之一，灰白的頭髮，清秀的容貌，前幾天就扶杖來訪問過我們的。他致力於拉丁化的「新文字」，也是延安文化界的最高領導人。他說完了話，柯仲平先生起來報告邊區文化運動的概況。隨後，丁玲女士也上場了。

丁玲紅着臉孔說：有人問他新作品何以如此之少，而疑心到她的寫作受了妨礙，事實並不如此，她是覺得從前的作品不適於現在的新環境，所以還需要學習新的寫法。於

是，她報告了一段過去的文藝活動，以證明她的寫作是隨意的。

當然，她的話並不像我所記載的這樣老實與簡單。事實上她是起來爲這一幕戲劇致開場白。開場白完畢，「鬥爭」劇揭幕了。

第一位上場的主角是吳伯簫。氣勢昂昂地，聲明他每天「照常吃三餐飯，而且是毛紡的突擊手」。

第二位上場的是詩人艾青，長着一副失眠詩人的面孔，睜大了紅眼睛，憤憤地聲明他在邊區很受尊敬，是被聘請的「邊區參議會議員」。

他們說了許多許多的話，一句一句，由記恩來氏的秘書陳家康先生譯成英語，供給外國記者們記錄。

我們中國記者們只是冷靜的聽者，我知道他們正像一個發脾氣的孩子，非要讓他盡情發完了脾氣，是不會停止的。我同時知道這還是一幕戲劇，既然揭幕，一定要表演完場，而到了完場的時候，自然會收梢的。他們的話雖然稍稍失了待客禮貌，但是我們的職務是觀察眞相，而這亦是眞相之一，我們怎可以不冷靜聽取呢？索性再聽下去吧；第三個人是「八月的鄉村中」長大的蕭軍。光頭，黑臉，披着寬大的短衣，大聲宣佈他個人在邊區的「三不怕」，一不怕餓死，二不怕凍死，三不怕敵機轟炸。然後他轉過來問重

慶作家生活和出版界的情形。我們記者給了他一個很簡單的答覆。

情形還沒有緩和下來，旁邊的周揚先生（延大校長）輕輕的問我：「空氣是否太緊張」？我回答他：「空氣倒是小問題，肚皮實在餓極了」。這話提醒了他們，已經是下午二時了。於是，經過成仿吾先生的「晉冀察文化」的報告之後，座談會結束。開始那一頓過了時的午餐。

午餐時的空氣輕鬆得多了。隨意的閒談，逐漸解除了剛才主客之間的僵局。在席上，認識了范文瀾先生。他過去是北平女師大學校長，現在主持延安的歷史研究工作。他溫和的談着這邊的研究工作，仍然是學者的氣概。

酒過幾巡，丁玲現出她湖南人的性格來了。她豪飲，健談，難於介入相信她是女性。但後來我終於發現一件事，證明了她還保留住最後一點女性。當甜食上桌時，他檢了兩件點心 鄭重地用紙包起來，似乎有點不好意思，解釋道，「帶給我的孩子」，然後非常親切的講了一陣孩子的事情。只有在這時，丁玲露出了她母性的原形。

這一頓午餐進行得很快，因為我們知道飯後還招待我們看秧歌，時間已不早，秧歌隊早已等着我們了。

秧歌大會

秧歌這個名詞雖然很熟悉，但我總以爲這不過是民間的小調，未加注意。一直進了延安才知道秧歌在邊區是最被鍾愛的一種藝術。每個延安人都很自負的談起秧歌的成功，你要是和他們談到文藝，他總要問你「看見秧歌沒有？」彷彿未見秧歌就不配談這邊文藝似的。因爲他們如此鄭重的推薦，我對於一向漠視的秧歌，也不能不抱着刮目相看的態度了。延安文化界招待我們的秧歌會，雖然不是我們看秧歌的第一回經驗，但據他們介紹，那天的秧歌都是些代表的作品，是特別爲着我們安排的；那天的演出人員，也是延安最出色的，包括延大和留守兵團政治部的隊員。演出地點就在民衆劇院，劇院的建築完全舊式。長方形的戲園，正面是戲台，兩旁是樓廂，戲台前面的空地和兩邊樓廂大約可以容納六七百人的樣子。但是那天的情形與平時不同。我們主要的看客却被請到戲台上面，居高臨下，秧歌劇則演出在空地上。這並不是特別爲我們的觀看便利而設計的，是因爲秧歌本來是廣場劇，它必須演出在人羣的中央，好讓前左右三面的觀衆都可以看到。搬上舞台，固然沒有什麼不可以，却不免失掉秧歌的本色了。

在談到那天的秧歌大會以前，我想先說一說秧歌的「扭」法。給我們看到的秧歌有單純的「舞蹈」與秧歌劇之分。舞的秧歌約有二三十人，男女夾雜，手舞足蹈，步法大致是進三步，停一下，腰部向左右兩邊轉扭。這樣再進三步，再停再扭，步步轉進。這種秧歌必須人多才好看，大概先繞着廣場扭幾圈，幾圈之後，開始變化，或先後進退或左右互相穿插，形成種種的陣圖如五星八角等形，舞的時候，按着脚步，配着鑼鼓，情緒非常興奮，有類乎外來的土風舞。我們對於這方面的常識雖然太欠缺，但從那種舞風看來，我相信秧歌是一種剛健的民間舞蹈，而且它一定是男女老幼都參加的羣衆娛樂，因爲就現在的秧歌來看，步法雖然大家一樣，姿態却依男女老幼而稍有分別。舉例說，青年人扭得東倒西歪，有如醉漢，中年女人扭得就須端莊一點。

至於秧歌劇，則是用秧歌的步法，加上秧歌的唱詞與說白。沒有佈景，有些動作有如平劇，用手勢來表示。化裝則已話劇化了。

這天的秧歌大會，原定有九個節目，却因爲座談會費時過多，表演的時間不夠，只演出了五個節目，卽是「兄妹開荒」，「牛永貴受傷」，「女狀元」，「張治國」，以及「動員起來」。另外有一個大秧歌舞。看了這幾個秧歌劇，我彷彿已感到延安文藝界的作風是近乎蘇聯電影的。其特點是缺乏性的場面。「牛永貴受傷」表演前方民衆救護

傷兵的故事，「張治國」則表現一位部隊勞動英雄努力挖甘草的情形。這兩件都是實事。「女壯丁」描寫一個努力生產的女人，每天出去指導隣家紡織，而她的丈夫則是頑固頭腦的，很不滿意她走出家庭以外去幹生產工作，後來人家選舉她做女勞動英雄了，她的丈夫才覺悟過來。認爲莫大的光榮，從此改變了態度。情節不過如此，主要的意義就在鼓勵男人放他們的「婆姨」去參加「婦紡小織」。

在五個秧歌劇中，「動員起來」是最有名的，也是他們認爲最成功的。裏面說一個農民叫張拴的，要參加政府所提倡的變工隊，他的婆姨却是不懂事而且小心眼的人。她不懂變工隊的好處，她怕張拴參加了要吃虧，因此兩口子吵了起來，張拴罵婆姨「頑固」要批評她，教她「轉變」。婆姨不服。方在吵鬧之間，村長爲着組織變工隊的事來找張拴，就把變工隊的好處向婆姨解釋；由婆姨提出種種的疑慮，難題，村長一一給以滿意的解決，最後說服了她，她也贊成張拴去變工了。據說變工隊開始組織之時，民間還有許多疑慮，『動員起來』就把民間所有的疑慮，借張拴婆姨的口中提了出來，而一一給以解釋，在各地演出以後，一般農民所不敢提出來的疑慮都消除了。據說有些農民聽到張拴婆姨和村長辯論時，聽婆姨說一句，他們就喊一聲「變不成哩」，聽到村長的答覆，他們又喊一聲「變成哩」，如是反覆「變不成哩」，「變成哩」，一直看到完場，可

見他們觀劇時的心理，已不是欣賞技術而在聽取變工問題的辯論會。觀衆此時的感覺只是切身利害的打算，並不是什麼美的感受。這種劇本，要說它宣傳的效果，是成功的。

延安人最自負的秧歌劇是「動員起來」，但是我個人却以爲「兄妹開荒」的藝術成份最高。這個劇本描寫在山上開荒的哥哥，看見妹妹送飯來了，和她開一個玩笑，在地上裝睡，妹妹以爲哥哥偸懶，正正經經的規勸他，哥哥不但不理，反而逗他生氣，等到妹妹氣得要哭了，他才說明是玩笑。這一場玩笑充分表現出勞動者的愉快與幽默。調皮的哥哥，天眞的妹妹，也極富鄉村的情調，在我看來，比那幾個正面說教的劇本，有趣得多了。我曾經對他們批評過「動員起來」和「兄妹開荒」的優劣，我說：「動員起來」一到了變工問題已告解決，不再被農民所關心時，就不會有再觀看的必要，故其壽命實有時限；「兄妹開荒」則可以說是百看不厭的。

這一天看秧歌的，除了我們記者團，還有當地民衆六七百人，他們一半在樓廂上，一半就坐在地上看，所以我們不僅看到秧歌劇，也把秧歌在民間演出的環境氣氛整個領會到了。

秧歌原來是晉陝一帶的民間藝術。過去是被視爲不足以登大雅之堂的。自毛澤東先

生發表他的「文藝談話」，提出普及問題以後，延安文藝界才開始注意到這個民間舊形式。他們覺得，這個舊瓶很可以裝些新酒，因此就熱烈地幹了起來，第一步是改良秧歌。第二步就是組織秧歌隊下鄉表演。從去年起，延安文藝界幾乎是集中了一切來幹秧歌了。這本來是被摒棄於文藝園地外邊的野草，如今却被抬舉起來，成爲延安文藝界最寵愛的奇花異草了。而且無論在內容與形式上，現在的秧歌與它本來面目，已經大大的不同。原來的秧歌，純粹是民間娛樂，所以內容以發洩民間的苦悶，引起觀衆的興奮與歡笑爲主。所述的故事，自然以調情的爲最多；其次則是諷刺的，譬如形容一個縣官怎樣糊塗，或者敍述一個土紳老爺的醜行，這雖是無意的創作，却正足以表現民衆對於禮教社會的反感與苦悶。老百姓雖然缺乏知識，却不是沒有情感的。他們有愛憎，也有不平和期待。他們在平時所不敢表達的感情，就借着秧歌來赤裸裸地表現出來。秧歌之所以受民間的歡迎。也就因爲它的喜笑怒駡，盡是和民衆共鳴的。

至於現在的新秧歌，則無論從那點來說，都是教育重於娛樂。新秧歌所給與觀衆的，主要的是「應當怎樣」，和「不應當那樣」。它把共產黨所要求的事情化爲故事，再加上藝術的糖衣。因此新秧歌所表現的，當然以生產戰鬥，「擁軍」等等故事爲多。

在形式方面，新秧歌也逐漸由簡而繁。舊秧歌本來只有幾種簡單的形象；有一種是

挑着一對花籃而扭的。叫做「挑花籃」，另一種是一個人掛着一隻船的模型，裝着划船的姿勢而扭的，叫做「旱船」；此外還有「推車」。（這些形象，我們在延安都未見過，所以不知道說得對不對）。新秧歌現在所利用的藝術形象，還有花鼓，高蹺，獅子，這些花樣。花鼓是各人掛着腰鼓邊扭邊敲，大都在二三十人的大秧歌舞中。獅子大概就是舞獅子吧？這回在那邊也未見過。高蹺則和我們平時所見的差不多。另外還有一種，是幾個人抬着一個人表演的，叫做「台閣」。新秧歌除充分利用這些舊形象外，並儘量採取話劇的化妝，有時還加入西洋歌劇的手法，和舊秧歌的面目是一天遠一天了。

秧歌是以唱為主的，舊秧歌的歌曲調子很少，唱來唱去。只有幾十個調子，新歌秧增加了許多調子，除了原有的，還容納了民間小調，道情，秦腔，大鼓中的許多歌曲，這也是新秧歌比舊秧歌進步的一點。

因為秧歌是民間固有的娛樂，新秧歌一面利用舊形式，同時增加許多變化，所以很快的就打倒了舊秧歌，加上有計劃的組織，它的宣傳力量着實可驚。延安力面的作家，除了經常寫作秧歌劇，還有很多親身參加秧歌隊的。他們一面下鄉主持演出，同時再從民間吸取新題材，學習民間語言之運用。在延安經常從事於秧歌工作的，有魯藝的文藝工作團，留守兵團政治部，邊區文協的戲劇委員會等，在去年開展秧歌運動一時

期中，延安共有三十二個秧歌隊，差不多每個機關都有一個。今年春節，延安市上竟成了秧歌大會，表演了近百個劇本，其中大半是民間秧歌隊出演的。綜計現在全邊區共有六百個民間秧歌隊，大的有二三百人，小的也有二三十人。另據丁玲的估計，則邊區人民中，每十二個人裏面必有一個人是會扭秧歌的。

單從宣傳的觀點說，秧歌的成功是無可懷疑的。一位「女同志」告訴我們以她的親身經驗，她說，今年春節，她們的秧歌隊下鄉演出一個宣傳衞生的秧歌劇，這劇本裏面說到一個女人因爲不懂衞生，連接死亡了六個小孩子。事先她覺得在新年時，演出這種不吉利的劇本，一定會招到民衆的反感，因而未免有些担心；然而結果出於意外，許多鄉下婆姨多是死過小孩子的，竟紛紛地將她們拉到家裏去，請教養育嬰兒的方法。恰好她們隊裏有一位女護士，便將衞生的常識告訴給她們，事後，據那些婆姨們的批評說：「你們的秧歌比從前的好。因爲你們的秧歌句句話都是有用的，舊秧歌中看不中用。」

但是，「有用」與「無用」，是否可做藝術評價的最高標準呢？這問題，綜合延安作家的意見，似乎一致認定宣傳力量最大的作品，就是最好的藝術。同時，爲了發揮宣傳的最大力量，必須適合於多數農工的水準。因此，自然偏向於通俗化與普及一條路上

去。也因爲如此，秧歌被限制了只能敍述一些簡單明朗，沒有曲折的故事情節，以便羣衆易於了解接受。這一切，都是根據他們的文藝政策——「文藝服從政治」——的結果。所以除非了解他們文藝政策的內容，我們就無從理解他們何以把秧歌捧到了這樣高的地位。

文藝政策

蘇聯有「文藝政策」，延安也有「文藝政策」。延安的文藝理論，是全盤承受蘇聯的，主要的是列甯和高爾基的文藝觀。這理論的要點，只有兩句話：一，任何時代的文藝，都是帶着階級性的，都是爲着它本階級的政治利益而服務的；二，「無產階級」的文藝家，應該爲無產階級的政治利益服務。

根據蘇聯的理論，毛澤東先生便在去年延安文藝界座談會上，向延安作家宣佈了適用於邊區的文藝政策。他這篇談話，正如他所提倡的文藝一樣，簡單通俗，至今已成爲延安作家們的「座右銘」，他爲延安作家指定的任務，是爲工農兵服務，以工農兵爲寫作的對象，以工農兵爲主要的讀者，其次，他要求作家，熱愛工農兵，熟悉工農兵，並且向工農兵學習語言。要用工農兵所能懂得的文字語言，描寫工農兵的生活。因此，作品的內容，須以政治爲第一，作品的形式，須以通俗爲第一。一種作品，要有「革命的」政治動機，而同時更要有普及於大衆的藝術效果。他的理想作品是「政治與藝術之結合」，他的文藝口號是「從普及中求提高」。一種作品，卽使有很好的藝術，而缺乏合

格的政治意識，則「雖佳不錄」：一種作品，卽使有合格的政治觀點，而缺乏藝術宣傳的效果，那也要「名落孫山」的。旣要政治，又要藝術，旣要動機「正確」，又要效果良好；這樣的要求，無形中指定了延安作家專門寫作通俗化的與工農兵生活有關的文藝。

我很懷疑這樣偏狹的文藝政策，是否將限制作家的寫作自由？一個作家，假如他是工農兵出身的，他熟習工農兵；熱愛工農兵，那麼從他的立場寫他自己所知道的事情，他也許可以「言自己之志，載自己之道」，產生合乎延安標準的作品，但是中國一般作家都是知識分子，也就是祇能同情而未能切實了解工農兵的「小資產階級」分子。像這一類的作家，他如果專依自己的靈感來寫，結果一定是「言自己之志」而未必能「載工農兵之道」。敎他勉強寫那些陌生的東西，結果卽使合於工農兵之「道」，而違反興趣，無「志」可言，在藝術上決非佳作，所以這一類的作家在延安，可能一個字都寫不出來，就是寫也寫不好的。

我曾將這個難題請敎於延安的諸位作家。答覆中以李初梨先生的較爲圓滿。他說：「初到延安的作家，此種困難是不可免的；但如果誠意爲大衆服務，他可以經過一個學習時期，在學習中就能克服種種小資產階級的缺點，逐漸發現工農兵的美點而感到興趣。到了熟悉羣衆之後，他必可以從羣衆中獲得非常豐富的寫作材料，這樣也就是將小資

產階級的感情，轉移到工農兵階級來」。

事實上，延安現在有許多名作家，而作品却未見豐富，據他們的解釋，也就是在「學習」，所以我們現在還不能判斷這種文藝政策的成敗。我們應該公道一點，拭目以待，看他們「學習」以後的作品，再作判斷。

延安有許多事情是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的。譬如魯迅的作品，我們總以爲是應該大受延安人的歡迎的了，而事實上則幷不流行。據我個人在延安各書店的觀察，文藝書籍中，印得最多，或者說銷得最好的，是秧歌，以及其他通俗讀物，其次，有高爾基的小說集（兩種），還有介紹高爾基的書（也有兩種）；魯迅的作品，我非常奇怪，竟是一本也沒有。

但我要說句公道話，延安文藝界並非不尊崇魯迅。我見到他們的作家，談起魯迅都是很尊敬的；然而在目前的延安却用不到魯迅的武器。魯迅的雜文，好像利刃，好像炸彈，用作對付「敵人」的武器，自然非常有效；可是，如果對自己人玩起這個武器來，却是非常危險的。這一種觀點，毛澤東先生的文藝談話中似乎也曾提到過。這就決定了延安文壇對魯迅的態度，不免有點「敬而遠之」。除了有一個「魯迅藝術學院」紀念魯

迅之外，除了在高崗先生的書架上看到過一部紅面精裝的魯迅全集之外；我們實在看不到魯迅精神在延安有多大的威權。他的辛辣的諷刺，他的博識的雜文，並沒有在延安留下種子來。惟一的理由，就是目前的邊區祇需要積極的善意的文藝，不需要魯迅式的諷刺與暴露。要是需要的話，那也只有在對「敵人」鬥爭的時候。

這雖是小事一端，卻很可以顯示延安文藝政策的一種趨勢。

作家的生活

作家生活特別引起我個人的深切注意。

在基本生活方面，延安作家和一般幹部同受着供給制度的待遇，另外還多些津貼。所有寫作上必需的物品，也全由公家供給。至於他們的工作，比較起來，較一般人自由些。他可以自己要求在報紙或什麼研究機關做事，也可以要求下鄉幹宣傳工作。在這點上，延安當局對於作家似乎還存着一些客氣的心理，也可以說比較優待些。

當我想多知道一點他們的日常生活時，多數作家都向我們保證他們生活得很滿意。寫不寫，寫多或寫少，一種作品寫作時間的長短，並無拘束。反過來說，公家雖保證他們基本生活，並不要求一定的寫作，假如他們有作品，所有的稿費和版稅也是私有的。

也有一部份作家，在那裏並沒有一定的職務，同樣可以受到供給。沒有職務的作家，大都就住在邊區文協。據說蕭軍初到延安時，還是自費住在騾馬大店裏，後來纔被請到文協去住。所以邊區文協不僅是文化團體，也是一個文人招待所。

因爲邊區的制度，除了供給制度之外，還容許有私人的收入，所以作家的生活，事實上也有伸縮。紅一點的作家，吃用都在水準以上，在延安時，曾叨擾過蕭三先生一頓飯，那天的酒菜就相當豐富。

多數作家每天也從事一兩小時的生產，不過，這也是順順風氣，聽他們說起來，並沒有必須生產的義務。他們的時間支配，大概可能自主，在緊張的延安人生活中，作家也許還是最不忙的一種人。

安定，可算是延安作家生活的特色。然而，照文人生活的水準來說，他們顯然還趕不上我們在重慶這樣的「享受」。飽暖之外，一般作家所應該需要的小小的奢侈享受，在延安很是缺乏。蕭軍先生所說「缺乏社會生活」，倘是單指這方面的享受而言，那是可以同情的。

延安作家們決不申訴生活方面的問題，可是也有苦痛，那是精神食糧的缺乏。看他們的書架，除了一些幾年以前的書籍外，很少新書。交通困難，郵購不便，是主要的原因；關於這點，幾乎每個作家都曾向我提到過。

邊區文協

邊區文協，是邊區文化協會的簡稱，還是領導全盤文化的組織，至於文藝團體，則原先有一個文藝界抗敵協會，早已和文化協會合併工作了。所以我們可以說文協是以文藝工作爲主的文化界組織。

邊區文協還是抗戰以前成立的，那時從上海到延安文化人甚多，大家要求工作，而延安當局也感到有指導這批文化人的必要，便正式成立了這個團體。成立以後，主要的負責人有五位，有周揚，丁玲，艾思奇，柯仲平，和他們的吳玉章先生。五人中，又以吳老爲領袖，依我們在延安時的情形說，周揚，艾思奇各有本職，周是延大校長，艾是解放日報副刊主編，所以專任文協事務的，只是柯仲平和丁玲兩位。

文協的宗旨，據說有兩點：一、反法西斯；二、團結全國文人，在文協領導之下的，還有四十來個文化團體，其名稱不能悉舉。文協的經常工作是什麼？我們沒有機會詳細採訪，零零星星地觀察，大概它的任務，起初只是爲外面的文化人初到延安，人地生疏，所以[illegible]將他們吸收到文協來，幫助他們的學習與工作。到了毛澤東先生發表了他的

文藝方針以後，文協的工作便全部集中在普及運動之上了。他們在內部組織文化小組，經常創作批評，同時在工廠部隊學校也分佈文藝小組，指導一般文藝青年學習創作，這就是說，延安作家不僅要爲羣衆創作，同時還要將他們的文藝經驗創作技術，無私心地普及於羣衆。在延安時，我曾經細心考查過他們這一項工作的成果。雖然不能說有很大的成功，不過在部隊與學校中，也的確發現了幾位優秀的青年的作品，是值得推薦的。

就這兩年的情形說，文藝的工作顯然又轉換了一個方向，便是從都市到農村。到過陝北的人，當知道這還是一項困難的工作。因爲地廣人稀，羣衆集中不易，再加上農民的保守性，使得文化工作無從下手。但是他們終於想出一個比較滿意的辦法來，那就是充分利用農民所喜愛的舊形式而加以改造。經過改造的舊形式，第一要算秧歌，這個前面已經介紹過了，其次秦腔平劇，也都經過一香舊瓶裝新酒的工夫。在音樂方面，他們利用舊有的「郿鄠調」製作新歌，深入民間。有了作家們經常地供給這些稿件，第二步的工作，就是把這些舊瓶裝的新酒推廣到農村去。担任這項工作的，是幾個文藝工作團和大大小小的民間秧歌隊。由文協直接領導的工作團，據我們所知，有戰地服務團與西北文藝工作團。和文協取聯繫的則有「留守兵團政治部」的文藝工作隊，魯迅藝術學院的文藝工作團，以及民衆劇團，平劇研究院等。這些團體。都時常下鄉表演秧歌，同時就

在農村中隨時組織着民間的秧歌隊。

關於這些文藝工作團的成就如何，我們找不到具體的資料可資說明。現在且舉民衆劇團爲例，根據他們的材料，六年以來，這個劇團獻藝的地區有二十二個縣，下鄉演奏七百四十三場，下鄉時間佔六年中的百分之四十五。其全部觀衆，據估計爲六十一萬人。假如這些材料沒有誇張，那麼我們應該承認這些工作團體對於普及運動，是有相當的力量的。

1 2317 A 7

延安的劇運

在居留延安的期中，延安文藝界展覽給我們參觀的，只有「戲劇」（附註：這裏的戲劇其實並不以話劇爲主）。

丁玲女士曾對記者坦白的就各部門文藝比較其成績，是戲劇第一，通訊報告，速寫一類的作品次之，長篇小說最落後。至於詩歌，則還在尋求出路之中。爲什麼會有這一種不平衡的發展呢？據我看，這並不是作者的問題，而是『宣傳』與『普及』這一個文藝政策所決定的。就宣傳的觀點說，延安對於戲劇的需要比其他文藝更爲迫切；就普及的觀點說，戲劇是直接和羣衆的感官相通的娛樂，也比其他文藝容易深入民間。因此可以說，戲劇不獨是延安文藝中之最有成就的，它並且是延安文藝界的主要活動。有幾位作家，如柯仲平和蕭三兩位，他們本是寫詩的，現在也都轉過來從事戲劇運動了。在各種出版物中也以戲劇爲最多。延安各單位的文藝工作團，他們主要活動也就是演劇，至於主持劇運的團體，在文協內有一個戲劇委員會，委員是周揚，張庚，柯仲平，艾青，趙伯平等。周揚張庚是幹話劇的，柯仲平曾經以很長的時間研究秦腔，艾青最近研究秧

歌。

在各種戲劇中，又以秧歌運動幹得最出色。次乎秧歌的，大概是秦腔平劇曲子戲，而以話劇界爲最冷落。

就中國各種形式的舊劇比較，平劇和民間的距離本來是最遠的，它雖然來自民間，却經過宮庭化而成爲士大夫階級的娛樂，用它來表現民間生活，似乎不大適宜。可是延安文藝界並沒有鄙棄他，他們認爲平劇雖然不適於表現人民大衆的生活，却可以表演歷史故事，給民衆一種新的歷史觀點。延安有一個平劇院，經常的工作就是改編歷史劇或創作新的平劇。有特別的機會，他們也正式出演，聽說毛澤東先生就是主要的看客。平劇院中的人材相當複雜，有科班出身的，有票友下海的，也有的是平時的戲迷在那裏甘願當跑龍套的。有一位楊紹萱先生，在北平聽二十年的戲，現在也在平劇院中担任研究改良的工作。

平劇院演出的戲可以分爲三類，一類是原來的平劇，沒有經過刪改的，那天毛澤東先生招待我們看的四齣戲，就是這一類。另外一類，他們叫做「改良平劇」可以「逼上梁山」爲代表作。那是舊戲中根據他們的觀點改編過的。第三類則完全是新的創作，「上天堂」「難民曲」可爲代表。

雖然毛澤東先生曾應許我們，要約我們看一次改良平劇。但是我們始終沒有這個機會。究竟怎樣改良，我們也得不到具體的觀感。不過他們曾經向我介紹這幾個名劇，就是『逼上梁山』，『史可法』，『上天堂』，『難民曲』等。綜合這四個平劇，可以約略知道他們對於平劇的內容與形式都曾着手改造。在內容上，他們雖利用平劇來演歷史故事，却絕對排除了宮庭化的意識，將封建社會的忠孝節義，怪力亂神，盡力肅清，而代以『羣衆革命』的意識。例如『逼上梁山』。便把高俅寫成投降分子，林冲代表抗金英雄。却因爲林冲起初未能認識羣衆力量，所以一再失敗，受盡磨難。等到後來義民起事，他才了解羣衆的力量，跟着大家上山「革命」。從這個劇本來看，可以知道誇張羣衆鼓吹鬥爭，大概就是他們改良平劇的一點重心。

『逼上梁山』雖說改變了內容，演劇的方式却還是遵守平劇舊規的。比這個更大胆的嘗試，則有『上天堂』『難民曲』。這兩個完全是創作，它把平劇舊有的完整的一套完全打破，在歌唱中，有各種歌謠混合起來，他們希望從這一方向來試驗地創造出一種綜合平劇和其他歌曲的新歌劇。

就形式方面說，改良的地方並不多。台步行頭一依舊規，臉譜的處置却比較兩樣。舊的平劇把那些細民羣衆都畫成丑角出場，好像他們都是天生的笨伯刁民，只配受人嘲

笑。延安的新平劇則將酒保，商人，農工這些人物還他一個乾淨的面目，只有「二流子」這些脚色才給他畫成丑角。關於嗓子，他們認爲舊平劇中的青衣小生的歌唱不近人情，所以也改良了一下，使他們的聲調盡可能的接近了肉聲，唱辭也極力白話化了。

另外一點可注意的改變。是增加了羣衆的場面。舊平劇中只限於武場戲，才有比較多的人上場；改良平劇則凡遇羣衆場面，就盡舞台面可能容受的程度。增加羣衆演員，以表現羣衆的情緒。譬如「逼上梁山」裏面起義飢民的怒吼，「史可法」一劇中城破時的救火農民的吶喊，都可以作爲改良平劇的羣衆場面的標本。

綜合這些改變，我覺得延安平劇的試驗可能有兩條出路：一條是利用平劇的道具服裝，專演他們所選擇的歷史故事，宣傳他們的「鬥爭」史觀。第二條出路，是逐漸溶化平劇與其他歌謠，造成新的歌劇來。

我個人對於平劇是十足的外行，關於延安改良平劇問題，我所能說的，就只是這一點點。

秦腔的性質似乎近於平劇。兩者同以歷史故事爲內容，兩者的表演手法也大致相同。它們的異點就只在平劇是宮庭化過了的，秦腔則始終留在民間，保持濃厚的社戲性質

。因而在表情與動作上，秦腔比平劇露骨得多。它似乎沒有平劇那樣優雅含蓄，祇是少數士大夫份子所能欣賞的東西。此外，秦腔的嗓子比平劇的還要高，因為它要讓鄉村廣場中的觀衆都能聽見，自然要多使一些氣力。

陝北一帶，一般流行的民間娛樂是「秧歌劇」。但在陝西的西北一帶，則秦腔的力量遠勝於秧歌。為了這個緣故，延安文化人又來改良秦腔。邊區文協的柯仲平先生，是改良秦腔的主要負責人。據他的說法，改良秦腔與改良平劇的原則差不多。比較特殊一點的，僅在音樂化粧兩方面，新秦腔的化粧，完全採取話劇化，增加『逼真』的程度，幫助平民的了解。至於音樂，則向綜合的方面發展，混入歌謠，增加樂器，將來是可能變了質而與秦腔完全不同的。

改良秦腔的劇本中，有兩種獲得比較滿意的成績，劇名『中國魂』，『徐州起義』。後者就是由外邊所演的「串龍珠」改編的。這兩劇是延安秦腔的代表作，可惜我們都未看到。

也有失敗了的改良劇。聽說他們今春上演了一個秦腔劇『洪承疇』，寫明末故事，對話中却有『訓練特務』『民族危機』等話語。把現代化的口號裝入歷史人物的嘴巴上去，對觀衆未能發生預期的效力。

除了秦腔平劇之外，陝北民間還流行一種「曲子戲」。顧名思義，這是由民間小調逐漸發展，增加了故事情節而成的小戲。因為它的形成較晚，所以一點也未脫離民間戲的色彩。它也有簡單的道具，化妝，演員與觀衆多是赤足穿草鞋的人物。它的歌曲，就是民間流行的小調，所表演的也完全是反映民間生活的故事。

舊曲子戲所演的不外是鄉村男女的調情以及士紳地主的笑話。糊塗縣官是這些民間中施行諷刺的主要對象。據內行人告訴我，曲子戲裏面含有中國農民固有的幽默滑稽，並且有豐富的鄉村情調。自然也有荒謬的迷信與絕望的呼聲。只要經過一番改良，就可以成為很好的民間娛樂，邊區文協曾經編過幾個曲子戲的劇本，但當我們在延安時，他們很少提起改良曲子戲的成就。在那裏現在是秧歌第一，一切活動都被秧歌所掩蓋了，連話劇也黯然無色的。

據我們知道，在秧歌運動開始以前，延安的劇運也曾走着話劇第一這一條路線。那時上演的並且不少是西洋名劇。

為避免繁瑣的敍述，且略舉延安上演過的有名話劇的劇目，來作為過去話劇在延安活動的小小說明。

二十九年是延安話劇最活躍的一年，在這年中演出的戲，有「雷雨」「日出」，「

北京人」，「欽差大臣」，「太平天國」，「李秀成之死」，「馬門教授」等劇。

三十年演出的戲也不少：「鉄甲列車」，「新木馬計」，「霧重慶」，「帶槍的人」，都是這一年演出的。

三十年以後，話劇界好像就沉默了。雖然還不斷的上演，却沒有像上面所舉那樣的「大戲」了。

直到今年，才又出演過一個「俄羅斯人」。

這裏要聲明，我所舉的材料是不完全的。延安演過的話劇當然不止這些，而在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這三年中，也並非沒有劇本上演。零零碎碎的小劇本，他們是經常演出的，不過根據上面的目錄，我們也可以知道頭幾年的延安話劇界，曾偏重於大戲重戲的演出，一演就要耗費數萬金，他們毫不在意。

但是，據他們後來的檢討：排演這些大戲，費力多而不討好。除了幹部以外，民衆對這些戲可以說毫無興趣。因此，他們一方只排一些省力的本地風光的話劇，在各機關部隊上演，同時就轉過頭來，專向舊形式的戲劇隊發展。可以說，現在的秧歌已經代替了前幾年話劇的地位了。

延安話劇界的沉寂，還可用別種理由來說明。說得正確一點。延安劇界對於話劇的

態度，不是放棄而是分解。他們把話劇的化妝手法加入各種舊形式的戲劇中去。像秧歌，就可以說是已經話劇化。在編劇與演劇的技術上，他們也不斷的利用話劇的經驗來提高舊的。既然話劇的優點可以移注到舊劇中去，自然沒有專重話劇的必要了。

可是就話劇說，它却是不公道地受了犧牲。人們一面把它的優點抽到舊劇中應用，同時又要求話劇本身之簡單化，要避免太複雜的劇情，要省掉太耗費的佈景，把它一剁再剁，弄到街頭劇那樣的場面，輕便，簡單，到處可以演出而且必須爲羣衆所了解。但是，話劇幾乎不成其爲話劇了。

到現在，在話劇上又提出了「自然景」運動，那就是說，不要人工的佈景，而利用現成的景物。假如演農家劇，就到農家村舍去演。假如劇中的背景是一個院子就不妨找一個寬大的院子去演出。這方法確是省事，但是話劇受它的犧牲却更大。第一、不能換場，劇情的進展只能限於同一場所；第二、就只能遷就當地的環境，你不能在延安表演壕溝生活，正如在部隊中不能表演後方生活。因此，作劇者的寫作技術必然要受到束縛。

這種自然景的話劇，在延安我們曾看過魯藝的表演。劇名「把眼光放遠一點」。描寫敵後農村的小故事，故事的發展都在一家院子中，背景簡單，容易演出。這種短劇，爲適應農村部隊的環境，確不失爲輕快的武器。

所以，根據我粗淺的認識，延安話劇雖然並未停止活動，可是爲了環境的需要，它正向着簡單輕便發展。像重慶這樣的演出方式，在短時期內，決不會受延安人的支持。在各部隊中，還流行着一種「活報」，這是用話劇的形式表演時事的，有時也加上唱詞，立意純在宣傳，似乎沒有特別介紹的必要了。

除了戲劇，延安還有別種文藝活動沒有？這個問題頗難於答覆。我的浮薄的觀感是：小說方面的活動，幾乎可以說完全停頓了。長篇小說，寫起來費力，印起來費材料，而且未必能夠深入民間，所以一定受不到功利主義的文藝政策所鼓勵。或許爲了這個緣故，延安那些作家們似乎很少作長篇小說的打算。短篇小說，也同樣的荒涼。在延安的新華華北兩書店裏面，我還沒有發現過延安作家創作的小說集。

一般作家所以極少創作的理由，大概都是「爲學習」，不過除此以外，我覺得還有一個事實上的原因，便是缺乏發表的地方。全延安現在沒有一種文藝刊物，只有解放日報的第四版，是他們的公共園地。然而那一版的地位，也並非專刊文藝稿件的。這種情形，自然要影響到寫作的熱忱。

小說雖然荒涼，報告與速寫一類的作品却相當豐富。過去寫小說的作家，現在多在

這一方面寫作。這些報告文學的內容，都是頌歌邊區人民各方面的英雄人物，或者褒揚邊區建設事蹟的。所有這些材料，全部在解放日報第四版上刊載，從事這一項寫作的作家，有歐陽山，丁玲等。然而由部隊和工廠中的文藝青年所寫的作品，似乎更多，當我們居留延安時，丁玲的一篇「二十把扳斧」正在解放日報上發表，這大概可以作爲延安報告文學的代表作之一了。

捨棄了小說而提倡報告文學，雖然不是延安文壇的公開主張，却也是事實所必需的。新小說的讀者必須是中學程度以上的知識份子。報告文學以其簡潔有力，却正是工人士兵以及鄉村幹部的合適讀物。但事實上現在延安的報告文學，還不算是十分成功。一般老作家的作品，技術雖然成熟，對於民間生活究竟不能完全無隔膜。每每寫出一篇，在同行中得到了讚許，却被熟悉民間生活的讀者指出了笑話，或者是動作錯誤，或者是說話不像。至於一般從工農兵出身的青年作者，對於民間工作自然是熟悉萬分，可是技術到底幼稚。彌補這一種缺陷的方法，就是「學習」，老作家向羣衆學習生活語言，新作家向老作家學習技術。

詩歌的空氣，比不上報告文學，但比小說還濃厚得多。艾青過去曾在延安辦過詩刊，現在是否在繼續，却不知道，至於詩歌的成績，似乎沒有人提起過，主要的困難，就

在形式。中國化的古體詩當然不行，現代的新詩，更是不行。他們的文藝政策注定了一切作品必須爲羣衆所能接受，這就大大的妨礙詩歌的凝練，象徵各種技術的運用。而且假如一定以老百姓聽得懂爲條件，就必須走上「朗誦」一途，而且必須盡量吸收民間語言。這樣的結果將流爲秧歌小調一類的作品，今年春天，艾青出版了一本詩集「吳滿有」，以勞動英雄吳滿有爲題材，出版以後，很引起一班人注意。據我們讀來的感覺，這本詩的特色，也就是便於朗誦，同時還利用民間的語言，描繪農民的生活形態，比過去革命詩人的口號詩標語詩，是自然得多了。我們知道詩歌本是文藝中之最貴族化的，它是否適宜於通俗普及，還是問題，延安目前的詩歌，還只能算是試驗的作品，這種試驗能不能成功，連他們自己也未能作肯定的答覆。

端午節訪丁玲

參加了文化界座談會之後，我覺得還有不少有關延安文化的問題，急待解答。剛巧，第三天是端午節，記者團全體休息，我就利用這一天的上午，拜訪邊區文協的負責人，陪着我去的，是S女士。

過延水，上陡坡，原來文協就在交際處對面的半山上。S女士說明『到了』，正想找門房問話，柯仲平已在那邊的窰洞前面迎過來。

這位老柯，年紀並不老，却已留着濃黑的長鬍鬚。長方的臉兒，半禿的頭頂，不說話的時候，道貌岸然。一開口，却是一個有趣的人。說三句話必定要打一個「哈哈」，笑聲和話聲常常分不清楚。一般延安人多是沉默而鄭重的，老柯可以說是例外。

他領我們進會客室——一座窰洞內，一面吩咐用人通知丁玲，會客室除了照例的朱毛二氏之外，還掛着勞動英雄吳滿有和趙占魁的油畫像。

我們天南地北，先談了一會，和老柯談話是需要耐性的，他吐辭很慢，笑聲又延續很長：「呵……哈哈哈」，丁玲進來了。

她今天的態度非常自然。一坐下，很隨便的抽起烟捲來，烟抽得很密，大口的吸進，大口的吐出，似乎有意顯示她的豪放氣質。

我請她說一說戰地的經驗，她經過不多的思索，就用說書的語調，告訴我們幾個戰地故事。

這幾個戰地故事，無疑是她選擇起來，預備作寫作材料的。故事情節的安排與發展，都夠得上寫劇本，顯得這是經過一個文藝作家剪裁過的。其中有一個故事，給我的印象特別深刻，那是說，「在河北淪陷區某一個鄉村裏，一位愛國志士受着敵人追捕，臨時逃入一家農舍去。這家的丈夫不在，只留着一個女人和懷裏的嬰兒。

「敵人馬上來搜查了，農婦不待這位志士的說明和懇求，隨手將嬰兒遞給這個陌生人，裝做夫婦的模樣。

「敵人並不清楚這位志士的年貌，只能取出戶口牌來對證。一夫一婦一嬰兒，看不出一點破綻，問那女人，女人坦然指着旁邊的男人就是孩子的爸爸。敵人觀察了一會，轉身走了。」

說到這裏，丁玲又燃着一支烟，我以為故事已完，感到失望，覺得這故事並不動人。但丁玲立刻接下去說了：

「正當敵人轉身外走的時候，外面又進來一個男人。」

「那是誰？」——聽故事的人免不了緊張起來。

「那就是他自己的男人回來了。敵人立刻抓住他。轉問那個女人，這個男人又是誰？你家怎有兩個男人？女人斷然地答道：『認不得這個人』，敵人聽了，不容分說，『砰』的一聲，將她自己的男子打死了」。丁玲一口氣說到底，揮手作打槍的姿勢，結束了這一幕悲劇的朗誦。

對於這意外的收場，S女士瞪着眼睛聽呆了。老柯不斷的點頭讚嘆。我不禁多問一聲：「這是眞實的事麽？」「絕對是實事！」主人大聲的回答，「只要你肯到戰區走走，像這一類的寫作材料，到處都是。淪陷區老百姓的英勇事蹟，實在太多了」。

我說，動人的故事，不一定可成爲寫作的材料。爲掩護愛國志士而必須犧牲親愛的丈夫，這是可敬的，但若寫給後方人看，則徒然增加愛國的恐怖，而未必能收宣傳之效。我們所要寫作的，毋甯是那些近人情的比較自然的材料。——但我還不曾聽到兩位主人的回答是怎麽樣時，廚房裏已送出熱騰騰的紅棗小米粽子來饗客。我想起了今天是端午節，想起了重慶的端午節，不自覺的靜默了。主人好像猜透了客人的心事，提議留在文協午餐，說是「不妨看看我們的過節，這也是作家生活之一面呀」。但因爲交際處

已爲我們準備節菜，約定了一定要回去過節的，所以只能婉辭了。要走的時候，我提議看一看丁玲的住所，那窰洞就在我們經過的坡上。外面種上稀稀疏疏的蔬菜，丁玲指點着那是番茄，那是捲心白。「全是我們自己種的，」她很得意的說。

在窰內仔細看了一回。內部的景象清潔而簡單，洞口窗下一桌一椅，洞的底邊一張床，床頭有半架書，此外。就是一架紡紗車，一條長凳。桌上的文具，也祇是必要的幾種。從洞內向外張望，仰觀浮雲，俯瞰延水，這時我陡然記起；「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不正可以贈給丁玲做室內的對聯麼？可是，這種意境太悠閒了，似乎不合主人的氣質。

不知什麼時候，S女士已和丁玲談起紗紡的事情來了。丁玲拿出一扎她手紡的紗線來給我們看，自己批評紡得還不勻淨。聽她說，每天可以紡二兩，一個月紡線的收入大約是六千元邊幣，折合法幣七百元的樣子。這就是她零用錢的來源了。再看她書架上的書，最大的兩部是「靜靜的頓河」和「戰爭與和平」，其餘的也全是二三年前的出版物，爲着精神食糧來源的困難，她露出苦悶不平的表情。

臨走，承兩位主人相約：「咱們有空乾幾杯好麼？」我自然是一口答應了。

端午節後的第二天（或者是第三天。）午睡初醒的時候，丁玲和柯仲平兩人到交際處來看我們。因為前一天有過酒約，所以便拉了同行的某君作陪，到新市場上館子去。

我們所到的館子叫做『大衆合作社』——全延安只有兩家館子，一家是「醉仙樓」我先已嘗試過一次，菜的好壞且不必說，停留在菜刀上的蒼蠅，多到好像鋪上層黑布，所以再也不敢領教了。今天的大衆合作社，說是比較乾淨而且是延安最大的酒樓，但與我們重慶比，其規模不過如天林春一流的菜館而已！

四個人都是能乾幾杯的。來了炸丸子炒里脊等等之後，談話便如流水一樣活潑起來，隨與所至，漫無條理，就我個人記憶所及，主客間大概說了這一些話：

（我）聽你們說，這裏是沒有檢查制度的，而你們最近的作品又如是之少。這種情形，我覺得很難解釋。

（丁）最初你們查問延安有沒有檢查制度，我就覺得十分驚異。因為我到延安以來，一向沒有這種經驗，一經問起，反覺奇怪。至於作品的稀少，是為了多數作家埋頭學習的緣故，並不是受了什麼限制的結果。

（我）我相信，在形式上你們是不受檢查的，事實上在延安談檢查制度是無意義之事，因為你們只有一家報紙，出版機關也只有一家解放社，你們的稿子只能向一個地方

發，那麼，解放社和解放日報的主編就可以全權處理你們的稿子了。

（丁）依我的經驗說，編者不就等於檢查官，我們現在雖然只有一家報，但如果願意辦刊物，是可以不受限制的，只要有興緻，用不着什麼手續。

（我）我總覺得，這裏似乎有一種空氣，使你們不敢隨便寫東西。

（丁）我不覺得有什麼空氣壓迫我們，我知道我們的寫作沒有從前那樣拆爛污，因為從前在上海寫作，只為稿費打算，越多越好，便免不了濫寫硬寫，不管好壞。而現在呢，生活無須担心，寫一種作品必須考慮它對讀者的影響，寫作態度也自然嚴肅起來。

（我）能不能告訴我，你們寫作嚴肅到怎樣的程度？

（丁）一般的情形是，除了作者自己努力向羣衆學習，盡力接受羣衆觀點，認眞寫作之外，作品完成，總經過朋友間的研究，虛心接受批評。

（我）批評是否有標準？批評的人是否限定幾個人？

（丁）全盤的批評，從意識內容以至描寫技術，批評的人也不限於幾個知心的朋友。讀者觀衆，都是我們的批評家。有時一種作品，在作者自以為沒有什麼毛病了，但經羣衆一看，便被指出那一句話不對，那一種動作不像，因此我們主張作家必須虛心學習，熟悉羣衆的生活。

話到了這裏，我私下做一個結論：在延安，形式上的檢查制度是沒有，替代它的是作者自動的愼重和同伴的批評。我知道延安人所說「批評」的意義，就是用多數人的意見來控制少數人，在主觀上作家似乎不受干涉，可是敢於反抗批評的作家，事實上也不會有。所以，延安人自有理由說他們沒有檢查制度，而我們也可以說延安有一種批評的空氣，時在干涉作家的寫作。

談過了檢查問題，我們的議論又轉入寫作生活上去。我的意見，延安文藝政策的特色，是多數主義，功利主義，通俗第一，一切被認爲「與小資產階級性的作品」，盡管寫得好，這裏是不需要，可是，這麼多的作家在這裏，他們在這裏的生活狀態，心理變化，和羣衆的感情，一定有很多東西可以寫，這些寫作的眞實材料，難道可以白白犧牲掉麼？

對於這個問題，他們的答覆是：關於作家自己的生活，寫作的材料，確是不少，但是，必須站在羣衆的觀點去寫，在未學習到羣衆觀點時就着手去創作，那一定會露出小資產階級的原形來。

『那麼像你過去所寫的作品，難道都沒有再存在的價值？』——我問丁玲。

她躊躇了一會說：『那些作品，我自己都不願意再看了，觀點不正確！但是那些材

料，還是可以利用的。我打算將我從前所作關於我母親的那本小說，用新的觀點重寫一本長篇小說」。這是我聽到她個人創作計劃的惟一的一句話。趁便我就問她「這邊的作家們能不能爲大後方寫點稿子？後方讀者關心你們的也不少呀」！

「我們何嘗不想向外面投稿！可是……」她用疑問的眼光看了我一下，好像問我，「能發表得出去嗎？」我自信懂得他的疑慮，便向他解釋最近放寬了的圖書審查辦法，根據這辦法，純文藝作品的發表當然是沒有問題的。我同時告訴他們，後方的檢查制度，也並不如延安所想像的嚴重。

她對我這一番解釋沒有表示滿意，她覺得，重慶文壇最近也寂寞得可憐。言外之意是：「一定有些緣故」。

這天和丁玲的談話，要點大概如此。（我說「大概」是因爲我沒有用筆記的習慣，一切憑記憶，我自信沒有歪曲她的語意。假如有錯誤，我應當向她表示歉意。）

酒添了好幾回，菜也添了好幾樣；不知不覺，已近黃昏了。然而「擺龍門陣」的興緻越來越濃厚，尤其是老柯，是一個頗爲貪杯的人。酒，也喝得最豪爽，話也是他說得最多，烏黑的鬍鬚襯着恣意大笑的面容，喉嚨越來越響，他的話有點像章回小說，說了一節，乾一杯酒，還有「下回分解」。說的時候，時而拍桌子，時而一把拉住了你的臂，

髆，時而擱住別人的話頭，讓他先講。那一股勁兒，眞是有聲有色，我至今還覺得他是延安作家中最有趣的人。

他那天說了很多的話，而且還是很輕鬆的，從雲南的老家。說到當原初的延安，他絮絮地敍述他在「北京」做窮詩人，找魯迅等等痛苦而滑稽的經驗。他到延安的時間很早，所知舊延安的情形也特別多，假如寫下來是很有趣的，可惜我此時已不能完全記得他所殷殷告訴我的一切了。

等到我們結束了這一次的小酌，老柯已經爛醉如泥，扶得東來西又倒，過河上坡都不可能。結果，我們只好將他「遺棄」在酒樓上，由那位殷勤的酒店主人照料他。

延安文人羣像

六月廿四日出席文化界座談會的延安人，大約有五十多位，在短時間內，一一交談尚不可能，夠得上說認識的自然更少了。下面幾位，是我們記者團比較熟悉一點的，不妨隨便介紹一下：

創造社的老作家，目前在延安的有成仿吾和李初梨兩人。但據說他們現在都已担任了實際的政治工作，很少幹文学生活了。成仿吾担任晉察冀聯大校長，同時是晉察冀參議會的副議長。他生得又瘦又黑，沉默寡言，有人形容他是『黑人牙膏』。從前聽說成先生是獨身的，但在延安的秧歌大會上，却看到他帶着他的小女孩約有八九歲，成先生百般的依順她，顯出非常親愛的樣子。

李初梨先生一團和氣，雖然很久不作文藝批評了，但是他對文藝的見解，還是最富於學術氣的。他的思想似乎也比較延安人通達些。從樣子看來，他似乎還保持一點文人生活的小趣味，談到上海，談到重慶（他是四川人），都說得非常起勁。他現在軍方担

任敵情研究工作，兼着日本工農校副校長的職務，可以算是延安方面的日本通了。

以「詩人」稱的作家也有兩位：詩人蕭三與詩人艾青。這兩人的性格，可以成為顯明的對照，蕭三的風格是飄逸，文雅，連說話的聲調也是輕柔的。艾青則帶有粗野奔放的氣質。

蕭三住在有名的文化溝，佔有兩個窰洞，洞外小園滿栽爪果包穀之類。我們訪問他，正在初夏日長綠葉成蔭的時候，在那裏消磨了一個下午，直感到我們這一位風度翩翩的主人頗有田園詩人的風趣。談到文藝和詩歌，很客氣的不願表示意見；他說他的興趣還在翻譯俄國文學。我們在延安時，解放日報上正連載着他所譯的蘇聯劇本「前線」，他目前最重大的工作，則是替毛澤東先生寫傳記。

蕭三留俄的歷史很久，他和蘇聯作家的關係，或許比他和國內文壇的關係還深些，他的太太是瑞士人，到過延安，現在回蘇聯去了。在延安作家中，親身受過高爾基指導的，只有他一人，可以做延安文壇和蘇聯文壇間的聯絡員的，他是惟一合格的人物罷？

如果說蕭三有田園詩人的氣息，那麼艾青應該可以稱為「戰鬥詩人」了。要不是戰鬥詩人，他怎能被聘請為「邊區參議員」呢？他是法國留學生，的確也染到了拉丁民族

的熱情氣質。從他乾枯的臉色與發紅的眼睛上，我相信他因推敲詩句而睡眠不足的詩人生活。從他說話的姿勢和言論的內容來看，我相信他是一個不甘寂寞的人。雖然以詩爲業，却不是溫柔敦厚一派的詩人。有一次在新華書店，見到一本書名「反法西斯」，我起初以爲一定是一册政治論文，打開來一看，原來就是艾青的戰鬥詩集。「反法西斯」，這詩集的名稱就可以代表艾青的粗糙的氣質了

和延安人談起，艾青似乎「很受尊敬」，最被人稱道的一件事是他寫了一本「吳滿有」的詩，寫好了還到吳滿有那裏去，親自朗誦給吳滿有聽，並且照吳滿有的意思改正了許多句子。這件事，也正可以表現延安作家寫作生活的特色之一。

女文人中，除了丁玲。還有兩位也是我們後方人所熟知的，就是陳學昭和陳波兒。學昭女士在延安有「紳士派」之稱，這不僅是因爲她還保留住一點愛美的氣習，就是談吐上，也含有法國風的嫻雅與含蓄。她是標準的名門出身的小姐，而又是經過沙龍空氣陶冶出來的作家，她最後選擇了延安這一條路，起初頗引起我們的驚異。但是經過了一兩次的接談之後，我不能不承認這個大時代浪潮所造成的糾葛，往往不是我們的常識所能意料得到的。

學昭女士現在担任解放日報的職務，經常的工作是看稿子，偶然也翻譯一點法文作品，此外，她也紡線，——說到個人生產，我還在報上讀過學昭女士的自白，那是訴說她第一次上紡紗車的心境的。她說她起初如何看不起這簡單的紡車，為了辱沒自己的身分而感到難過，而後來，又對於對這種勞動發生了興趣，終於愛上了這簡陋的紡車，這一篇小品使我如實地見到一個知識分子到延安去所必須經過的『蛻變』，大體上說，這一種自我克服的過程，總免不了有些苦痛的。

波兒女士在延安幹話劇，是我們早已知道的事。她是我們記者所要『獵取』印象的人物之一，可是她似乎有意避免和我們見面。有好幾次集會，她始終未露面。可是我們記者的一個天生的脾氣，越是難於見到的人，越想見一見，這樣，終於在我們要求之下，有一天，波兒女士忽然光臨到交際處來了。

她那天穿了一套工人服，披着『茄克』，矮小的身料，苗條的姿勢，却配着一副冷若冰霜的面孔。她的表情堅毅，有時格格地笑，也總是嘲笑冷笑，說話的語氣是斬釘截鐵一樣的肯定或否定，說話時，坐立不定，喜用手勢。依舊是演話劇的姿態。

我知道面對着我的，是一位強烈執拗的女性，對於過去的日子她沒有一點留戀。

在理論家方面，周揚先生是不能不介紹的。他現任延大校長，是教育界領袖之一，同時又是延安文壇的主要批評家。他翻譯過托爾斯泰的「安娜小史」，最近我們在延安，又看見他新出的一本「馬克斯主義與文藝」，那是集合馬克斯列甯高爾基斯丹林魯迅毛澤東的文藝理論，加以有條理的編輯而成的。

他雖是理論家，却不是一見就可以看得出共產黨氣味的人。態度儒雅，不露稜角，我們交談的機會不止一次，從未聽到他對各種問題有所批評，他給我整個的印象是端莊，大方，在那邊頗有領袖羣倫的氣度。

艾思奇的地位，可以說是文藝政策的執行人。解放日報的第四版，也就是延安作家們惟一可以發表文章的地方，是由他主編的。因此我們可以說他的編輯方針，也必然可以影響延安的文風。雖然延安人不見得肯承認我這樣的觀察，但事實上他既然掌握着延安文壇的天秤，我們就無從否認他的權威。

他是屬於「含蓄」一派的人，方方的臉兒，不露什麼表情。沈默的時候多，開口的時候少。他的談話，也沒有在上海文壇時所表現的潑刺。他是週末舞會上最受歡迎的人

，因爲據說他的雜技是全延安第一的。同時藏書之多，恐怕在延安作家中也是有數的。

延安的學人中，我們見到了范文瀾和呂振羽兩位先生。這兩位都是專攻歷史的，范先生並且是有名的老教授。他過去担任「研究院」的副院長，現在，主持着延安的歷史研究會。有兩本很厚的中國通史，大約就是他所主編的。雖然久已脫離講壇生活，但在他極度近視的眼鏡和斯文的舉止上，仍然洋溢着老教授的神氣。說着紹興官話，滔滔不絕的談論歷史研究的心得，有時引證古書，便整節整章的背誦出來。

他住在楊家林山上，佔有兩個窰洞和一個小院子。他對於他的庭園花木和他太太手做的紹興菜，似乎非常得意。雖然離延安只有三四里路，無事却整年不進城。

和呂振羽先生只在文化界座談會上談過一次。他是一個老老實實的學人，他說在延安研究歷史，史料雖感困難，但在研究南北朝和外族的歷史上却意外的有許多物證。他現在研究的專題，就是「異族侵略漢族史」。

從他們研究的成果看來，我們知道延安版的中國史也完全改變了觀點。關於古代史，卽在延安學者之中也還是各執一說，未有結論。中古以下的歷史，則大部均以「階級鬥爭」爲中心而改編。倘說中國的舊史是依着「成王敗寇」的觀點而寫的。則延安版的國史恰取着相反的觀點。凡是舊史上的「寇」，差不多都翻身而成爲階級鬥爭的革命英

雄了。因爲這樣，所以越寫到近代就越難寫，尤其是近百年的歷史，是他們認爲最重要的一節，正集合許多專家來研究。

延安作家中值得我介紹的當然不止上面幾位。但是我的記載，祇能限於見到的幾位。此外，如張庚蕭軍、歐陽山、何其芳這幾位，本來都在我訪問計劃之列，却以時間不夠，未能如願。因而也不好隨便說他們怎樣，這裏值得特別提一提的，是以「野百合花」鬧出問題來的王實味先生。

有一天下午，交際處通知我和國民公報記者，請我們到文協晚餐。到那邊的時候，有一個瘦長的男人和丁玲一同出迎，介紹過來，才知道這就是王實味，這種意外的會見，頗使我一時失措，因爲我想不出適當的話來和他交談。談「野百合花」吧，我深恐有傷他的自尊心，可是當我們坐下來的時候，王實味却先開口談起他自己的事情來了。談話的神情完全像演講，時刻舞着手勢以加強他的語氣，說到他過去的「錯誤」，他的表情嚴肅到可怕。有時，竟是聲色俱厲的。談話繼續了一小時之久，我好幾次打斷他的話頭，因爲我覺得這種話在說者與聽者兩方都會感到不舒服。最後我們才慢慢的談到文藝上去。我試提他過去所翻譯的幾本小說，他似乎稍爲發生一點興趣，但當我勸他回到文

藝崗位來，再從事翻譯工作的時候，他的情緒忽然又衝動起來，堅決地說：「不！我現在正對政治發生興趣，以後還是要參加政治工作的」，問到他最近的生活，據說還「在休養中」。據我的觀察，他的精神上所受的刺激，就在和我們會面的時候，也還是掩飾不了的。要說「野百合花」事件在他心理上，沒有留下一點創傷的疤痕，那是不可能的。

延安大學

七月一日，我們參觀延安大學，其奇特的性格遠遠超出我們的想像。

我們先聽取了周楊校長的報告，再分別參觀各系的圖書室與課堂，在一個大講堂中，有六七十個男女學生坐在紡車上專心紡線，這是他們規定的生產勞動——每一星期中，學生們要生產兩天，然後再上課四天，學生在校的生活，大部分就靠着他們的生產來解決的。生產的種類當然不限於紡織，種地亦是其一，我曾聽說大學生掏糞的新聞，但是到這裏來看，掏糞也不成其爲新聞了。

在教學方面，我們見到學生們的分組討論。這討論就在學生所住的窰洞內舉行。每個窰洞有五六個人，圍着一個小桌子。有的盤脚坐在炕上，有的蹲在陰暗的角落裏。有一個人發言，其餘的專心聽取筆記。發言與批評的機會是均等的，至於討論的問題，則大概由講師指定。在教育系的研究室外面，我看到那一星期中學生們所應當研究的問題，大約是「小學教材如何編輯？」「教科書是否應當地方化？」這一類的題目。

每一系有一間研究室，這是學生們可以得到參考資料惟一的所在。研究室的資料包括書籍報紙、和政府機關的報告。以一個自由主義者的眼光來看，所陳列的書籍，顯然是太寒傖了。有許多我們認為基本必讀的名著，在這裏是一本也沒有。倘使學生的書本見聞，只限於這些研究室，則很可能的，精通新民主主義者可以不知道拉斯基，或學教育的竟不知道杜威，而且，就我們在研究室所見，許多學生所孜孜工作的，還不是那些稀少的書本，而是一堆一堆的政府機關的報告。從這些報告中他們獲得什麼呢？經驗，經驗，經驗！

據說他們的學習方法，就是這樣，第一步，教師提出問題：第二步，是學生根據所提示的材料，進行研究，筆記、討論；第三步，由教師總結學生的研究，解釋疑難，做出結論。

就這種教學方法而言，我們不能不承認它有若干優點。因為這是以學生為主動的「自學」，由學生自己研究，自己思索，自己討論。教師只處於幫助的地位，這比諸依賴教師的演講，由教師包辦一切的教授法，無疑的是有效率得多了。

就他們學習的內容而言，我們也應當承認，他們的學用是一致的。學生所學的，主要都根據實際的材料：教師要學生研究的，也都是很實際的問題，担任教師的，差不多

都是在各機關實際工作的人物，例如，教育廳長就是教育系的主任，民政廳長就是行政系主任，建設廳長就是財政經濟系主任。同時學生在學習中，也定期到機關或下鄉實習，用這種方法教出來的學生，担任實際工作自然游刃有餘。

然而也有可批評的地方，那便是無論在教材資料上，或理論思想上，都免不了偏向。教學方法雖是進步，教學的範圍却局限於邊區的經驗，這樣學生就只能適合於延安環境的需要。再就課程看，除了五門共同課，行政系只有三門功課，司法系只有六門功課，教育系也只六門，財政系只有四門，學行政的可以不讀比較政府與憲法，學法律的可以不讀民刑法以及國際法等，學財政的可以不讀銀行貨幣，學教育的可以不讀心理學，這對於我完全是新聞。

我曾經說過，延安是最缺乏學院氣的，這個，在延安大學又得到了證明。延大的整個方針，或者也是邊區的整個教育方針，是排斥人文主義，着重經驗主義，貶低理論水準，偏重實用技術；他們決不諱言功利，一切陶冶性情，發展個性的學科，在他們看來不過是「資產階級」的閒情逸致，他們不要求大學產生博學的通才，他們所要求的只是他們所需要的健全的常人，對於邊區建設有實際幫助的人。這是因為邊區的農業社會，需要不到歐美高度工業化的理論學科，在那裏，一個學銀行匯兌的學生，實在不如一個

精通合作社業務的學生有出路；同時，因爲邊區知識份子之奇缺。急需造就大批的文化幹部，所以學習的期間不得不縮短，課程也不得不集中於立卽有用的幾門。

所以，凡是依我們的標準認爲缺點的地方，在他們自己看來都是優點。我們認爲這種教育限制了個性，他們倒覺得惟有如此，才能爲羣衆服務。我們認爲它太功利化，他們卻以爲這是「學用一致」。我們認爲理論水準太低，他們的答覆則是「實事求是」。

在學生方面，延大也有其特色，它不規定入學資格，也不偏重考試，一千三百個學生中，有工、農、店員、學徒、軍人，以及大學，中學，小學出身的人。父子同學，夫妻同窗，都是有過的。在學校中，學生還可以帶家眷來。學生裏面，有許多人是担當過實際工作的。畢業的學生，則大部分「到羣衆去」，也許過了一兩年，再來上學。

魯迅藝術學院的一瞥

看過了延大本部，我們又以整個的下午參觀「魯迅藝術學院」。

魯藝本是獨立的，現在雖已併入延大，它的規模還是大大的凌駕在延大其他學院之上，它屹立在延安北鄉的橋兒溝，那也是全延安最壯美的「哥德」式建築。這所房子，據說是舊日的天主堂，天主堂的遺跡仍都保存着沒有破壞，但看了從前的禮拜堂和神龕，總覺得有一種荒廢的空氣飄浮着。本來是宗教徒說法之地，現在則懸着口號標語，看起來非常不調和。

我們到那裏，正當學生晚餐的時候，沒有桌子和凳子，院子裏蹲着立着百來個學生，在柳陰斜陽之下進餐。蔬菜是用桶裝的，菜和肉片煮在一塊，飯也是小米和豆類混合做成的，看他們的樣子，似乎吃得津津有味。

學生宿舍，有的是窰洞，有的是洋樓，四個人一間，服用的東西簡單得驚人，然而好像沒有什麼不滿意。宿舍裏面時時飄散着悠揚的胡琴聲；壁上懸的名人肖像，自然以高爾基爲最多。

爲了要看看共產黨在邊區到底產生了怎樣的「新藝術」，所以特別注意他們美術系的陳列室。也許是我的希望太奢吧。繪畫方面，簡直得不到印象。國畫是被視爲士大夫階級的裝飾品，早被逐出藝術之宮了。油畫則爲了材料困難，不易發展。另外因爲學生修業的期間只有兩年，最基本的練習，恐怕也不很充分。

藝術本來是閒暇的產品，兵荒馬亂的十多年中，無法產生什麼偉大的藝術，也許是當然的。但在什麼都主張利用舊形式的延安，爲什麼不提倡用毛筆描繪新事物的新國畫呢？我頗不能了然。

所陳列的塑像雖然粗糙，却富有陝北民情風俗的色彩，給我們的印象很深。

在質量兩方面都值得我們推荐的，還是木刻畫。在那陳列室中，擺着從一九三八年到現在的木刻，按年次看下去，發展的情形是很顯著的。最初的刀法純粹是西洋風，現在則逐漸混入柔和明朗的中國綫條，人物的表情也愈刻愈細膩了。關於題材，頭幾年的木刻中還有些個人抒情感興的作品，近年的木刻則完全配合上了他們的文藝政策。爲了深入民間，他們且已開始學習套色的年畫。做效民間年畫的簡單線條，表現戰鬥生產的故事。聽說很受民間歡迎。然而我所中意的，却還是幾幅描繪人情風俗的圖畫。

延安的文藝政策，以「普及」爲第一。木刻在美術中的性質，恰等於戲劇中之秧歌

，頗合乎功利主義的要求。所以它的特殊發展是無足爲奇的。

魯藝包括三系，美術系之外，還有戲劇音樂系和文學系。戲劇音樂系時常在外面演奏，它的成績比較顯著。那天這一系人特別爲我們演奏了許多民歌。這些民歌的地方色彩非常強烈，就是一節很愉快的小調，聽起來，也總帶一點悲涼的氣氛，音階的起落很大，而調子又是那麼迫促，與南方音樂的輕柔曼妙，成爲很好的對比，陝北民風中的剛健勁樸，彷彿也可以從音樂中體會出來。

文學系的情況，我們不很淸楚。在陳列室中只看到他們的講義和筆記。各科的講義都只是薄薄的一本油印品，連文學史的講義也只有百來頁的樣子，筆記却很認眞，所有的材料，也正如延大的整個方針，都是很實際的。閱覽室所收藏西北的民間唱本特別多，這也可以表示他們是如何重視舊形式的利用，學生練習寫作的地方似乎只有壁報，編排內容，都很精緻，至於創作形式，則以通訊報告一類的作品居多。小說，散文，詩歌似乎都在減少。

晚餐後先看戲劇系爲我們排演的話劇「把眼光放遠點」，這是一幕所謂「自然景」的戲，利用現成的房子爲背景，庭院的一角就是劇場。看完了戲，我們被邀到一塊林中的廣場上舉行露天舞會，紅燈掩映，音樂悠揚，男女「同志」，翩翩起舞，交際舞中，

間以秧歌，倘說延安也有飄忽輕盈的良宵，那就應該是今晚了。然而一想起赤足草鞋跳交際舞的情景；又不禁使我們感到了不變的延安氣●

教育三事

我一再說過，延安人的作風是現實主義的，他們專顧目前的事業，沒有工夫去玩弄縹渺虛無的『游戲的理論』；再一層，他們的各種工作都是在匆匆忙忙之中幹起來的，從小處看，他們頗有計劃，從大處看，他們是抓住一樣算一樣，並沒有標準的形式。這兩種特性，在他們的教育上顯示得特別明白。由於現實主義，他們將我們所知道的教育制度搬過去，删除了一些，再添補了一些，終於成了十足的農村本位的教育制度，由於匆忙，他們來不及講究形式，什麼辦法都採取，什麼機會都利用。自然，他們也有一套教育理論的。但是這一套理論所牽涉的，決不是什麼教育哲學或學習心理，扼要地講，我們祇須了解三件事，就可以對他們的教育得到一個『鳥瞰』。這三件事是：辦些什麼學校？教些什麼？學校以外，還有什麼教育工作？

先說學校，大致也是三級制的，依照他們的名詞是。群衆教育，其對象爲村鎮鄉市範圍的成人教育和兒童教育，屬於這一級的學校眞是五花八門，應有盡有。例如兒童教育，有普通小學，有完全小學，有改良的私塾，甚致包括工廠裏面的藝徒制度。成人教

育，有冬學夜校，星期學校，識字組，小先生制，巡迴學校等。

其次是初級幹部教育，即等於我們這邊的中學。其任務是培養縣、區、鄉，一級的幹部，也就是基層政治人員的訓練所。

再其次是中級幹部教育，等於我們這邊的專門學校。其任務是訓練邊區政府級的工作人員以及農工商醫藝術文化專業的專門人才，屬於這一級的學校有中央黨校，延安大學的魯藝，自然科學院，行政學院等。

根據他們的統計；全邊區現在計有完全小學五十五所；初級小學七百五十二所，中學六所，到去年為止，小學生是三一八九人，中學生是二零二四人。冬學和識字組，在那邊教育的作用大，可是沒有最近的數字。

教些什麼呢？這是教育問題中的最要緊的一點。且也是延安教育和我們大不相同的所在。在我們看來，小學畢業升中學，中學畢業升大學，好像是天然的程序，可是延安却認為升學是最不重要的一方面。六年來邊區中學畢業生一千多人中，出去做小學教師的有百分之五十九，做「公家人」（黨政軍民衆工作）的有百分之二十二，升入大學的只是百分之十九。假如專教一些升學的課程，則那大部分無法升學的畢業生有什麼出路呢？回家吧，不能勞動，專鬧蹩扭；做「公家人」吧，學用脫節：此外，就只好做游民

。所以他們很明確的規定各級學校的任務，中學以下是羣衆教育。中學以上是幹部教育。羣衆的生活基礎是家庭和農村，羣衆教育「就應該時時刻刻照顧到家庭和農村，家庭生活和農村生活所實際需要的智識，就應該成爲羣衆教育的主要內容」。因此，延安有些小學教到了記賬法、寫信、寫路條，寫契約，、打算盤、種菜、紡織，種種農村與家庭中實用的知識」。也因爲這樣，學校獲得了家長的喜歡。有些鄉間的小學，這種農本主義更爲徹底，延安教育廳雖然編有一套小學教科書，但他們寧願尊重家長的意見，先教百家姓千字文之類，等到學生回家能寫姓名記賬簿，而得到家長的信仰之後，再拿教科書出來教。教科書的內容，自然是「新民主主義」的，政治上的偏向頗深。

延安過去也施行過強迫教育，結果却是慘敗。因爲陝北的農村地廣人稀，叫一個兒童每天跑路翻山到鄉鎮小學上課，而同時又減少了家庭的勞動力，都是違反民情的。因此從去年起改變了方針，除在人口集中的鄉鎮辦中心小學之外，在那些荒僻的村落，獎勵民辦公助小學。一切辦法，迎合當地需要，秋收農忙，均有假期，好讓學生幫助家庭工作，半天做工，半天放牛，也是允許的。學生不拘數目，只要老百姓感覺需要孩子讀書，向縣府請求，就可以派一位教師來，經費由地方自籌，教師的生活費則是公家負担。這種小學，可以簡陋到有如私塾，但也易於普遍。

在延安當一位小學教師，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因爲事實上他（或她）的任務決不止是一羣野孩子的先生，而是鄉村文化的「軸心」。他要通過學生，獲得家長的信仰，和農民打在一起，要能夠爲農民寫信，寫契約，訂計劃，然後一步一步的向他們施行文化宣傳，以及各種法令的解釋與說服。如果是女教師，多半還兼任青年婦女的組織工作，例如婦紡小組之類。因爲是女的，她更易於深入農民的家庭裏面去。在順利的條件之下，一位小學教師就等於各農家的常年顧問，他們如像分佈在每一個角落的文化據點，把延安的號令貫注到一家一家去。

在成人教育中，冬學與識字組是最普遍的。冬學利用陝北「天寒地凍把書唸，花開水暖務農莊」的舊傳統，在農暇的兩個月內掃除文盲。現在的辦法也是民辦公助。有自願學習的五人以上的村莊，由勞動英雄變工隊長等人出頭，就可立一冬學。一切不拘形式，專教識字寫字，分兩個冬天教，識字數自一千至一千五百，剛好讀羣衆報的程度。

冬學能遷就農民的時間，識字組則遷就工作單位。在那些有組織的羣衆中，識字組的辦法比較通行。例如變工隊婦紡小組，只要有一個識字的人，便可以成立識字組，這個，更不講究形式了，每天認兩個三個字都可以。如果在工廠，那便是夜校，部隊裏面

，就有識字課，這一切的教法和程度，都和冬學差不多，以讀羣衆報爲最高標準。

所有這些成人教育，都採取自願原則，但是教育當局的宣傳也頗爲澈底。大概的方法，一方面獎勵表揚學習的熱心分子，抓住勞動英雄，變工隊長，婦紡組長，出來宣傳識字的好處。同時動員中學生和高級小學的學生，地方上的知識分子，駐軍及機關人員，充當冬學夜學和識字組的教員。

除了以上的認字教育，還有他們的政治教育，屬於這方面的設施，第一是秧歌隊，已經介紹過了，不必再說：次爲讀報組，這也是通過各種組織實施的，在工廠、變工隊、運鹽隊，或婦紡小組中，由一個會讀報的人每天拿羣衆報唸給大家聽，並且加以批評解釋，進行時事教育。宣傳效果似乎很大，報紙上的勞動英雄生產計劃的消息，尤其易於引起各地羣衆的工作熱情。再其次，在各地的通衢大道上，我們還可以見到黑板報，那大概由鄉村幹部，合作社等機關負責，每天將新聞抄在黑板上，有時也帶便教識字。

在羣衆的政治教育上，羣衆報佔有重要的地位。所有這方面的教材，都由這個報紙來供給。它創辦於四年前，由文協領導，用字只有千五百個，所以絕對通俗，它每天印七千二百份，每個鄉，每小學，每工廠，以及部隊中每一連，札工隊，變工隊，婦紡組，運鹽隊，合作社，都分配一份，五十位勞動英雄，每一位也得一份，由別人讀給他聽

，報紙內容完全農村化，包括各地通訊，工作經驗，生產知識，實用知識，批評提議，歌謠故事等。為了適合農民的需要，每一時期總有一個中心的宣傳，題材依據農間的季節而定。就深入民間一點而言，羣衆報的力量是在解放日報之上的，雖然它不過是解放日報的通俗版。

關於延安的幹部教育，我在延大和魯藝的參觀記中，已介紹過一點。這裏再說一說它比較特殊化的幾件事。在課程方面，延安人認定邊區的中心任務是指導戰爭與生產，幹部教育也應該以這兩件事為主要內容。一切為升學考試而存在的課程，即使沒有全部排除，也減到無可再減了。外國語是被認為「消耗精力不切實際」，在中學已正式廢止。數學課着重在四則，分數，比例等，代數幾何則選擇極少部份有應用價值的來教授。至於他們添加的課程，有「邊區建設」，「政治常識」，「生產知識」，「醫藥衛生」。「邊區建設」是一門地方化的課程，它教授關於邊區史地，共產黨，邊區政府，軍隊，民衆四種組織，以及「邊府」政策法令的知識。這門功課的作用，在增加幹部對於邊區情況的了解，也借此加強他們幹部的地方觀念。「政治常識」則是關於惟物史觀階級鬥爭共產黨的教科書，自然是黨化最強的功課。最後兩門功課，切合社會實際的需要，

我覺得沒有什麼可批評。

各個中學，原則上都是公費的，六所中等學校，共有公費生不到兩千名的樣子，所以我們可以信得過貧苦學生的入學機會。但是，用什麼一種標準收學生，我們卻不清楚，是公平的考試？還是思想上的選擇？在今年邊區政府的指示中，明白規定這兩千名公費生中，要留二分之一的名額抽調現任的幹部入學，那麼，至少這二分之一的公費生是由官方選拔的了。由完全小學畢業而能升入中學的，至多不過一千名，這一千名是否還有選拔的性質？那就不得而知了。公費生之外，也容許自費入學，但名額不多。

從上述的情形看來，我們很可以清楚他們幹部教育的目標，是一方面培養未來幹部，同時提高現任幹部。他們的理由是現任幹部富有經驗，將他們的教育水準提高一步，立刻在戰爭生產方面見到效力。未來幹部雖不可缺乏，可是應用的時間未到，比不得現任幹部的重要。再一個理由是，使現任幹部與未來幹部共同學習，能夠使未來幹部從現任幹部身上吸收已有的經驗。

為了切合實際，各中等學校大概都和「鄉村政權」取得相當的聯絡。有時派學生出去作臨時社會工作，最普通的活動是衛生醫藥，秧歌，訂生產計劃等；有時作長期的實習。學生在校內，生產工作是必不可免的，用這種方法可以促進精神勞動與肉體勞動的

結合，並且解決師生自己的大部份生活。

在延安時，我們沒有機會參觀中等學校，關於青年生活和他們的一般情緒，沒有什麼話可說。校舍的簡陋，圖書工具之缺乏，學生生活的清苦，這都是想得到的事。事實上，延安教育中，最不重要的是校舍，最關重要的是教師。聽說那邊的中學教師，就十分缺乏。根據栁湜先生的談話，中學教師的待遇（平均每年有七石小米的收入）比他當廳長的待遇還高些。可是幹的人仍然不多，這原因，依我解釋，是中上層的知識分子太缺乏。

報紙・書店

倘說羣衆報是共產黨教育民衆的報紙，則解放日報正可以算是幹部的報紙。它是共產黨的正式機關報，具有幾個特點：它每天只能印七千多份，發行取分配制，它並不隸屬於共產黨宣傳部，却隸屬於比宣部更高的宣傳委員會。它的組織採取蘇聯黨報的辦法，社長地位在黨內很高，可以出席中共政治局，因而報紙的言論少受人事的牽制。再一層，它還有一個姊妹機關新華通訊社，這個通訊社的稿子供給所有共產黨系統下的各種報紙，因而透過新華社，解放日報的言論政策隨時控制着各地方報。

解放日報的紙面也很別緻。社評長而潑刺，充滿政論氣息，還是邊區幹部研究時事的活資料，也是他們的中心理論，所以寫得特別「雜誌化」，第一三版要聞的取捨標準與標題方法完全是「坦白的宣傳」、單看報紙題目，我們就可以一目了然於共產黨喜怒愛惜的表情。第二版刊載社會新聞及各地通訊，最具特色。它強調生產，鼓吹勞動，表揚模範的工作人員，報告勞動英雄的生產計劃，以及婦紡，變工隊，學校的消息。某家紡紗多少，某地的二流子怎樣轉變，都不惜以大幅地位渲染得如火如荼，緊張熱烈，對於推動下層工作和轉移風氣兩件事上，這一版的力量是不難想像的，通訊稿的來源完全靠羣衆，各地縣鄉村組織和部隊學校內，都有解放日報所組織的通訊小組。社內也特設通訊一部門，一方面整理合用用稿件，同時將不合的通訊稿修正寄回，指導羣衆寫作。第四版是綜合性的副刊，擁有全邊區作家為投稿人，也有稿費，每千字可得兩升小米。除了這副刊，也就沒有旁的雜誌了。

解放日報不過是解放社的一部份。解放社另一部工作在出版。所有黨方的理論，宣傳品，都歸還裏印行。書店有兩家，新華書店是官辦的，華北書店據說是私辦的，但由官方保證其每年的利潤，就他們今年發行的百分比來看，以通俗讀物為最多（佔百分之三十多），政治書次之（百分之廿六），文藝書又次之（百分之十五），自然科學和軍

事書發行得最少。社會科學的理論、也不過百分之七，各種書籍的銷售數量似乎很可觀。郭沫若先生的『甲申三百年祭』據說在延安翻版四萬册，一個禮拜就銷光了。我們在延安跑書店，就有好幾種書只有書名而缺了貨，有幾種書籍則大概是不便賣給我們黨外人。我疑心他們的書籍也多是取配給制的。舊小說在延安受到翻印榮寵的，似乎只有三國演義和水滸傳。

解放社和解放日報的社長是秦博古先生，江蘇人。這一位出版界的權威能喝酒，能聊天，而且身上常帶着自備的烟捲，這在延安人中是很少有的，我們有多次的見面機會，可是始終記不起他曾對我們說些什麼話。雖說是宣傳家，却並不像牧師一樣到處說教，還是大大的出我意料之外的。

延安的新女性

延安的婦女如何生活？

先說延安的「女同志」，也就是知識婦女的生活，許多人想像，延安一定是娜拉的世界，這想像有幾分對，也有幾分不對。當娜拉的丈夫命令她尊重爲妻爲母的神聖義務時，她宣佈：「在爲妻爲母之前，比什麼應該要緊的，是對於自己的義務」。假如是延安的娜拉，她的話便應該改爲這樣：「在爲妻爲母之前，比什麼應該要緊的，是對於羣衆的義務」。

易卜生的娜拉代表着個人的覺醒，將女性從家庭牢獄解放出來，希望經營個性自尊的生活；延安的新女性，剛從家庭裏解放出來，却立刻淹沒在羣衆的大海裏面去了，仍然是沒有個性了。

但這不並是說，延安新女性比起男性來，還有什麼不平等的待遇。因爲事實上延安男性之爲羣衆的僕役，與女性一樣，其間自然無所謂不平等了。

家庭的鎖鏈，也就是爲妻爲母的工作，現在是大大的減輕了，服務的機關可以包辦

了家庭的瑣事，女性大可不必再爲明天的小菜而皺眉頭，自然，也就失却了『應否回到廚房去』的問題。我們曾問一位交際處的女同志，能不能燒一兩樣小菜，她的先生在旁很滑稽的代答說：『我這位內人，最拿手的好菜是燒白開水。』

小孩子交給托兒所，保育院，再不然就是保姆，因此免除了大半爲母的責任。

如此一來，誠然失却了一部分家庭生活的甜蜜趣味，而在女性方面則恢復了大部的自由，她可以工作，她可以不必再倚靠男人生活，她可以不必再死心忍氣聽受丈夫的無理譴責。因倚賴男人生存而產生的『太太』生活，自然也消滅了，爲了勞動力缺乏和家事的簡單化，私人雇用老媽子，是不可能，也是不必要的，沒有老媽子，怎能做太太呢？豈僅沒有太太生活，連『太太』這個名詞也『革』掉了，當我們快進延安時，來迎接我們的C先生和C太太S女士都在車上，C太太突然站起來；『喂，我要告訴記者先生一聲！在延安，『太太』這個名詞是不時行的，以後請改叫我本人的名字好麼？』到延安一看，果然沒有『太太』稱呼。通俗化的「婆姨」，倒是在所不禁的，像丁玲的外號就叫做『陝北婆姨』。

魯迅先生曾提出一個問題，『娜拉到那裏去？』延安的解答是：到機關，學校，醫院，保育院，工廠，農村，秧歌隊，婦紡小組去！祇要你是健康而又甘心吃苦，出路總

是無問題。可是我要說清楚，出路雖然甚多，但是條條路都通到一個叫做「群衆」的粗糙的地方去。在這條路上休想保持你個人的喜怒愛憎，連塗脂抹粉都是犯批評的事情，英美的女性就是穿上了軍裝也是忘不了搽一下胭脂，延安人似乎還迷信着愛美與工作是不相容的。從家庭獲得解放，在群衆中又失却了女人之所以為女人的個性，是幸福還是苦痛？這只能等待她們自己回答。

戀愛與結婚差不多是標準化了。似乎聽說，過去邊區發生過一件情殺案，掀起了全黨男女的研究批評，結果，自然少不了一個「正確健全」的適用於邊區男女同志間的「戀愛觀」。標準的戀愛觀，自有標準的戀愛方式，決不像我們這裏有「伯拉圖式」，「至上主義」，「惟物主義」，「靈肉一致」等等的千變萬化。

另外一點標準化，依我個人的私見，覺得在「增強黨性」「削弱個性」的政策之下，延安人的思想，態度，品性，趣味，生活似乎都定型了。個性的差別是愈來愈狹小。甲同志與乙同志之間，A女士與B女士之間，實在看不出有多大的分歧，再加上擇偶的標準又是一致的，除了考慮一下年齡身貌之外，還有什麽條件值得推敲呢？嫁給甲先生，或者嫁給乙先生，似乎不會有什麽不同的結果，這在擇偶上的確省了許多麻煩，不像我們的擇偶，要從無數不同型的個性中選出自己所喜歡的對手來。

被極力誇張的『同志愛』，對於延安女性的戀愛與結婚一定也有重要的影響。既然同志愛應該高於一切愛，那麼戀愛結婚也應該以同志為第一條件了。個人愛憎的選擇也只能在同志之間運用了。這正如舊式婚姻以門第為第一條件，難道不會損傷到個人的戀愛自由麼？

結婚方式很合乎『實事求是』的精神，惟一的手續是向鄉政府登記，領取結婚證。離婚手續，亦復如是，離婚的權利是男女平等的。

雖然我們對於戀愛結婚的標準化，免不了有些異議，她們的性道德却是正常的。所謂『喝開水』主義一類的男女關係，也許是很早以前的事情吧？現在，由於批評的嚴肅，工作之緊張，和生活的簡樸，沒有什麼事實可以證明她們的性行為是隨隨便便的。

娼妓是犯禁的，不過變相的娼妓所謂『女二流子』一類的還有少數的存在。這些女二流子，也就是農村中的交際花，過去相當多，現在受了『改造二流子』的影響，大部份也轉變為婦紡能手了。從各醫院的病歷統計上，我們也看出了花柳病患者逐年減少，這似乎可以反映同樣的趨勢。

最後，綜結我對延安新女性的印象，是她們那樣泰然活躍的精神，確是配和男性做同樣的工作的。

雖然延安的新女性是那麽活躍，農村婦女却依然停留在舊日的生活形態裏。共產黨人是尊重實際的，他們知道在陝北的農業環境，家庭依然是生產的堡壘，破壞了家庭，也就妨礙到生產，從前那些女同志下鄉工作，將經濟獨立男女平等一套理論搬到農村去，所得的報酬是夫妻反目，姑媳失和，深深的引起民間的仇恨。現在呢，决不再提這一切，尊重民間的傳統感情，家庭仍是神聖的。婦運的「同志」，决不再把那些農村少婦拖出來，或者挑撥婆媳夫妻間的是非了，而只是教她們紡線，賺錢，養胖娃娃。一句話，是新型的良妻賢母主義。

想想吧，那一個丈夫不喜歡他的婆姨多賺幾個錢來貼補家用？那一個婆婆不喜愛媳婦養個胖白的孫兒？女同志的『威信』恢復了；做丈夫的無須再怕女同志和自己的婆姨打在一道了，很快的，便在農村婦女之間，成立了婦紡小組。有組織有計劃的紡線，有一個組長負責替他們領棉花，開銷產品。

組織羣衆婦女，實在需要極大的耐心與犧牲。鄉下婦女多數是頑固的，得用種種的方法說服他們，並且需要具體的例子教他們信服加入組織的好處。鄉下女人又多是小心眼的，對她們工作，須得公正廉潔，還要保證她們不吃虧。可是，一組織起來，什麽事

情都好辦了。不識字的，成立識字組，慢慢地，讀報組，慢慢地，教她們怎樣養小孩，通過生產的小組織，施行羣衆婦女的文化教育，這工作在延安附近，已經相當開展了。

陝北一帶，過去的衣料是全靠外面供給的。農婦全不知道紡織。自提倡婦紡後，去年民間手紡車已達十二萬架，有十三萬名農婦搖着紡車。大體上說，這些羣衆婦女的生活形態還沒有多大的變異，所有平等的權利，她們還是不敢問津；婚姻生活，也還遵守舊習慣：醫藥衞生，改進得不多。爲了買棉，賣紗，參加各種活動，交際來往日漸頻繁，集體化社會化的生活已經開始了，再因爲經濟生活稍爲改善，舊日家庭的痛苦減輕了一些，也是自然的。夫妻吵架，婆媳失和，生計問題常是主因，現在她們已能負担一部家用，或許可以改好一些吧？

爲了打聽羣衆婦女的生活情形，我曾會見過延安幾位婦運的領導人。她們的談話，無可紀錄，然而她們樸素的農裝和『改組派』的小足，却淸淸楚楚的說明了她們羣衆婦運的特色，是折衷於良妻賢母與社會主義之間的改組派主義，是由農村出身並且熟習農婦生活的幹部來幹的。她們不需要『摩登』的女權論者。

兒童保育院

六月三十日，我們參觀蔣夫人領導的陝甘寧第一兒童保育院。

保育院幼稚部所在的地方就叫做兒童溝，那眞是兒童之溝，兩歲至六歲的小孩，像牛羊一樣，散放在空氣和陽光下面嬉戲。這些兒童，多是活潑肥壯，逗人歡喜。延安人的生活雖然那麽節約，對於兒童生活似乎並不吝嗇：成人的衣服是土裏土氣的，這些小孩子的衣服樣式却是十分摩登，穿得個個都像洋娃娃。我們試爲他們起外號，有的小臉兒紅紅的，叫做『蘋果』，有的特別肥胖，叫他『東瓜』。

孩子的娛樂是充分的，較小的一組，坐在玩具一樣的小椅子上跟着保姆唱歌，有的連歌還唱不來，只能傻笑：大一點的，便都在操場上，圍着保姆做遊戲。跳的，叫的，相追逐的，笑做一團，從小就過慣了集體的生活，孩子們的氣質似乎比家庭的小孩，有些異樣，一點不怕生人。我們在那裏，幾乎每個人都被這些可愛的『小鬼』拖住了，手上腿上，拉得緊緊的。他們很會饒舌，沒有什麽羞澀的樣子。有一個五歲的女孩在我懷裏，忽然對我的手錶發生興趣，她追究這是什麽人『發給』我的，我說是買來的，她抬

頭看我，非常驚訝。我問她「你喜歡這個麼？」她回答道：「等我長大了。公家要發的」。我這才知道，他們根本還未了解買賣是怎麼一回事；她只知道什麼東西都是由公家發給的，怎會懂得複雜的金錢與買賣關係呢！

保育院的開支頗大，除了蔣夫人的兒童保育會月付十三萬元之外，延安人還須自籌一部。全院收容六百餘戰區難童及幹部子弟。幼稚部有兩百多名，其餘的在安塞的保育院小學裏。院長凌莎女士，是共產黨員。看樣子，相當活躍。據她的談話，每個孩子每月可吃到雞一隻，肉兩斤，油一斤，蛋三十個，小菜二斤，棗子兩斤，餅乾一斤，青菜三十斤，大米一斤，麵二十斤。院內還有診所和小兒科醫生兩位。開辦以來，只死亡過五名乳兒，兒童日常生活，除由保姆領導外，同時教那些較大的孩子幫助小的孩子。

參觀時，這些小朋友特為我們表演秧歌，扭得幼稚，可愛。他們表演過了，又過來要求我們講故事，這卻難倒了我們了。有幾位大朋友講了一些故事，可是他們聽得不起勁，這時我發現對付小孩子並不是容易的事。將他們交給專家管理，或許比我們自己管教還幸福一些吧？

在一間屋子裏，懸有蔣夫人的肖像，我問孩子們「這是誰」？他們都很親切的回答：「蔣媽媽」。有一個女孩還能夠咬嘴咬舌的說：「蔣媽媽在重慶，沒有到這裏來過」

。孩子們眞是純潔！我看他們說到「蔣媽媽」時的表情，不僅十分愉快，彷彿還有得意的神氣。

我們流連，也可以說和小朋友們玩了半天，終於要走了，在黃昏的太空之下，無數的小手向我們招搖，不斷的高呼「問候蔣媽媽……好！」「問候蔣媽媽……好！」這雖然明白是保姆應時地教導她們的，然而兒童的呼聲總是聖潔的，現在我們誠摯地接受他們的委託，將他們的聲音帶到重慶來了。

落杉磯托兒所是在參觀保育院的前幾天看過了的，規模較小，專收抗日將士與工作人員的遺孤，所得印象，和保育院也差不多。

特殊的婚姻法

要了解延安人對於兒童的態度，我們不可不先知道他們的婚姻暫行條例。就某種意義說，這條例是兒童本位的，它明確規定母性保護與兒童扶養的權利。

婚姻的形式手續，被放在最不重要的地位。正式的婚姻與非正式的婚姻，幾乎沒有差別。依條例；男女結婚，『得』向當地鄉政府申請登記，領取結婚證書。『得』的意思，是『可以』却不是『必須』，好像沒有多大的拘束力。可是另一個的意義則是：無論爲正式的或非正式的，不負責任的父母，常常是罪惡的，也不問婚姻之爲正式的或非正式的，能盡爲父爲母責任的，就被視爲神聖。『責任感』才是延安人對於婚姻的中心見解，因此他們更規定『女方在懷孕期間，男方不得提出離婚，具有離婚條件者、亦須於女方產後一年始能提出』，這是對於母性成爲弱者時候的特殊保護，也是強迫做父親的對於行將降生的嬰兒，負充分扶養之責。

此外如『患花柳病者不得結婚』，『男女一方不務正業影響他方生活者，可得離婚』。這是從優生與經濟方面提出的要求，但也有保障兒童的間接意義。

可以成爲延安婚姻法最大的特色，是私生子地位的保障。嫡子與私生子在法律上完全沒有區別，凡：『非結婚所生之子女，與結婚所生之子女享受同等權利，不得歧視。經生母證實其生父者，政府得強制其生父負責教養』。這就是不問婚姻是否合法，做了父母就得負責。其實婚姻是否合法，乃是父母間的事情，他們的子女本沒有合法與否的問題。將父母的過失嫁給毫無意志的子女身上，而加以種種塵世的侮辱，本不是公道的態度，也因爲社會上有這種偏見，所以常常造成墮胎，棄嬰的悲劇，現在延安人給私生子以和嫡子同等的待遇，使們對父母有同樣的要求扶養權利。這不僅對兒童格外有益，且可以使靑年男女預知做父母的嚴肅責任，認眞克制他們的性的遊戲。——這一點，我以爲很值得立法者的參考。

醫藥衛生

延安的醫藥衛生，就整個需要說，還是很落後的。

延安附近的情形，比較好一點，我們看過的醫院，有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總院，以及它的第一部，第二部，與中共中央衛生處門診部，留守兵團的中國醫科大學，對於醫學完全外行的我，除了在這些醫院裏飽聞藥品的氣味之外，竟是一無所得，我是看不出「新民主」的醫院和「舊民主」的醫院有什麼不同的，不過，據說：他們現在的方針是公醫制度，民衆診病，完全免費。住院的也只要交伙食費。

以上是「據說」，若就我個人看到的印象而言，則是有優點也有弱點。優點是醫護人員的服務精神。我們知道這些醫護人員，很少是共產黨員，他們多半是後方過去的，在那邊受着客人的待遇，這些醫生的服務道德，和共產黨「爭取羣衆」的方針很是合拍，雖然延安人對於他們服務精神的宣傳有時不免過於神奇，不過，隨請隨到，不搭架子，懇切和平，處處爲病人設想，這一種工作道德，我可以信任得過，一位醫生，在漲着大水的時候，冒險渡河爲人看病，也是我們親眼見到的。

弱點呢？也在醫生，可以說除了延安附近醫院的醫生，是外面過去的合格醫師之外，所有在本地訓練的衛生幹部，技術水準都不高。我們的醫科教育是五年，他們只有二年或三年、延大醫科的課程表，就在他們的小册上也不好意思刊載出來，普通醫學生，只學到幾種特症的治療法，就被分配工作了，這簡直是速成科，如何夠應用？別方人才的速成是可以的，醫學的速成，却就很有危險了。

在鄉村間，正推行着一種衛生合作社，中西醫並存，各工廠也都有一個小診所。這都可以看作公醫制的開始，但是鄉村的衛生情形依然是十分惡劣。我們且舉延安市附近的『韓家窰子』村的調查爲例，這村子共十八戶人家，在十六個婦女中，十三人有月經病，兩種病的四人，三種病的二人，四種病的一人。有遺傳病的四人。嬰兒的死亡率，估到百分之六十，十一個女人共生過四十八個孩子，死了二十九個，現存十七歲以下的孩子二十一個，有病的有六人，營養的知識是一點也沒有，聽說有些鄉下人連鷄蛋猪肝猪肚都不敢吃，還有如女人生產，要坐着生，產後得『坐灰』三天三夜。所有我們認爲產後必需的補品，他們却認爲大忌。

然而更惡劣的是普遍深入於陝北民間的巫神，現在還對科學的醫術作有力的掙扎。

陝北巫神

巫術可以治病，是落後民衆間的普遍信仰。差不多各地都有，但是，陝北的巫神具有特別權威，在缺乏衛生設備的鄉村，他幾乎包辦了民間的「醫藥」。

巫神所用以治病的「法術」，一部分是簡單的變戲法，一部分是禳病的法術。戲法的作用在喚起民間對於巫術的信仰，有釘鋼針，烙皮膚，踵鍘刀，燒陰毛之類的把戲。禳解法術，則有掃魂，下陰，送虎咬，畫符咒等花樣。

我們在延安時，有名的巫神白從海正發表其「坦白」「懺悔」，現在根據他的材料，約略介紹一下巫神的「藝術」。這一套藝術，固然是有害的，但在民俗學上，却不失爲有趣的材料。

照巫術的原理來講，巫神的禳病法術都屬於巫術中的「感致巫術」。他們利用推理中的相似律來看病治病。以「掃魂」爲例，他先用神八卦和鬼八卦來推算病因，神八卦以每月三十日爲推算根據，鬼八卦以每日十二時辰爲根據。男病用神八卦，女病用鬼八卦。譬如一二五得病，定是家親鬼，四六日是黑煞神，八九十是土神，七日廟裏

神。

根據八卦找到了病因，就得掃「魂」。掃魂前先扎一個草人來代替病人，於是上壇，這是熱鬧的場面，巫神吹鬍子瞪眼，舞「三山刀」，裝着神靈附身，身上脫得光光，「三山刀」嘩拉嘩拉的響，用弓箭，斧頭，菜刀，剪子，钁頭，對着病人比劃，同時唸着咒課，例如：「砍神來，砍鬼來……死鬼亡靈砍離身，一切砍在草人身」，就算把病鬼趕開了。趕開了病鬼，即爲病人「護身」，護身的咒語，不外是一套吉利話，「……八大金剛來護身，護前身，護後身，腳上護到腦門身……」，再下去，就是砍草人，砍的時候又唸一套「斬草人，替病人，替了病人命長久，一切災殃化灰塵」。禳病的儀式，至此告一段落。

禳病以後，巫神躺在桌下，裝着昏迷的樣子，到各地去查察病人的魂靈去了。這叫跌壇。醒過來，鄭重報告病魂落在何方，十字路口，或廟上，即刻到那裏去掃魂，三五個人拿着香，籮子，公雞，燈籠，到了那個地方，一個人拿籮子，一個人拿掃帚，一邊掃一邊叫「某某回來了」，另一人答「回來了」，一直叫到家裏。家裏又有一番佈置，用針（眞）穿着一條紅布（魂）和一個綠（落）布剪成的馬，代表「眞魂落馬」，釘在病人肩上，等掃魂的人回來，便用籮子在病人身上，「左籮三籮籮眞魂，右籮三籮籮有

魂，買魂落馬羅上身，」。羅畢，送神。

「下陰」又是另一種法術，看到病主有錢，巫神便說病人犯了天牢，得「下陰」去找他。於是在禳病的儀式之後，挖一個三四尺深的小窰洞，裏面擺着雞，一盆水，一盆灰，一口菜刀，一把剪子，一根馬鞭，一盞燈，口外放一根有小鈴的竹竿，夜裏巫師進去，把洞口埋起來，大概留一點點小洞出氣，外面有一人報告，如「天黑了」，「雞叫了」，「有人走過了」。巫神到天堂地府去找病魂去了——其實這時巫神正在裏面受罪，他只想挨過兩爐香的時間，好出來透空氣。一不小心，就要悶昏，不僅找不回病魂，他自己的魂也要歸地府去。

因爲下陰等於活埋，所以事主所費的錢也特別多。沒有經驗的和身體不健康的巫神，是不敢幹的。因「下陰」而死的巫神，也常常有。

除了掃魂和下陰，其他小法術，還有「月光治病」，「金雞下陰」，「送虎咬」。還都是些簡陋的詐財方法，談不到巫神的「藝術」，至於巫神的姿態，也隨各地不同，據說有神官，法師，師婆，夢仙，還送，馬脚，巫神，等七種。

散布邊區的巫神，究竟有多少，假如統計起來，數字一定很可驚的，就是延安當局的「反巫神」運動，也只能在延安附近發生一些效力，離開延安較遠的地區，巫神不僅

仍公開和西醫鬥爭，說「西醫的針有二尺多長，從腿子裏打進去，從肚子裏出來」，而且他們還威脅民衆：「你們誰要向政府報告我是巫神，我就叫誰家十口人死九口，不信試試看」。因此，一般民衆多不敢參加「反巫神」運動。依我們看，在教育與醫藥尚未普遍深入的農村，巫神是不易絕跡的。正如民俗學權威弗來則所說的巫術乃是僞科學，是一個墮了胎的「藝術」。在未有眞科學家與藝術時，一般民衆是不會捨棄其對於巫術的要求的。

一纜子會

在一個晴天，我們到裴莊去旁聽「一纜子會」，在棗林中的一所失掉了房頂圍牆的屋基上，我們見到這些鄉長，鄉參議員，鄉政府委員，自衛隊長，變工隊長，婦紡組長，勞動英雄們，羅漢似的席地而坐，要不是我們先已知道他們在開會，一定會以為他們是拳師帶着他的徒弟們在那裏練把式呢！我們到會時，似乎稍稍引起這些參議員們的侷促，但是這種侷促的空氣，馬上就解消了，主席已從「毛主席」的組織起來講到本鄉鋤草變工的計劃，參議員們聚精會神的聽，來不及顧視我們了。

站在那裏說話的主席和地上的參議員們，都是典型的赤足農民，但有一位勞動英雄田二鴻，他不僅衣服齊整，並且還穿着布襪布鞋，遠遠地離開參議員們獨個兒坐在樹根上，很自然的表示他是「受過毛主席招待」的身份。有兩位穿學生裝的，大概是自衛隊長和政治指導員，也是另外坐在凳子上，不和這些農民一起。一位青年少婦，懷裏抱着吃奶的嬰兒，據說是婦紡組長。再有一位女性，在紀錄着主席的講話，那是裴莊小學的教師。

主席的報告很長，而且相當流利。我應當承認，作爲一個普通的鄉長而能說得如此自然，在我還是第一次見到，隨後各參議員們輪流發表意見，說的是同樣的話，似乎每人都有開口的義務，這使我們覺得，他們開會的態度雖然極認眞，却還透着一點學習的性質。

當他們繼續發表那些冗長繁瑣的生產報告，經驗綜結的時候，我從會場溜了出來，繞着棗林散步，近午的陽光透過叢密的枝葉，蝴蝶兒貼着草地飛舞，從棗林外面送來幾處織布機的聲音，不時還有鷄啼犬吠，透露出鄉村的和平的空氣，與勤儉的民風。

再回到開會的所在，同道的記者已被引導到鄉公所休息去了，會場的空氣已不若剛才那樣鄭重，大家隨便的抽着旱煙講話，有兩位參議員，坦然的解開上衣捉蝨子。

捫蝨開會的參議員，這是絕妙的新聞，但是這新聞並不足爲延安人之恥。蝨子本是那邊農家的「好朋友」，生蝨子的問題決不像我們這邊看的那樣羞辱。沒有蝨子的參議員，那才可怪呢！

鄉公所是三間窰洞，牆上貼着本鄉的統計數字。從數字上看來，一百五十戶農家中，以中農爲最多，富農與貧農只有十幾家。

午飯就擺在鄉公所裏，勞動英雄田二鴻陪着我們。他當然是本鄉最大的富農了，據

他說：去年種地八十五垧（每垧合三畝），收了七十石糧，繳了十石公糧，吃用之外，去年餘糧十五石。以法幣來算，他去年的盈餘大約是三萬元的樣子。然而我們要知道是富農的收入，一般中農的盈餘，恐怕就有限了。全鄉的可耕之地有二千六百五十九垧，以一百三十六家正農來分配，每戶平均只得二十垧的樣子。

根據去年的數字，我們推算出來這裏農村的經濟狀況大約是這樣：農家的消費約佔產糧百分之七十，公糧的負担約佔產糧的百分之十一，中農以上的農家，約有等於產額百分之十五的餘糧。再拿去年比二十七年，村中的人口增加了一倍，耕地擴張了一倍半。產糧增加了三倍，農民的消費增加了兩倍，負擔增加了一倍半，這一切可以表明農村的光景僅僅是比從前安定了一點。

為了觀察具體的生活，我們巡視了幾家農戶。第一所訪問的屋子，住着兩家人，一家人正在吃着小米飯，一家人在做刀削麵。房舍狹小，而且無窗，人們都擠在天井裏，穿的似乎還不夠。第二所訪問的屋子就是那一位婦紡組長的家。她男人是縣府的科員，她自己紡紗，養蠶，居然可以自給了。

所有這些農家，給我們一個共通的印象是不清潔，蒼蠅多得驚人！

最後來了十幾個孩子，他們是裴莊小學的學生。有一個男孩子看起來很特別，不僅

穿着自衛隊的裝束，而且手裏還攀着一隻玩具式的紅纓槍，後來我們知道他們會扭秧歌，叫他們表演一下，那孩子拿着紅纓槍爲我們表演「張丕謨除奸」中的一節，使我們感到連兒童的遊戲也染上了強烈的黨化色彩了。

裴莊小學是田二鴻創辦的，是一所民辦公助的小學。學校的情形我們沒有仔細看，農民們對於學校似乎很滿意，因爲他們覺得：「娃娃們能識字寫信算賬就好了。」

土地政策

人類的歷史是一部吃飯鬥爭史。任何人要維持一種社會形式，必須給老百姓以看得見摸得到的物質利益，要替他們切實解決問題。只要做到了這一層，什麼新民主主義，什麼共產主義，他們不在乎；做不到這一層，一切理論都是無用的。

所以，延安的成敗，必將決定於其生產運動的成敗；其成敗的關鍵在乎他們能不能保證老百姓的最低限度的生活；也因爲這樣，所以延安人盡力鼓吹生產運動，掀起一片生產的狂潮。

在介紹延安的生產運動之前，有幾點我們必須先記住，這是他們的強處也是弱處。第一、共產黨的方針是立刻抓住民衆的信任，要給「老百姓以看得見的物質利益」，所以他們的計劃，也從沒有離開眼前的利益，我們可以批評他們的目光不遠，但在爭取本來短視的民衆上，這却是非常有效的方法。

第二、因爲他們要求迅速見效，所以在盡力避免民間的阻力。儘可能的利用舊形式，尊重習慣維持傳統，決不創造民間所不能理解的生產組織，甚至連口號，也是百分之

百的「舊社會」的，如「豐衣足食」，「安家立業」，「財丁兩旺」，不讓老百姓感到生疏。

第三、他們的生產工作是匆匆忙忙之中幹起來的，因爲匆忙，於是砍光了延安的樹木來起房子，而今又來提倡造林，像這一類的小矛盾，隨時可以發現。

第四、我們看延安的生產運動，易於被他們的有聲有色的電影場面所迷惑，當我們聽到一個「英雄」半夜開荒時，心中難免受了激動。然而冷靜地想一想，人力是一件事，物力又是一件事。緊張熱烈是一件事，工作的效果又是一件事，我們公平地承認他們利用人力已達頂點，可是也不可不知道他們是在低下不利的條件之下工作的，十幾萬婦紡夜以繼日，他們的產品能抵得現代化的工廠幾個？這是很難說的，所以我們雖然承認他們工作的熱烈，不就等於承認他們的偉大成功。反過來說，因爲他們的成果不大而抹煞了他們的工作，那也是不公平的。

第五、延安的生產運動，着重在人力的運用，着重在組織，我這裏所介紹的，也着重這方面的活動。

農業是邊區生產的重心，土地問題是農業生產的基礎，延安當局如何分配土地呢？在一個時期內，共產黨曾經沒收地主的土地，還有一個時期，雖然停止了沒收土地，但

因爲實行「左」的經濟政策，使得分到土地的農民只敢種一點足夠他生活的糧食，有一個時期因爲仇視富農心理尙未清滅，害得有田地的人情願荒廢而不敢出租；有一個時期，農民期待「政府」會給他們一塊不化錢的土地，因而不願意向有地的人佃地，安夥子；有一個時期，貧農的地位抬得太高了，害得需要勞動力的人不敢雇長工。農民的心理是複雜的，保守，自私，患得患失，一切都妨礙了正常的生產，從「土地革命」到二十八年止，邊區的農業一直是下降的，分配土地，不是畫圖那樣簡單的事。

二十八年共產黨來了一個重要的轉變。雖然停止沒收土地是廿六年的事情，但因爲缺乏明確的政策，使得農民懷疑「停止沒收」是臨時的政略還是穩定的經濟政策，因爲在那個時期，中共還有將「停止沒收土地」作爲團結合作的條件解釋的：一般人都不敢相信「停止」能到多久。二十八年延安當局正式實施減租減息的辦法，這才證實他們有意用和緩的方法來代替激烈的沒收，「土地革命」，到這裏才得到一段落。倒霉的地主反正已經過去了，新的地主是得到保障了，分到土地的農民現在是可以保有他的地權，而且可以放心使自己做富農了。「左」派的土地政策已不存在，現在的政策只是稍微「左」一些的適合乎傳統習慣的改良主義。凋疲了十年的陝北農業，這才開始復蘇。

現在的情形是這樣，已經鬧過「土地革命」的地區，土地業經分配，就算定局，流

亡的地主如果回來，則依着二十七年的佈告：「鄉村人民應表示歡迎，可在區鄉村公地內分配他以和農民一樣多的土地和房屋，但已沒收了的土地不應還原，分配了的房屋不得翻案，已取消了的租債不許再索取，如鄉村公地當地已分配完者，得在他鄉內給以每人應得的份地」。在有些縣份，如綏德慶陽等地，土地未經分配的，則仍爲原主所有，凡留居邊區的退伍抗日軍人，抗屬，蒙回人，外來災民，難民，如果沒有田地，可以領取公地或公荒，取得土地所有權。「公荒公地，誰開誰得」。

土地的買賣，典當，抵押，贈與繼承，都是可以的，不受禁止。

在未經過土地分配的地方，徹底減租減息。二十八年以前的欠租，一律免交，減租的標準是，照原租額減百分之二十五至四十，使出租人的所得，不得超過收穫量百分之三十。超過三成的租額，要減到三成爲止。禁止收取押租或預收地租，土地副產物，皆歸承租人。各鄉組織有減租會，經常處理這個工作。

另方面，由鄉政府和減租會對地主保證承租人交足租額。地主不能任意收回租地，收回租地是受着嚴格的限制的。

在私人的荒地開墾，三年內免付地租，如果是公荒，也是三年內免納公糧。

陝北的租佃中還有兩種特別的形式：出租人供給土地，同時供給工具的，叫做「夥

種」：出租人供給土地及全部生產公具，並借給承租人糧食窰洞的，叫做「安莊稼」。這兩種方法對於本地貧農及外來難民，很有幫助，所以地主的租額也定得高一點，現在的標準是夥種的地主可得收穫量百分之四十，安莊稼的地主可得收穫量百分之四十五。

綜合他們全部的土地政策是，維持傳統的私有制，而同時提高農民生產的積極性。充分利用土地，同時扶助自耕農。除綏德區還有幾千垧的地主外，其餘各地的地主差不多都是親自耕作的富農。專靠地租生活的舊式地主，是很少存在的可能了。在這種政策之下，農村裏的階層自然起了變化，其中純粹的地主和雇農減少得最快，中農增加得最多。

恢復了溫和的土地政策之後，邊區的農業確已蘇生。最可以表現成績的是開荒。我們從山西踏進邊區，沿途所見，幾乎所有的山頭都開遍了。

變工隊與合作社

增產運動中，最可注意的一種組織是變工隊。全邊區共有勞動力三十五萬個，組織進變工隊的，據估計約佔四分之一。這些變工隊的名稱不同，組織的性質也有種種的差別。有變工札工，唐將班子，夥格牛等等的舊名。詳細的解釋是不必須的，總之我們知道它是民間舊有的勞動互助組織就是了。它的最簡單的形式，就是大家在一起勞動，今天種你的地，明天種我的地，後天種他的地，輪流來種。自然，各人的地有多有少，各戶人家的勞動力也有多有少，這裏面還得清算，要是替人勞動的「工」抵不過人家替自己做的「工」，就得以「工」還「工」，或以工錢來抵付，也有以人工換牛工，牛工換牛工的，也有人力畜力一起組織進變工隊的，還有一種是純粹的貧農所組織，農忙時節集體為他人耕種收取工資的。這裏面的變化頗多。但是大別只有兩種，一種是勞動交換形態的變工朋工等，一種是勞動雇傭關係的札工，唐將班子等。

變工隊的利益是顯而易見的，它將農民所有的土地，人力，畜力，工具結合起來，使得沒有畜力的可以得到畜力，農具不夠的可以互相調劑，解決了許多實際困難；同時

它可以發展較有利的企業分工，尤其節約了家內勞力之浪費。譬如說，五個人變工，本來是每家的女人每天都要送飯，現在每家只要輪流送一天的飯，節約了四家女人的勞力。此外，它也提高了勞動效率。例如延安念莊的變工隊，只佔全村勞動力百分之三十四，却能耕種全村百分之四十二的耕地，所收糧食，佔全村收穫百分之四十四，還原因還在乎它能節約人力，增加了個人勞動的強度。十一個人各自耕地時，要送糞，就得一人管一匹牲口，要下種，就得兩人管一條牛；如果採取變工的方式，則一個人可管三匹牲口，七個人可以管五條牛，送糞時可以節約百分之六十的人力，下種時可以節百分之三十的人力。

然而以上種種，還是從人力經濟上的看法，在共產黨看來，利用這種舊形式，還可以達到另一種政治上的目的，他們認爲幾千年來我們農村經濟是分散的個體的，一家一戶自力其田，這種方式限制了勞動力之提高也束縛了生產單位之擴張。現在的變工隊，雖然並未打破個體經營私有財產的基礎，却已建立起集體勞動的規模。它打破了束縛農業發展的個體勞動，養成他們集體勞動合作互助的習慣。等到農民們逐漸了解集體的好處，就可以進一步提倡集體化的農業經營，而走到工業化的集體農場的道路。

同時我們還不能忽視，由於變工隊的組織，農民集體化的傾向逐漸顯著，必然引起

着干心理上的變革，共產黨的文化教育工作，也透過這種組織而貫徹到下層的農民，因此可以說，變工隊雖然是舊形式的利用，可是它的內容却已大大的擴張了。

合作社是另一種集體性的經濟組織，變工隊可以說純是農民的生產合作，合作社則廣泛地替代了商店，郵政儲金，銀行，農貸各種的任務。

延安的南區合作社是典型的合作社之一，它最初從縣馬大店開始，現在則經營着二十多項業務，發展到經濟生活的各方面去。生產，消費，運輸，農貸，移農，經理公款，代收稅金，婚喪貸款，幾乎無所不包。——它自己還組織了紡織榨油，製毯等廠，它的經營法有許多特點：它以一切的方法爭取民衆的信任與滿足。每年春耕，它先從外地運來農具，以比市價低廉三分之一的價格賣給農民，用這種苦幹的辦法，滿足民衆的生活必需品。它准許民衆以實物和人力畜力入股，鷄蛋，柴草，麻繩，一疋驢，一個勞動力，都可以算作股金，用這種繁瑣的方法爭取社員；它又替民衆代繳稅收，每年交公鹽代金和公糧代金之前，民衆可以將代金全數交給合作社，合作社不僅保障替他們交稅，並且承認所交代金卽爲民衆的股金，合作社就在政府未動用之先，將這一筆代金周轉贏利，以贏利所得交了代金，有餘再分紅給民衆，有的地方老百姓還可以繳一年的公糧代

金給合作社，由合作社負責兩年的公糧，此外如地方上的負担，教育費，自衛軍費等，亦由合作社從紅利中替社員代付，我們得知道，陝北農民是很少保存現鈔的，他們要繳稅，就得運糧出賣，再送到城裏交稅。一人一畜，得浪費一兩天光陰，合作社擔任了他們這些困難，而願意替他們服務，怎不受人歡迎？

從經濟上攷察，這一類的合作社的作用是可驚的。第一，它成了吸收民間游資的惟一處所，據我們在延安的考察，所有他們私產的剩餘，都投進了合作社，這不僅是因為合作社保證優厚的紅利，也因為合作社的辦法適合民衆生活。僅僅延安的南區信用合作社。以八萬的股金，一年之內，吸收了民間五百七十萬的存款，即是一例。第二，它差不多包辦了民間的商業，它不僅本身保障民衆的生活必需品，並且還投資到各私營商店去，一個理髮館，一家裁縫舖子，往往都有合作社的股份，這樣它就控制住了各部門的生產。第三，它的生產組織，也差不多控制了民間副業，譬如南區合作社的綿紡小組就包收了當地民間的紗布，它的運鹽隊就包辦了當地的食鹽，用這種方法它掌握實物成為公營工廠與民間的橋樑。第四，它利用它的資力，幫助人民的就業，凡有勞動力的人都可以從合作社得到幫助，以合股的力式經營事業，有人告訴我一件事，說南區有一個十五歲的孩子死了父母，只剩下一個瞎子的哥哥，到合作社去乞求援助，合作社替他算一

算，叫他加入合作社趕牲口，以他的勞動力入股，提出紅利的一部養他的哥哥，再以剩餘的紅利作股金，預備作他將來娶媳婦安家的資本。合作社就用這種不拘形式的方法，招收學徒，吸收失業工人，安置工作人員的眷屬。最後還有一點重要的作用，便是溝通了公私的經濟的關係，它替民衆交稅，也替公家保管公款，利用公款生產，幫助延安當局的經濟財政政策；同時也由公款的運用，相當的減輕民衆的負担。

延安的合作何以會有這樣的發展？這有兩種原因；他們宣傳合作社的「羣衆觀點，服務性質」，有異於從前的攤派入股的政策，這的確是成功的基礎。但是我們免不了要問，為什麼合作社能賺這麼多的錢？為什麼它能分給股東以百分之五百的紅利？這就不單是努力的問題了。在這裏，邊幣的作用是微妙的，且舉一個具體的例證以代說明：去年春天，有名的勞動英雄吳滿有向南區合作社運輸隊入股一萬元邊幣，當時出了麥子一石六斗七升，到了秋天結賬，連本帶利分得九萬五千元邊幣。紅利是百分之八百五十，看起來任何人都要動心的，可是以那時的麥價算，九萬五千元只能買回二石一斗麥，紅利就只有百分之四十的樣子。一句話，由於邊幣的不斷跌價，使得合作社的經營獲得數字上的厚利，而幫助了它吸收股金的工作。

根據去年的數字，全邊區共有合作社六百三十四個，社員十八萬人，股金七萬萬邊

幣。其中消費合作社二百八十一個，生產合作社一百十四個，運輸合作社二百三十三個，信用合作社六個。

延安的公營經濟，分政府，部隊，機關學校三部門，而尤以部隊經營的成績爲最顯著。拿農業講，邊區部隊去年開荒二十餘萬畝，達羣衆開荒總數三分之一，共收細粗三萬石，邊區部隊種菜一萬八千多畝，收穫菜蔬二千三百萬斤，做到部隊菜食自給，養猪一萬餘頭，羊一萬五千頭，因而做到了每個兵每月吃三斤肉。至於他們今年的目標，則是細糧十萬石。

三五九旅是典型的生產部隊，現在，就以它爲例，作爲公營經濟的說明：

根據他們的統計，三五九旅在去年共種地十萬畝，收細粗一萬二千石，菜蔬五百萬斤，草料四百萬斤。吃的方面，全部自給。今年該旅的計劃是開地二十六萬畝，收糧三萬六千石。猪羊鷄鴨無所不養。經常全旅養猪兩千頭。保證每人每月吃三斤肉。

部隊生產以連爲單位，每連有生產管理員，營有生產副營長，團旅有生產副官。担任這些工作的，多是富有經驗的農民。現在且舉三五九旅某兩個連的生產數字：在去年共種地一千四百畝，收糧四百四十石，菜四萬斤，草廿萬斤，養猪八十六頭，羊八十八

頭。雞七十隻，牛四頭，砍柴廿四萬斤，撿毛四百斤，運輸經商賺了廿萬元邊幣。

除了農業，該旅還建設了好些工廠，最有名的是大光紡織廠，去年產毛呢兩千疋，布七千疋，此外有肥料廠一所，鹽井十個，木廠二個，鐵廠三個，磨坊六所，粉坊八所，油廠一所。十個騾馬大店，和六百頭馱騾的運輸隊。

合作社的數目不清楚，只知它道的全部資金為七千萬邊幣，其中百分之六十三是私人資本，也就是士兵連年辛苦生產下來的私蓄。在今年頭三個月，就獲利三千萬邊幣。雖說是軍隊，做生意的本領却不弱。

士兵的吃穿可以達到一般工作人員的水準，但是生產的負担也着實沉重。依照今年的計劃，每人得種三十畝地，收六石細粮，三分之一歸公，三分之一自己吃，餘下的作為私人所得。

全旅的財產，據估計為十五萬萬邊幣，這是一筆驚人的數目，也是一萬人四年來汗血的貢獻。這一個隊伍，其軍事的作用遠不及其生產作用之大，它是一個軍事管制的生產組織。

三五九旅最大的戰場，叫做南泥灣。數年前，那些地方還是荆棘遍途，虎狼出沒的所在，現在由於他們的開荒，已成了山明水秀的風景區了。開闢南泥灣，是一篇動人的

故事。這故事已編成延安電影，也產生了無數的秧歌劇。「劉連長開荒」一劇，就是描寫三五九旅一個連　搬了古廟的鐘來打農具開荒的故事。故事是寫實的，情景是動人的，使我們想起古代的屯田實在是聰明的政策。也許，這又是毛澤東先生讀了資治通鑑的成功處。

在工廠中

邊區的生活基礎是農業，工業的重要性並不高。雖然大大小小的工廠有九十多所，但是全部的工人只有兩萬，生產的方法還停留在未會機器的階段。一切都還帶着手工業的色彩。若再就工業的性質來分析，則這些工場的絕大多數是爲滿足農業社會的生活必需品而設的，其中紡織廠就佔去了三分之一，煤炭廠也佔去了三分之一，其餘三分之一才分配到造紙，化工：機器，油鹽，鐵礦，印刷各業。就這一點來看，邊區的工業是十分落後的。

倘若延安的工業也有值得我們參觀的地方，那不是生產技術與生產的成果，而在他們的生產組織與人力的運用。我們要看他們怎樣從分散的家庭工業變成工廠的雛形，我們也要看他們怎樣從沒有工業基礎的荒涼地方，開始向自給自足的道路努力，而尤其重要的，是他們用什麽制度使得工人們所貢獻的汗血比在工頭老板管理之下還多。

以我們到過的四個公營工廠——兵工廠，難民紡織廠，皮革廠，振華紙廠——爲例我們就覺得有一個共通的特色，是組織的嚴密與管理的精細。我覺得一所工廠事實上就

等於一所共產黨政治幹部的養成所，一個幹部能學習到了控制工廠的方法，他必然可以應付各方面的羣衆。職工會是每一個公營私營的工廠都有的，凡屬職工都被組織進去，它代表工人和廠方交涉，它至少在形式上是由工人用平等的方式產生的，這使得工人們感到自尊心的滿足，然而事實上工廠之中有共產黨的支部，這支部就是職工會的核心。廠長的任務祇在規定管理規則，製訂生產計劃，領導廠內的事務；工人方面的事情則全由工會來負責。勞動合同由工會掌管，勞動紀律由工會負責維持，工人的福利由工會主辦，生產計劃經過工會同意之後也由工會保證如期完成；此外，掃除工人文盲，提高政治常識，發起生產競賽，這都是工會的任務，一個廠長是或事務員，倘有營私舞弊違反黨策的行爲，是很難逃避工會的檢察的；但是這類事情並不多，因爲實際上廠長和工會負責人，是同一勢力的代表人。不過是一個在上面領導，一個在羣衆中推動而已。在私營工廠中，廠長和工會的關係當然不會像公營工廠那麼融洽，可是當延安的整個政策是在獎勵私人辦廠的時候，工會也當然會知道怎樣維持私人資本家的生產興趣的。

難民工廠是四個廠中之最大的，共有工人五百多，每天的工作十小時，但由於工作競賽制度，工作的成果幾乎不能以固定的工作時間來計算。以「趙占魁運動」以前與實施「趙占魁運動」以後的工作效率相比，木機布是五比九，鐵機布是十一比十八。也就

是說，從前一個人織五疋布的時間，現在可以織九疋布。

工資制度分兩種，全面工資與混合工資。全面工資發給等於若干斗米的貨幣，包括工人全部的生活費：混合工資供給工人的衣食實物，另發少數貨幣津貼，難民工廠屬於全面工資制，普通工人每年可得九小石米的工資，最熟練的工人每年可得十一石。所以有差別，是因爲各種工人的工價不同，譬如說，織布的工資就要比紡紗的工資高些，雖然工作的時間是相同的。混合工資倘連實物一起計算，每年也有九石小米的收入。凡適宜於家庭生產的工作，大概是按件計工的。一個女工在家裏工作，每年約有五石的收入。學徒除供膳宿外，月給二升至四升的津貼。根據這些數字，倘能按着個人的預算，這些工資大的可以保證他的安定。他們的生活水準約等於部隊中的士兵，而比機關人員稍爲好一些，工人的眷屬，能夠作工必須以工作自給，沒有工作能力的，才由廠方按情形補助，文化娛樂的設備，疾病傷亡的救濟，均由廠方担任。女工分娩前後，共有兩個月假期，另給產後津貼。就我們參觀工人宿舍的印象，一個窰洞住四五個人，床舖，衣物家具，一切都簡單化了。這說明着他們的生活，是依着艱苦的計劃來保持安定的。

大體說來，工人的工作情緒相當緊張。參觀時，他們驕傲的告訴我們許多改良生產技術與生產工具的故事。關於這些「改良」的效果，我頗表懷疑，因爲無論怎樣改良，

手工機總是手工機，比起現代的新技術來，局部的改良不過是笑話罷了。可是，工人們工作的自動性與創造性，却不能不予以承認。那怕只是一條毛綫的節約和一分時間的縮短，也同樣可以表明工作者的責任心。

刺激工人生產情緒的方法，第一是精密的工資制度，能夠按着工作的質與量，估訂適當的報酬。第二是生產競賽與超計劃生產的鼓勵，凡是超過計劃以上生產的所得，和節約生產原料的所得中，工人可以佔到百分之八十的利益。第三，應該承認工人的政治教育和工會的權威，也大大的提高了工人的自信力。我曾和難民工廠裏面的十幾個工人談話，從談話中，我看出了他們都接受了一種簡單的邏輯，認爲「共產黨的利益就是工人的利益，爲共產黨做工就是爲自己做工」。當我問他們爲什麽要服從廠長，他們的答覆就是：「廠長是政府派的，政府是我們選的，服從廠長等於服從我們自己」。這種理論，簡單是簡單到極點了，可是他們深信不疑，有信仰就有力量，政治宣傳就是這麼一回事。

識字組是每個工廠都有的，大一點的職工會，還有文化教育委員會之組織，每晚有一個鐘頭的識字課，讀報課，或時事座談會，每月大約有一兩次的晚會。平心而論，職工會雖然免不了做共產黨的工具，但也爲工人做了些切實的工作，甚至開除一個工人

也必須在十天以前通知工會徵取同意。

我們知道，邊區目前所最缺乏的是熟練的技工；我們還知道共產黨的純正理論，是以工人爲標準的無產階級的；根據他們的理論與需要，他們必須爭取工人，也必須得到工人的信仰。所有他們的勞動政策工業制度，都可以用這個政策上的動機來解釋。

勞動英雄

增加生產，一方面要採生產力的組織，屬於此類的組織有變工隊，合作社，婦紡小組等。另方面要提高勞動效率，就有了勞動英雄制度。

勞動英雄制度無疑是斯泰哈諾夫運動的倣製品，但是在邊區這一種制度的重要性可以說遠超過了蘇聯，因爲蘇聯究竟機械化了，人力不屬生產上的主要地位，而陝北生產則全靠人力，人力的質與量有百分之九十的決定的意義。在工業化之國，生產競賽要求機械方面之擴張，在農業社會則端賴人力之發揮。論到這一點，延安的勞動英雄制度是成功的，有了勞動英雄，才有生產競賽，才有模範者的影響：有了勞動英雄的鼓勵，才能給羣衆以刺激，將羣衆的最後一滴汗血都吸收到生產運動上面去；有了勞動英雄，延安產生了在工頭的皮鞭之下都不能發現的勞動奇蹟。

所有勞動英雄都是選舉出來的，它的選舉辦法，是民主而又不民主，說它是民主，因爲這些英雄是名符其實，沒有濫竽充數的人，說它不民主，因爲選舉的方針與辦法，完全代表共產黨的黨策，顯明的是由黨領導的。爲着「農業第一」，規定着重選舉農業

上的勞動英雄，為着鼓勵私人生產；規定人民中的勞動英雄應佔半數；為着鼓勵軍隊生產，又規定部隊英雄應佔四分之一，而尤其可以代表現共產黨的色彩者，是在階級的成分上，規定要選舉貧農和中農；至於富農，原則上是沒有被選資格的，但也有例外。便是『在革命後發展起來』的富農，也應該有幾位，為的是告訴老百姓：「這些英雄都是受過共產黨的恩惠而發財的」。所有延安的統治，就多是這樣的，在民主的方式中增強黨性。

勞動英雄的選舉辦法是這樣：屬於農業的，由村居民大會選舉：屬於部隊的，由連選舉；屬於工業的，由廠職工選舉：屬於機關的，由工作人員選舉；依階級說，勞動英雄制很像從前的科舉，「從秀才舉人到進士狀元。它有鄉英雄，區英雄，縣英雄，分區英雄及全邊區英雄五級。大概是由下一級的英雄互選上一級的英雄，到了邊區英雄，也是分出特等英雄和甲等英雄，有如一甲進士與三甲進士之不同，特等英雄，那就是所謂『勞動狀元』了。

現在邊區的特等勞動英雄，有農業英雄吳滿有。打鹽英雄李文煥，工業英雄趙占魁，部隊英雄張治國，合作社英雄劉建章，以及其他如難民英雄，移民英雄，水利英雄，共十八人。眞是『三十六行，行行出狀元』。

延安出版物中有各種英雄的小册子，但是這裏不想一一介紹。我對他們的勞作精神固然不勝欽佩，他們大體都是勤勞刻苦可以代表我們農民的高貴之一面。可是讀他們的略歷，却是乏味的工作，「窮人出身，大革命翻了身，生產，工作，成爲英雄」，這可以代表他們全部的歷史。在邊區，我們也見到過有名的吳滿有，田二鴻以及縣級的英雄范富庭，燒火的英雄佟玉新。所得的印象是什麼呢？農民的打扮，農民的臉譜，我們賀他「發財了，老鄉」，他囘答一陣天眞無邪的傻笑，和他們談話吧，不外是莊稼，這對於我們大都市來的記者實在太專門了。依我們看來，他們和四川的農夫，廣東的農夫，沒有什麼差別，惟一特別一點的，只是這些英雄現在能夠不感羞澀地和我們坐在一起吃飯喝酒，並且能夠認眞說出「組織」『批評』『決一個定』，『發展』『轉變』『鬥爭』『法西斯』這一套的新名詞。讓我們聽起來，又可笑，又可愛！

當了勞動英雄有什麼光榮呢？是當地的黨政首領到他家道賀；是開民衆大會，讓他胸前戴一朵大紅花坐到台上去受人恭維：是被選到延安去開大會，那情形是：『毛主席，朱總司令，和咱們拾糞的粗手抓握（握手）起來啦，各個機關都請咱們吃啦喝啦，首領還輪流給咱們看酒啦，好像顯得自己弟兄一樣親熱，眞是平等啦，左一杯右一杯，把咱們鬧醉了。咱們說「醉了不敢喝了啦」，首長都笑着說，「一定要喝，你們是光榮的

勞動狀元呀」，去了廿來天，不見一顆米，盡吃白麵，饃饃，麵條條，咱們想換一換口味，政府也不答應，高司令還怕照顧不週到，吩咐說，咱們是新狀元，要好好的優待，眞個把咱們莊稼漢抬到半天空了。咱覺得當了英雄比中狀元還強．．：延安的市場可紅火的太！還有洋樓哩！』聽聽這位勞動英雄的延安遊記，我彷彿見到了他紅臉上裂開了笑紋的得意模樣。的的確確，共產黨給勞動英雄的體面是很慷慨的。延安勞動英雄大會給這些「未見世面」的英雄以一輩子忘不了的印象，特別是請他們坐汽車，我看到許多英雄的感謝詞，特別看重坐汽車的威風。他們是一向未敢夢想坐到汽車的，如今坐到了，怎不歡喜！

毛主席的「抓握」，朱總司令的看酒，不是沒有代價的；『抓握』過了的勞動英雄，自此便個個都是『毛主席』的發言人了，他們回到他那山坳裏去，說共產黨，說「毛主席」，說延安，說「組織起來」；他是見過世面的了，他自然處爲農民中的首領，村長鄉長，都要找他商量，縣府有了貴賓，他得趕去陪客；開民衆大會，他坐在主席台上：變工，納糧，辦合作社，辦小學，他總是頭一個出來說話，村裏有「二流子」，外面來了一個難民，他得幫忙安插；總一句話，他現在是出人頭地了，羣衆相信他，政府看重他，而他自己呢，覺得「毛主席」是他一輩子的知己，粉身碎骨也要對得起「毛主席

」才好，不信，請看一看下面的「勞動英雄公約」：

發展自己經濟　幫助別人生產　領導變工札工
創立模範鄉村　爭取耕二餘一　自己首先完成
擁護咱們軍隊　攪好自衛民兵　切忌虛僞誇張
承當勞動英雄

然而這還不過是勞動英雄對於共產黨報答的一點，決不能包括英雄的全部作用，因爲延安當局所以賞給英雄們以這樣的體面，目的並非酬報他們的辛苦，而是擴大他的影響，到處開民衆大會，要英雄報告，要羣衆向英雄看齊，要大家以英雄爲模範來報效共產黨政府，樸素的農民是好勝的，他們的好勝心激動起來了，「和吳滿有比賽」，「超過吳滿有」—「趙占魁運動」；「向張治國看齊」—這眞是一種有力的社會教育，生產教育，競賽制度發展了，許多工作人員的眷屬情願勒緊褲帶爭一個向「眷屬女英雄陳敏看齊」。有些工人半夜裏偷偷起來做工，有些士兵兩手血淋淋的，還緊握着鋤頭種地，只爲的要上面褒揚幾句話；競賽的原則不僅限於提高效率，增加勞動的質和量，同時也包含節約材料減低成本，所有比賽的成績都在公共場所公佈出來，給人以不斷的刺戟，不斷的興奮；到處是一片「加油」之聲。以農具工廠爲例，展開了趙占魁運動之後，同樣

的人工同樣的時間，產量提高了百分之二百，成品損傷減少了百分之十五。以留守兵團每畝地耕耘收穫的工時為例，從前每畝需十二工，發動競賽以後；每畝減到六工，勞動效率增強了百分之百。以燒火英雄佟玉新為例，每天燒二十六鍋水，從前要消耗三百二十斤炭，經他改良鍋灶之後，每天只需七十斤，一天節省二百五十斤，十七個月為他服務的機關省下十二萬五千斤炭。

勞動英雄的另外一種任務，是提出他們的工作經驗。每一位英雄的創造與經驗，都被人總結紀錄下來，向羣衆宣傳，像佟玉新還被許多機關請去改良鍋灶。

有幾位勞動英雄，不僅是有經驗的農夫，並且被證明是很好的行政人員。他們要以自己的努力為中心，使自己住的地方成為模範村模範鄉。現在最有名的，有吳滿有的吳家棗園，田二鴻的裴莊，劉玉厚的郝家橋，還幾個鄉村都是以勞動英雄的活動為中心建設起來的。在變工，婦紡，辦小學冬學，移民，改良衛生，改變二流子等等事情上，都比普通鄉村做得好些。

勞動英雄制度的最初動機，本只是提高勞動效率，但是現在的成果却已大大的超過了這最初的目的，一如我們看到，這些英雄們不僅成為羣衆學習的模範，他們並成了共產黨和民衆之間的橋樑，由於他們的活動，使得邊區民衆雖在共產黨執政之下而仍能發

生平等的感覺。不問這種平等是眞是假，它的確已相當的提高了農工的自尊心，而使他們樂於追隨着共產黨的政策。

勞動英雄制可以提高勞動效率，同時找出和勞動英雄相反的人，而加以改造，減少不生產的寄生蟲，這方面的工作，叫做「改造二流子」。

二流子並非就是流氓地痞。流氓地痞幹的是敲詐勒索拐騙搶刼，二流子只不過是好吃懶做的無業遊民。但因爲他們不勞動，所以要加以改造，據他們自己的估計，全邊區共有九千五百個這樣的二流子，現在已有三分之二轉變爲生產者。

二流子的改造包括意識習慣與生活環境兩方面的工作。事先還須有嚴密的調查，判定誰是二流子，誰是半二流子。完全無業而靠不良行爲爲生者，如巫神娼妓，販買鴉片煙的，是正式的二流子；有正當職業而兼靠不良行爲維持生活者，是半二流子。此外，如只有不良嗜好，就不能算是二流子。查清了這些，然後將他們編成二流子小組，或者由村長，勞動英雄來勸導。用各種方式來給他以精神的壓迫：開羣衆大會，大家來羞辱他，這是一種辦法；開勞動英雄大會，教二流子來旁聽，讓他們感到勞動的光榮，這又是一種辦法；在他家裏掛一個二流子牌子，讓大家喊他「二流子」，這是一種辦法，發

動全鄉人，對他施行封鎖，這也是一種辦法：總而言之，勸說，感化，宣傳，各種方法一齊來，形成一種羣衆運動。大部意志不堅固的二流子，經過這樣刺激，總避免不了要轉變的。至於少數頑固的，自然費工夫一點，結果就免不了使用強迫勞動的辦法了。

願意轉變的二流子，大約總有人幫助他的生產資本，勞動英雄常是他們的施主，分給他們土地，借給他們以種子農具，而且最有效的方法是將他們編入變工隊，爲的變工隊是輪流種各家的地的，誰也不會讓誰偷懶，受了大家的監督自然會養成勞動習慣，已轉變了的二流子且有當選爲勞動英雄的，「二流子英雄劉生海」便是最著名的一個。除了改造二流子，獎勵移民難民也是增加勞動力的方法之一；三年來這一類的人數約達六萬，移民是從人口稠密的地區移到地廣人稀的地區去開荒；難民是邊區以外進去的。對於他們，邊區政府有一個優待條例。規定分地，貸款，免稅三年等等辦法；但關於難民的安置，事實上民間的幫助還比公家有效，這是因爲北方一帶逃荒本來是常事，農民的移動性較大，由於實際的需要，農民自然有一種互助的溫情。況且地廣人稀的地方，土地的爭執既少，有誰不願意多來一家鄰居，破除寂寞呢！

財政、所得與負擔

邊區的財政有一點特別的情形，是收入中的「公營經濟」的地位，和支出中「自給制度」的作用。公營經濟包括工廠部隊機關學校生產和政府的商業貿易收入，在去年的總收入中，這方面供給了差不多四分之三。自給制度，也就是各部隊機關學校從自己所經營的生產所得中，提出來開支本機關職工生活費之一部，在去年的財政支出中，百分之六十四就是由各機關自給的。因此邊區財政廳得預備兩重預算，一份是數字的預算，那就是統計全邊區應該有多少開支多少收入的數目表；另一份是從數字預算中，除了公營經濟的收入，還應該向老百姓取多少錢；再從數字預算，除了各機關自給的數字，還應該由財政廳實支多少出去。

具體的財政數字，我們是無法知道的，我們所得的報告都是百分比，現在就依這個百分比來看看去年的邊區財政：在收入方面，公營經濟中的機關生產自給的佔百分之六十四，政府的貿易商業所得佔百分之八，因此可以說，百分之七十二的收入屬於公營經濟的所得；直接取之於民的租稅，據說除了公糧草不算，約佔總收入百分之十，另外百

分之十八的虧空，是向「邊區銀行」透支的。

在支出中，既然有百分之六十四是各機關自給的，那麼由財政廳實發的就只有百分之廿六了，所以邊區財政廳的任務，在這裏只是這百分之廿六的收支問題。據我們知道，去年邊區人民應繳的公糧是十八萬担，約合時價三十八萬萬邊幣。另外有六十萬萬邊幣的開支，全部大約是九十萬萬邊幣。假定今年增加百分之三十那就須有一百二十萬萬元的預算了。我們不必為這龐大的數字而驚異，要知它折合法幣，還須照邊幣和法幣的比價八點五來除一下。

要知道他們各部門總支出的情形，可以依下面比例計算，軍費佔支出的百分之四十五，政費佔百分之十七，教育費百分之十五，救濟衛生費百分之六。

我這種估算的方法，等於向陝北老百姓問路途的里程，其間相差一定很大，或許眞實的數字會證明我所算的根本是笑話。但延安既然吝於發表數字，我們就來瞎猜又何妨礙？不過要請讀者千萬不要把我的估計當做什麼「專家的判斷」。

現在再來看看老百姓的負担。

據延安發表，去年徵收的公糧（十八萬石），約佔老百姓的農業收益的百分之十二

。那麽，邊區農民的全年所得，是不是三百萬萬邊幣的樣子呢？平均分配於一百卅五萬的農民，每個農民的所得約爲二萬二千元邊幣（兩千五百元法幣的樣子）。

另方面，有二十七萬貧農是免稅的，所以對於納稅的農民，所負担的公糧，公鹽以及其他教育費救濟費的附加稅；約佔其收入百分之十四。也就是，每人（老人小孩子都在內）平均約須負担三千元邊幣。含法幣三百六十元，折合小米一斗五升。

這筆賬是不完全的，因爲我們只能估計農民的正業所得，而不能估計他們手工業與副業的收入，所以關於農民的全部所得，就無法估算。再則，這是全體人的平均數而不是每一個勞作農民的平均數，不過可以這樣說，邊區人民的全年所得，若依人口來平均，最高不會超過三萬元邊幣。最低二萬二千元。只有在少數的模範村，例如吳家棗園，每人收入的平均數能達到二石細糧也即是四萬邊幣的標準，而這村人的負担平均每人是四斗二升，另外一個模範的郝家橋，每人平均的所得就只有一點二九石細糧。

依邊區農民的生活水準算，每人一年吃的消耗約須一石，加上穿衣和零用，至少得一石五斗，所以他們的生產運動，假如能將農民的全年所得提高到每人一石五斗（三千五百元法幣）的標準，才可以達到豐衣足食的理想，目前的情況，可以保證足食，却不能保證豐衣，其他方面的生活，自然更談不到了。

比起軍閥時代，陝北民衆生活是改善得多了；但就需要量而言，他們的生計依然是刻苦的。

徵收公糧的標準是照累進稅率計算的，將農戶的產糧依人數平均，五斗以上起徵，最低率百分之三，最高稅率百分之三十五。若依各級層的負担分析，地主平均負担其收益額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三十五。富農的負担自百分之二十至三十，中農的負担自百分之九至二十，貧農自百分之九至十二。僱農自己種一點地的，也須繳納百分之三至五。

延安當局感到救國公糧還不夠「公平」，因爲地主的收益是不勞而獲的，佃農的收益是汗血生產的，救國公糧的累進率只能對收益的數量表示公平，却不能分別產品的性質公平處置。因此去年下半年開始在延安，綏德，慶陽等縣試行農業統一累進稅，它是將農業收益，與土地財產合併起來的新稅制。徵課的範圍及於耕地，農產，副業所得，地租房租，牧畜收入，運輸收入等等。有一種極爲繁瑣的徵課方法和計算標準。據試驗的結果，這種稅制比救國公糧似乎精密一點。對於地主與富農，新稅制的負担平均是增加了，中農以下的負担則較前減低。

在農村中是否有若干附加的臨時捐稅，我們沒有詳細的資料。人力畜力的服役，則有公糧運輸與公鹽運輸兩種。其負擔視各地情形而有輕重。臨時勞役如擔架修路，去年

共動員四萬五千人，依去年平均，全邊區每個人須爲上述勞役耗費六小時的工作時間。此外如「擁軍」的工作，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算是民衆對公家的消耗，不過，這到底不能算是是正規的負擔。

次於農業税的税收是商業税。這包括商店收益與糧食牧畜買賣的徵課，去年佔了總税收百分之三十七。

工業，據說是免税的，爲的是要提倡製造事業。

民主方式的黨政

從組織說，邊區的政治系統是簡單明瞭的，政權分三級，鄉政府是最基礎的組織，縣政府爲推行政令之樞紐，「邊區政府」爲行政權的最高機關。另外有兩級不代表政權的主體而代表控制作用的機關，一是專員公署，它代表「邊區政府」督察領導各縣政權；一是區公署，它協助縣政府指導鄉政權。三級政權，各有其參議會，依他們的書面紀錄，各級參議員都是直接民選的，即是：每二十人至六十人的居民小組選一名參議員於鄉參議會，每四百人至八百人選一名參議員於縣參議會，每八千人選一名參議員於邊區參議會。從各級的參議會裏再產生鄉，縣，邊區政府的委員，和鄉長，縣長，及邊區政府的正副主席。至於選舉的辦法，據說是「普遍，直接，平等，無記名，並且是不分階級，黨派，職業，男女，宗教，民族，財產，和文化程度」的，就我們參觀的印象，鄉政權的產生，比較簡單，因而民意的成份相當可靠，縣以上各級選舉的民主性，則尙有待乎研究。

鄉政權的組織是比較値得介紹的。鄉長受雙重的約束，他由鄉參議會選舉再由縣府

加委，他可以由鄉參議會罷免也可以由縣府單方撤職；在他之下，有一個鄉文書，是上級派來的「幹部」，名義是助手，實際是鄉長的智囊，因爲民選的鄉長大都是農民出身的非知識分子。還有一個自衛軍連長，管理民兵治安，一個行政村主任，管理所屬自然村的政務，行政村主任是鄉長委的，自衛軍連長則由縣府選任。下面的自然村，各有村長，由村民大會選舉。普通一個鄉政權裏，大概是有兩種羣衆組織，一是羣衆的經濟組織，有農會減租會，變工隊。婦紡小組，合作社運輸隊，義倉等；一是羣衆的文化組織，有小學，冬學，村學，識字組，讀報組，黑板報，秧歌隊，衛生小組等，鄉長的任務，就在對付這些事情，鄉文書很像部隊裏的參謀長，製訂作戰計劃而由鄉長出頭去幹。在羣衆方面，勞動英雄是鄉長必須爭取合作的目標，日常事務，由鄉長，文書，自衛軍連長組織政務會議討論，重大的問題則開參議會。也就是「一攬子會」，除參議員外，文書，自衛軍連長，勞動英雄，變工隊長……等，一齊參加。一攬子會的性質雖不分明，但是它將議事的與執行的會在一起討論，已經證明有很好的效果。

鄉村的選舉情形，並不十分拘泥形式。棄權的人還是不少。一般的說，參加的選民只有百分之六十七十的樣子。因爲農民不識字的居多，所以用種種通俗的辦法代替寫票，有的地方叫選舉做「燒香窟窿」，那就是用香在被選人的名字上燒一個窟窿，有些地

方的習慣，候選人各有一個木箱，選舉人在他所要選舉的人的箱子裏投一顆黑豆，也就算選舉。有些地方，則由一個人背一隻箱子，巡迴到選家民裏去請他們投票，這叫做背箱，鄉參議員的選舉，因爲都是本地人，知道得較清楚，所以並不複雜；縣級以上，尤其是邊區參議會的選舉，那就不是一般選民所盡能運用的了。有甚麼方法可以保證八千個鄉下農民能夠保持主觀的判斷，選舉一個不相識的參議員呢？事實上，邊區參議會除了選舉之外，還有不少聘任的參議員，甚至還有日本籍的參議員，它自己也並不拘泥什麼形式。

通俗化的政治邏輯說；既然政府是人民選舉的，爲什麼司法要獨立於行政權之外呢？因此，在兩級兩審的司法制度中，初審是由縣長兼任處長的司法處審理的，二審是高等法院或高等法院的分院。這些院長也是邊區政府所任命的。訴訟的最後階段可以告到邊區政府，假如訴訟人不服高等法院判决的話。司法情形，也同其他延安人的工作一樣不拘泥形式，輕微的案子，以調解爲主，許多糾紛便在鄉長那裏「吃講茶」了事，免得勞民傷財，妨礙生產，這不能不算是合乎農村口味。

法律條文，也並不一定，有幾種特殊法，如婚姻、土地等；其餘參用中央法令，但也不規定要引用條文，法官根據情形，有很大的解釋運用的自由，必要時還可以創造例

外的判決，去年二月，還發佈過「保障人權財權條例」，它的實際的情形我們很不清楚；「寬大政策」却有相當的效果，那就是說，凡是漢奸，或反對邊區政府的人，倘被發覺，除非時機非常急迫，他們不願意加以嚴刑。他們會派人來說服檢討，很「客氣」地請你來個「坦白運動」——也就是自首，請你在公衆大會上發表報告，將自己所屬的一方的罪惡宣佈出來。只要你保證洗手不幹，他們也就容許你生命的安全，或甚至保證原有的工作，總一句話，這是用懷柔的方法代替牢獄與殺人，正和改變二流子反巫神的方法一樣。當作一種手段來看，這是較為聰明的，有時，它的成功甚至達到矯枉過正的程度，往往有些「坦白運動」的英雄弄到過火的坦白，有意加強自己的罪狀，揑造自己沒有做過的惡事，以證明其「坦白」，這是笑話，可是聽說是常常有的。至於極少數不肯「坦白」的人，那自然會有牢獄在等候他。在牢獄裏面得照樣學習生產，用你自己的汗血作你自己的囚糧。看守所與監獄，在某種意義上是俘虜們的勞動營，延安人決不放棄每一個勞動力的運用。

縣政權的運用，除了縣長包辦司法和一個專權的政務秘書之外，沒有別的特色；邊區政府則擁有一個辦公廳和民財建教四個廳，另外有保安處，高等法院，民族事務委員會。

全邊區的行政幹部，上自邊區政府，下至鄉公所，共四千五百五十八名，其中屬於「邊府」級的幹部只有三百六十七名，其餘的都是基層政治幹部。然而，不論是一個鄉文書也好，各廳處院的長官也好，在系統上全部都是由民政廳統一管理的。除了一般的管理之外，對於失職的幹部，民衆「有用任何方式向政府控告之權」，同時，「凡因幹部犯錯誤而致某一方面受到損失時，應將此幹部之懲戒通知該方面之負責人或羣衆，必要時並應請其參加懲戒之決定，及使犯錯誤者向其道歉或賠償損失」。我們不知道這兩條規定確實做到了什麼程度，不過從條文上我們可以想到延安的行政幹部，是沒有甚麼特殊的威風可以向民衆擺架子的，延安人的羣衆主義，不容許行政人員有激起羣衆反感的態度與行爲，一個幹部，要想升官，也必得在羣衆工作中建築地位，這頗有一點公僕的精神，也是我們應當公平承認的，雖然有時免不了譁衆媚俗的流弊。

從延安的行政人員觀察延安的政風，第一特點是實事求是，不談空話，不唱高調，不迷信洋教條，不拘泥一定的形式，而只是面對現實，從實際上考慮辦法解決困難；凡這些優點，已經表現在生產教育的各方面了，不必再說；第二個特點是相當辦到了業務的專注與機關人員的精簡，他們懂得了「兩鳥在林不如一鳥在手」的原則，決不在同一時間內無限制的擴張業務，卻是集中力量來幹一二件事。現在就是生產第一教育第二，

而在生產中又提出農業第一，在教育中又提出「幹部教育第一」來以求業務的專注；至於機關與人員，近兩年也裁減了不少，不僅系統簡單，管理集中，且也減少了吃公糧者的數目，同時將有用的人力轉移到生產事業上去，在邊區政府和基層政治人員質與量的分配上，也相當合理，沒有頭重脚輕的毛病，也沒有人才向都市集中的現象，第三是檢討的認眞與批評的嚴肅，事有錯誤必求反省，人有錯誤立刻批評，所以雖有錯誤，也隨時能夠糾正，不至於嚴重化；就是我們外人批評他們，除了黨策是他們必須辯護之外，其餘的事情，大概都能虛心討論，或者承認錯誤。

至於貪汚揩油，假公濟私一類的通病，延安自然也並非沒有，不過在那一種環境裏面，發生的可能性似乎低一點。

三三制之意義

『三三制』是中共十大政策之一，也被列入了『邊區施政綱領』第五條，那一條的原文是：『本黨願意與各黨各派及一切羣衆團體進行選舉聯盟，並在候選名單中確定共產黨員只佔三分之一，以便各黨各派及無黨派人士均能參加邊區行政之管理，在共產黨被選爲某一行政機關之主管人員時，應保證該機關之職員有三分之二爲黨外人士充任，共產黨應與這些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辦』。

再看實際的情形；三十年實行三三制選舉以後，在某十四個縣鄉參議員中，共產黨籍的佔百分之二十四，黨外人佔百分之七十六，在六個縣的縣委中，共產黨佔百分之三十三，黨外人佔百分之六十七，其常駐委員會中，共產黨佔百分之三十七，黨外人佔百分之六十三，邊區參議會中，共產黨員仍然超過三分之一，（超過了多少，沒有發表），但在邊區政府委員及常駐委員會中，共產黨各佔三分之一。用什麼方法，保持這種比例呢？據說是『由於共產黨自己的約束』，在選舉中，『共產黨責成自己的黨員選舉黨外人士』，選舉結果，『遇有共產黨人超過三分之一時，大多以辭職辦法退至三分之一

』。只有行政機關中，共產黨員仍佔大多數。

許多人懷疑共產黨對於三三制的誠意，以爲他們幹這一套只是掩人耳目的把戲，這是錯的，我可以說，共產黨施行三三制，並非假的，因爲依它的力量，它本來可以包辦，而今確然有不少黨外人士參加行政工作，例如『邊區政府』中，副主席李鼎銘，是米脂富紳，建設廳長霍子樂，教育廳長柳湜，副廳長賀連城，參議會副議長文安欽，都是有名的黨外人物。這不能不算是共產黨對於自己的約束。可是這與我們所了解的民主是無關的。依我的看法，共產黨的這種『新民主』辦法，一言以蔽之是『放棄權力的外貌控住權力的本質』，雖說三三制容許三分之二的黨外人士參加，然而『黨外人士』並不就等於『反對黨』。這是很明白的：『各黨各派』在邊區還是有名無實的。至於邊區的國民黨員，卽說是眞有其人，也是說離了國民黨組織的黨員，共產黨倘要加強三三制的民主性，還必須進一步，在事實上容許各黨各派有組織，宣傳，公開競爭的自由，由各黨派的組織來選舉他們的代表，而不必出於共產黨的恩賜。

那麼，可以說共產黨實施三三制，完全是「騙人的把戲」麼？那也不是的。三三制雖不足以代表完全的民主。却不失爲聰明漂亮的辦法。第一，就邊區的政治條件來說，共產對於行政方面的事情”始終取着整個的領導而不願取局部的干涉，引人反感，旣然

這些非黨人士之當選，是由於共黨的幫助的，那就可以說他們多少是共產黨所滿意的人，何況在各級參議會中，農民出身的總佔百分的八九十，地主士紳商人不過是百分之二三而已。一個無黨的農民參議員在接受共產黨黨策一事上，與共產黨員有什麼區別呢？從這點來說，共產黨實在沒有包辦的必要。其次論到這少數地主士紳商人，固然絕少反抗力量，儘可摒諸大門之外，可是拒絕究竟不如爭取，拒絕的結果是不合作，爭取得好却可以增加黨策的便利。拒絕他們，只能強迫他們不動而不能推動他們服從共產黨，爭取他們則可以有機會領導他們到自己的方向來，這就是共產黨「尊重多數，照顧少數」政策的動機。這動機看來民主，却是現實的。

為了實行三三制，共產黨領導政治的方式也有了若干的改變，黨對政府本來沒有法定的關係，因為政府至少在形式上是邊區參議會產生的，黨不能以命令直接指揮政府，黨政的關係必須分劃清楚，免得被人指摘為黨政府，因此須避免事事干涉，代替包辦的嫌疑，而代以系統的，原則的，政策的，大政方針的領導，而且領導的方式，也不能強制黨外人士來服從黨，黨的組織也無權使參議會及政府機關必須服從。惟一的辦法，只有通過政府機關中的黨團來對黨外人士進行說服與政治工作，萬一說服失敗，黨團的意見不為政府或參議會所接受，黨員也惟有遵守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不僅如此，黨組織

及黨員還必須成為執行參議會及政府法令的模範。換句話，為保證三三制的參議會及政府不違反共產黨的領導，共產黨所能做的工作，只有提高黨員的素質，選派得力的黨幹部到政府去，這些參加政治的黨員在言論行動上，必須絕對服從黨策，萬一違反黨紀，就應當受到黨的處分。——這一切，都是『整風文獻中』告訴我們的共產黨領導政治的一般方式。而我們也可以從這種方式上看出共產黨領導政治的特色，是利用說服宣傳爭取來代替形式上的控制與命令。

執行黨策的軍隊

共產黨管理邊區的行政骨架是邊區政府，政府的背後當然是武力。從種種方面看起來，黨在軍隊裏的活動遠比政治上的活動普遍而深刻，朱德將軍的部屬；在邊區內穿的是紅軍裝束，可是一到邊界以外，就換上了國軍的武裝與番號；但是不管他們以何樣身份出現，它和邊區政府似乎沒有法定的關係；它當然不隸屬於邊區政府，因為邊府始終是地方規模的組織；它也沒有將十八集團軍的名義，正式拿出來應用，為了滿足我們對於那方面軍隊的理解，葉劍英參謀長曾向我們記者團做了五小時的報告。那報告的總題，就叫做『中共抗戰一般情況的介紹』，單看題目，我們可以知道他們是把這一支武力的所有成果記在『中共』賬上的。換一句話說，他們並不諱言這支軍隊是黨的武力，只有黨可以指揮它，只有黨，有權領導它。而且，它的規模也是普遍性的，朱德將軍的司令部在地位上比邊區政府高得多；與邊區政府平行的軍事機關，應該是賀龍師長所指揮的留守兵團。

關於這一支武力，我個人所知道的太少了，葉劍英參謀長的報告，純屬敵後抗戰情況

，超出了我敍述的範圍，只好從略，關於邊區的部隊，我們只得到一些靜態的資料。倘說我們人參觀所得，則他們在生產方面所給我的印象，比他們的戰鬥訓練更爲深刻。

邊區的武力組織，有如一座金字塔，要了解它，須得從金字塔的底面看起。這一個底部，就是廣泛的民間武力，它的通俗名稱是紅纓槍，官名是自衞軍，在從前叫做赤衞軍。所有十八歲以上的男子，都得參加，大概是沒有規定的軍服的，但是白衣，白的頭巾，腰間札一條布帶子，握着紅纓槍，很有引人的魅力。現在是，連八九歲的男孩子也鬧着紅纓鎗的把戲了，這些紅纓槍在邊區內共有十四萬人，合起來每一鄉有一連，連長是縣府派的，至於他們的任務平時只是放哨，查路條，鎮壓那些強盜小偷：作戰的時候可以做担架運輸等等的任務。

比紅纓槍高一層的武力，叫做基幹自衞軍，他們是從紅纓槍裏面挑選出來的，凡是身體結實，思想可靠的紅纓槍，被共產黨的幹部看中了，就設法鼓勵他充當基幹自衞軍，他們的裝備，比紅纓槍好得有限，但是軍事訓練的時間却多得多：平時不脫離生產，戰時可以上火線。不過，以不離家鄉爲原則。這一層武力，據說邊區有四萬多人。

再上一層，是保安隊，這是從前的游擊隊改編的，是正正式式的軍隊了，具有常備軍的性質而又有地方軍的色彩，人數不清楚。

頂上一層，就是正規軍。現在我們只知道有三個師，便是有名的賀龍師，林彪師，劉伯承師，總數據說五萬人的樣子，但駐在邊區的數目多少，也不清楚。正規兵的補充，大概就由基幹自衛軍中挑選，用政治工作獎勵他們入伍。抗戰以後入伍的，據說有七千五百人。

所有在邊區的部隊，並不由朱德將軍直接統領，是由一個留守兵團所掌管的，留守兵團的組織相當大，司令員是賀龍師長。

邊區流傳着關於他的許多故事。尤以軍中為甚。據說陝北過去三年必有一旱，但是這幾年却年年豐收，老百姓奇怪何以旱神久未光臨，後來就得到一個解釋，說活龍來了，怎會有旱災呢！老百姓把賀龍當作「活龍」，眞是無稽之談，但很可以看出他的威望正與日俱增，他的性格和他的相貌很不相稱，照相貌看，胖胖的有一撮東洋鬍子，頗具威儀，應該是一位優雅溫和的紳士，可是他的性格却是剛烈憤激的。在王家坪晚餐中談到他們的軍隊，他吐露出最激昂的不平之鳴，越說越氣，終至於不終席而去。

雖然對於軍事我是外行，但如果專從裝備武器上來衡量他們的武力，那簡直是無可注意的；他們有些什麼武器呢？手榴彈，擲彈筒，七折八湊的步槍，如是而已！機關槍就已被他們視為珍品了，小型的砲也有些，大砲重砲就只有充當陳列品了，因為沒有砲

彈。坦克車隊還是夢想，連步槍都不夠分配呢，所以武器註定他們只能打游擊。在那廣大的平原中崎嶇的鳥道上，和敵人做捉迷藏的遊戲。

因爲武器的簡陋，便只得從人力上發揮，這和他們的生產運動是同一作風的。要組織人力，提高人力，便有黨幹部來參加軍隊的「思想武裝」工作，這制度在師旅部的名稱是政治部，團是政治處，各設主任，再下級的，團有政治教導員，還是幹經常的政治工作的，屬於總政治部。另外，師旅部中還有一位黨方面派的政治委員，是代表黨來確定師旅部的整個政治路線的，在連以下，還有黨支部，支部的書記，一般卽兼任政治指導員，所有部隊的重要行動，指揮官的命令都須得到政治委員的連署。這就是共產黨所賴以確立軍隊領導權的一個樞紐。

政治部的工作有許多特點，它不僅施行士兵教育宣傳，同時還有審查思想的組織，士兵教育分文化科與政治科，前者是識字寫作，後者是黨策宣傳，每連的軍人俱樂部，也不止是一個文化娛樂的機關，許多工作，如爭取逃兵，防奸、和其他羣衆性的工作，都通過俱樂部來做。爲了糾正幹部思想，有些部隊還設有「整風班」，各連隊每年有兩三次的「反省坦白」運動，讓每個幹部與士兵盡量宣布他的不滿與不平，同時誠實招認自己的錯誤，供給上頭參考。各部隊還選有各種英雄，作爲好的典型，極力鼓吹，以代

替空洞抽象的教訓。打罵制度，原則上是禁止的，但並未絕跡。一般都以爭取感化代替懲罰，用積極的獎勵代替消極的制裁。最好的士兵，大概都被吸收進黨裏面去了。同時各部隊也一定有許多黨員參加，在裏面做榜樣。對於民衆，惟一的原則是爭取，其方式與一般羣衆工作沒有兩樣。

在政治機構方面，共產黨的勢力是潛在的，並沒有法定的控制形式，但在軍隊領導方面，共產黨萬分仔細，不允許有絲毫的鬆懈。軍隊裏有黨組織，有政治委員，有政治部主任，還將軍隊中的黨組織和各級的黨部緊密的聯結起來。從三十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決議上，我們可以看到，他們使軍隊中軍政委員會及政治部，成爲同級的黨委（中央局，分局，區黨委，地委）的一部門，和組織宣傳各部並列，這樣，軍隊的黨是直接由同級的黨委來領導了。然而他們覺得這樣還不夠嚴密，他們進一步決議：爲統一地方黨與軍隊黨的領導，以後黨中央分局，區委，地委的書記，兼任軍區，分區，師旅部的政治委員。這就是說，由各級黨部的最主要的負責人來直接担任軍部的政治委員。自然的結果是：「軍隊必須執行各級黨委的決議，無條件的服從共產黨的領導」了。

軍隊和「邊區政府」差不多是通過黨組織來發生聯繫的，軍方的首腦，大概都被邀請到各級的參議會去佔一個位置。依他們的選舉法，士兵是有選舉權的。

去年以來，共產黨又發起了兩個運動，一個是軍隊裏的「擁政愛民」運動，一個是政府與民衆的「擁軍」運動。到處牆上寫着這兩種「公約」。各處部隊，召集民衆開會，向民衆大大的「坦白」，將過去對不起民衆的地方一一招認而最後加以道歉，各部隊派人到民衆調查，凡被軍隊借過東西損害過東西的，開出來酌量賠償，今年正月，那些官兵還到民衆家裏去拜年，送年畫，約老百姓吃年飯，開歡迎會，有時也幫助農民鋤草收割。還有，過去侵佔來的民地，也查出來退還原主，這叫做『擁政愛民』。

老百姓方面，爲着「擁軍」，他們幫助駐軍調劑熟地，種子，農具，糧食，等等。還有送猪，送羊，送柴炭，鞋襪以及鈔票，等等的慰勞。而最重要的一件事，便是優抗工作，抗屬的生活，由地方民衆保證，沒有田地的，調劑他的田地，缺乏勞動力的由民衆代耕，同時由勞動英雄等出來幫助抗屬經營副業，「建立家務」。據去年的統計，邊區民衆爲抗屬代耕的土地有十五萬畝，享受代耕的抗屬有一萬七千多人。不過，優抗的主要目的在使抗屬能夠生產自給。非完全缺乏勞動力，多少總得自給一部。

一般士兵的生活，吃穿大體都過得去，可是生產工作也夠辛苦，因此逃兵也是常有的。不過他們處置逃兵的方法，並非懲罰槍斃，而是動員本地的民衆，請他『歸隊』，一個兵逃回來，會有鄉村長勞動英雄等天天來說服他，逼得他非歸隊不可。原則上，

歸隊工作由地方幹部負責，軍隊不能直接下鄉提人，至於實際情形是否做得這麼好，我們也無從證明。

綜合上面的觀察，我們可以認識第十八集團軍的特點，第一固是黨化，第二是對於軍民關係的政治工作，也做得澈底。如果單用武器的標準來估計它的力量是要失敗的。

領導與作風

從以前各章的敍述中，我相信讀者一定已能了解邊區各方面的生活，差不多都有一個共產黨的勢力在那裏活動，雖然一般人慣於把黨政軍民四種組織相提並論，這種看法是錯誤的；共產黨並不是與政軍民平等的組織，也不是超然於政軍民上面的高一級的組織。而是政軍民三種組織的中心組織，打一個譬喻，共產黨是軸心，政軍民三種組織便是它的外圍，圍繞着黨的政策而活動，有如衛星的環衛母星，同時，加入政軍民三種組織中的共產黨黨員，也正在如軸心放射出來的軸線，受着黨的提調，而在其服務機關也成爲一種小軸心，使這個組織圍繞着他們活動，因此我們可以看到，邊區四種組織中，只有共產黨能夠領導其餘三種組織之任何一種，軍與政，軍與民，政與民之間，也都是通過黨團的作用而發生聯繫，共產黨並不是自居於政府上面，統治住政府，再間接的指揮軍隊領導羣衆的，它是以軸心幅射的方式直接的控制政軍民三種組織的。這點我們必須記住。

在領導的系統上，共產黨既居於全國性的地位，邊區只能算是它根據地之一，所以

1237A11

它並不由黨中央直接領導邊區，而由它的中央政治局西北分局來領導，分局之下，有區黨委，地委，縣委等，各領導其同級的政軍民組織，西北局則並不是黨組織的一級，而是中央的代表機關，有如元朝的「行中書省」。爲什麼要採取這樣的領導方式呢？大概是因爲共產黨確認了邊區政府只是一個地方政府。交給分局領導，則就全國的規模說來，共產黨還不失其爲在野黨的資格，而且也不妨礙到邊區政府之爲中央政府下面的地方政權。

共產黨中央政治局西北局的書記，是高崗先生，他同時是邊區參議會議長。以「領導一元化」的系統說，他是統一領導邊區地方黨軍隊黨的最高人物。在延安巨頭肖像的懸掛次序上，他的肖像是僅次於毛朱兩氏的，遠在中共長征到陝北之前，他已和死去的劉志丹在陝北鬧土地革命了，這經歷大大的幫助了他今日的地位，因爲他事實上就是本地老幹部的領袖，至今提起「高司令」，老百姓沒有一個不知道。從各人肖像上我第一次看見他的相貌，是穿西裝的，可是一經見面，却遠不如他照相的漂亮。他是一個行動家，不僅很少理論，而且拙於辭令，我們曾請他解釋「西北局」的性質，和參議會的選舉辦法，我們是打破沙鍋問到底，至少有三四次將他問得幾乎惱怒起來，雖然很費力的解釋，仍然不能給我們以滿足。

前年開始的整風運動，使得共產黨在各方面的工作都表現出新的氣象來。整風——就是反主觀主義，反宗派主義，反對黨八股——並不是理論而是有實際意義。我們知道初期的陝甘寧邊區還是各種勢力之綜合，一方面由大都市吸收來許多知識分子担任理論文化的工作，而這些智識分子多少還殘存一些上海「亭子間」生活的習慣，他們不能做樸質無華的實際工作，却能堆砌漂亮的馬克斯列甯的詞句，論到工作態度，這些人避免不了英雄主義的色彩，有機會總想炫耀自己，對於這一種作風，毛澤東先生宣佈之爲教條主義主觀主義而加以打倒。其次從江西突圍到建立邊區這一段長時期中，共產黨招收了三山五嶽的英雄好漢，而同時在陝北也有其土地革命的舊系統。匯合了這許多勢力。自然免不了有宗派門戶，說好聽一點，是老幹部與新幹部的摩擦，土著勢力與外來勢力對抗，說得難聽一點，就是軍閥主義的死灰復燃，土匪主義之故態復萌：而總括一句話就是各鬧其獨立之性，對於這種作風，毛澤東先生宣佈之爲『宗派主義』而加以打倒。最後共產黨在邊區安定以後，在一時期內不可避免的發生了鬆懈的傾向，在黨的文字理論上是空話連篇言之無物，裝腔作勢藉以嚇人，在工作上鋪揚張厲擺臭架子，因循敷衍粉飾太平，對於這種作風，毛澤東先生宣佈之爲『黨八股』『官僚主義』『形式主義』

而加以打倒。打倒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打倒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打倒黨八股以整頓文風，這就是整頓三風的理論與背景。

共產黨的整風運動也是成功的，舊的三風打倒了，新的三風已經建立了起來，代替主觀主義，已在建立起『從實際中來，到實際中去，從羣衆中來，到羣衆中去』的新作風；代替宗派主義，建立起了『領導的一元化』的新作風；代替官僚主義與形式主義的，就是『精簡業務，實事求是』的新作風。第一種新作風表現於延安生產，教育工作上的爭取羣衆尊重現實：第二種新作風表現於共產黨在軍政民組織中的控制與領導；第三種作風表現於延安幹部在生活上的平民化，工作上的認眞與學習上的虛心。關於這些新作風的表現，我在以前各章中都已提到，這裏不過綜結一下，不贅複敍述了。

整風運動是共產黨內部的思想態度改造運動；要把一個穿西裝革履的知識幹部改造到高高與與坐上簡陋的紡車上去，這決不是黨首領的幾場訓話或組織裏幾張文書命令所能辦到的。必須在上者能夠切實領導，同時下面的人能夠自覺的改變，才可以形成風氣，爲幫助各人的自覺轉變，他們提出了『自我批評』。對於本組織本團體以至個人的缺點，對於思想，態度工作精神，做事方法的錯誤，都可以在自我批評範圍以內。批評的內容包括揭露錯誤，檢討錯誤與糾正錯誤三步的工作。最初，很多人覺得這種批評受不

了，男『同志』因批評而生氣，女「同志」因批評而流淚，據說是常有的事，現在，大家都慣於這種批評的空氣了。另方面還有個人的學習，這兩種整風的方法，使得共產黨能夠以溫和的手段消滅了黨內的腐化危機，而仍然能保存它的幹部。用懇切殷勤的態度幫助幹部改造錯誤思想，以代替嚴厲的處分懲戒，這不能不算是共產黨愛護幹部的一種表現。而我們也就可以知道，它的鐵的紀律，也不是專靠懲戒或處罰來維持的。試想，假如沒有整風，說不定就得實行流血的清黨，那又是何等的代價！整風的作用，從這一點想想，也就可以明白了。

關於新民主主義

一直到現在我還沒有介紹過延安人所奉爲經典的「新民主主義」，現在，當我們走馬看花地參觀了邊區各方面生活之後，不妨聽聽「新民主主義」說的是些什麼？

一，新民主主義要求建立一個除了漢奸賣國賊以外的一切階層的互相聯盟的國家與政府。但是，這個聯盟關係，並不是平均的，它是以工農兵爲主，小資產階級爲副的聯合專政，或者更嚴格的說，是「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依我個人了解，新民主義的國體觀念是富有彈性的，例如，抗日時期，它只排除漢奸賣國賊，而到了客觀情勢許可的時候它便不妨淘汰了地主，再次而至小資產階級；到了連農民也被鑑定爲反革命的時候，那就是工人專政的時候了。主要的一點是依着客觀情勢，確定某階級是「革命」的！不革命的，還是反革命的，而伸縮聯盟的範圍。

二，新民主主義要求一個「民主集中制」的政府組織形式。這是民主而又集中的。用毛先生的話，「我們所要求的政府必須是能夠眞正代表民意的政府，這個政府一定要有全中國廣大人民羣衆的支持和擁護，人民一定要能夠自由地支持政府亦有一切機會去

影響政府的政策，這是民主的意義。另一面行政權力的集中化是必要的，當人民要求的政策經過民意機關而交付於自己選舉的政府的時候，即由政府去執行」。這就是「集中制的意義」。至於從民主轉化到集中的一個關鍵是什麼呢？大概就是多數與少數的對比，換一句話說，少數人應當服從多數人的意見，多數意見一成為政策，政府就有全權使其實現。

三，新民主主義的經濟綱領，也就是「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它將採取某種必要的方法沒收大地主的土地。分配給無地及少地的農民，而仍保有私產制度；它除了將大銀行，大工業，大商業收歸國營之外，並不禁止資本主義生產之發展。

四，新民主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分別在乎：「新民主主義是共產黨的現在的綱領或最低綱領；而將來的社會主義是共產黨的將來綱領或最高綱領」。新民主主義與三民主義的關係，是：新民主主義的綱領，和孫中山先生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所重新解釋的三民主義是一致的，新民主主義者願為「聯俄容共扶助農工」的三民主義而奮鬥。

從新民主主義轉變到社會主義的過程與方式、共產黨還沒有預言，私人談話是有的，但不能作為正式的討論。

共產黨在邊區的地位是怎樣？一般延安人的答覆大都否認「專政」而承認「領導」，猶之乎史達林否認共產黨在蘇聯專政而承認領導一樣，在我們看來，專政與領導，只不過程度的差別：在他們看來，領導不就等於專政。他們認為邊區政治是「共產黨領導的各革命階級的專政」。

以上是新民主主義之輪廓，至於新民主主義目前在邊區的具體內容，則包括在它的「十大政策」之內，那就是：一，對敵鬥爭；二，精兵簡政；三，統一領導；四，擁政愛民；五，發展生產；六，整頓三風；七，審查幹部；八，時事教育；九，三三制；十，減租減息。

新民主主義是毛澤東先生的著作，我們要記住，這是在二十九年出現的書，是在抗戰以後，共產黨宣言共赴國難以後的作品。所以可充分的代表共產黨現階段的政略作用。我們最好的態度，是將「新民主主義」看作是共產黨目前的「政策」或「政略」，而不要相信這就是共產黨的「主義」。主義是有永久性的，它代表一種深遠的理想，而新民主主義則不過是共產黨在未能實行共產主義時的某一階段的政策。因此我以為假如把毛先生的新民主主義改作新民主政策，那一定可以避免了許多誤會，有如「既然有共產主義，為什麼又有新民主主義」？「一個黨為什麼有兩個主義？」這一類的疑問。

說到「新民主」與我們所習見的舊民主的不同，重要之點在乎國體觀念。我們的民主觀念是以整個的國民爲主體的，不分階層與宗派。新民主主義摒棄了「國民」兩字，而正式以階級爲主體，因此有「什麼階級和什麼階級的聯合專政」等等的名詞。

以「舊」民主的眼光來看延安的「新民主」而判斷其民主程度，我以爲：在社會民主化方面，延安人的確有了一些成就，至少農工兵的自尊心是提高了，肉體勞動是成了風氣了，兩性平等也確定了，幹部不復有擺官架子的機會了，在吸引民衆參加公共生活一事上，延安人從老百姓所最關心切己的生產運動出發，教會了他們開會，討論與組織。但是，狹義的政治方面的民主，則尚須保留評判。獨家經營的解放日報，惟一存在的共產黨，行政官兼理的司法，各黨派沒有競爭機會的選舉，還從舊民主的標準看來，都還是缺憾。

「新民主」統治的方式，從一方面看，是黨的領導，另方面看，是民衆的參加政治生活：爲什麼能夠調和這兩個相反的傾向呢？就因爲共產黨知道羣衆的力量，能爭取羣衆，迎合羣衆的信賴而後加以控制，民衆就不會有不自由的感覺，迎合羣衆的意見而後加以控制，民衆反覺得自己是「民主」的了。客觀的專政而不損害民衆的主觀的「民主」感覺，就因爲共產黨處處站在羣衆觀點之故。

交際處生活

最後說一說我們中國記者團在延安所過的日子。

交際處的生活是值得回憶的，最初一星期，我們彷彿有點神經過敏，循規蹈矩，不敢放肆，到了後來，我們的團員甚至扭起秧歌來了。

外國記者是分開住的，我們中國記者佔有高一層的一排房子和一片空地，經常有兩位勤務招呼我們，每一間住兩位記者，兩張桌子，很精緻而且很新，似乎專爲我們陳設的。

白天都是參觀，雨天和星期日休息，所謂休息，不外是說玩笑，總領隊謝保樵先生是聊天的能手，能夠一氣打十幾個『哈哈』，一到晚上，至少有五六位記者，擠在他房間裏。副領隊鄧友德先生則是整天伏在案頭辦事的，難得擺龍門陣的機會。

每晨起來，頭一件事是享受那一頓豐盛的早餐。鷄蛋牛油麵包都是用大盤盛在桌上，任你吃多少，此外還有饅頭，紅棗小米稀飯。中餐晚餐，是四菜一湯，平常吃饅頭，大米飯少見，要吃酒也有預備。只要你吩咐好了。

捲煙充分供給，但是煙質不好，茶和水全不合我們的口味，至於茶食，可以到市場買，全都是豆粉做的東西，甜而澀口，可以吃得飽，却不能做茶點。

除了正式的參觀拜訪之外，我們自己的採訪的生活，可以說很少。我們的語言和重慶式的「奇裝異服」，妨礙了我們與陝北民衆之接近。有一次，大約是「七七」紀念日，我跟着一隊老百姓的秧歌隊，想看一看他們扭的唱的是什麼，一直跟了一里多路，他們還是走着走着，不停下來表演。但是當我放棄了這願望，回頭走的時候，不久，他就在那邊扭起來了。

空下的時候，我們的消遣只有幾種，溜新市場，到會客室去聽廣播音樂，再不然就是和自己人說笑，或乾脆睡覺。

交際處的朋友，整天陪我們參觀，休息的時候，我們大概都不願再攪擾他們了，但也有例外。有一次聽說G先生有重慶帶來的半聽咖啡，我和一位同伴，黑夜裏闖去「共產」，「共」了兩次，就把它「共」光了。

主人方面，顯然是努力想使我們過得愉快，每天配給我們每人一份解放日報，一雙和僧帽牌差不多亮的洋燭，捲煙洋火，隨意取用，參考資料，可以要求交際處代索，最後，還送我們每人一大包書。

自始至終，代表十八方面和記者團周旋的，是周恩來先生。他是常常到重慶的，對我們重慶人的感情思想有相當的理解；和他談話，也比較的隨便。說起來慚愧，在延安一個月我竟忘記了打聽他正式的官銜，我只覺得在對外關係上，他是僅次於毛先生的發言人。延安巨頭中，輪流約我們記者團個別談話的，也只有他。我們的同伴擬他是共產黨的外交部長，大概是不錯的：頎長的身材，白皙的皮膚，加上威爾基在「天下一家」中提到過的「濃黑眉毛和圓圓的眼睛」，使人看去非常年輕，是生成的外交官儀表。

周先生是為延安方面而加強團結而奔走的人，對於這次記者團感到特別的興趣，他誠懇的希望我們不是最後一批訪問延安的人，直到我們臨走前夕，他還到我們的宿舍周旋到深夜。

另一位記者團的熟人是葉劍英先生。他代表十八集團軍的主人地位，在軍事問題上，他又是共產黨軍隊的惟一發言人，一次他向我們做一個上午的報告，系統地介紹綜錯複雜的敵後情形。使我們深深地感到他頭腦的清晰與措詞的敏捷。

我們於五月三十一日進邊區，六月九日到延安，不斷的參觀，連續的談話，不知不覺，一個月了。正式的程序終止於七月二日毛先生的談話會。起初我們預備在正式參觀之後，再作若干日的自由活動，可是這時忽然有人提議「回重慶去」。不可遏止的「鄉

愁」，立刻傳染上了大家，雖然延安朋友待我們是那麼親切熱情，也挽不住我們嚮往的歸心。終於向主人方面提出辭行。主人爲了尊重我們的意思，也立刻爲我們準備行程。

在延安的最後一星期，多是雨天，我們就獃在宿舍裏面，一直到了十日天氣轉好，十一日朱德將軍爲我們在交際處設宴餞行，十二日清晨，告別延安。主客間的告別詞是非常簡短而異常誠摯的「再見」。沿途遇着許多老百姓特地爲我們舖路，使我們感到甚深的感謝與慚愧！

從延安到洛川，汽車在田陌坵壠峽谷山頭上行駛了整整一天，黃昏時分，抵交道區，這裏是邊區的邊緣了。車子在那裏停了片刻，四週的草地上散放着七八匹牛羊，甯靜地吃草，西天的一角，玫瑰色的晚霞夾雜着陰晦的浮雲，使太陽顯得異常之紅，異常之大，慢慢的穩重地向地平線上下沉。喚起了我們非常的莊嚴和平的感覺。

寫完了「延安一月」

中國記者團在陝甘寗邊區的居留期間，一共是四十三天，在這短短的時日裏，要說深入研究，普遍參觀，是萬分不夠的：要說調查批評，我們更沒有如此的狂妄；我們自己知道，我們是記者，我們的立場是採訪新聞，我們的動機只在使我們報紙的讀者多知道一些邊區的事實。除此以外我們不會有其他動機，也不能多做一些事，所以當我寫完了「延安一月」，頭一件要請讀者注意的，這一篇稿子始終不過是新聞記事，它只能代表一個新聞記者對邊區的看法，它不是什麼正式的調查書或裁判詞。

爲了我所寫的只是一篇新聞記事，所以「客觀」自然是最要緊的，但如何才算客觀，也頗難說，第一、我是中國的記者，以中國人看中國自己的事情，一個國民的立場是必須遵守的，站在國民的立場，不容許我以超然中立的地位來看邊區，也就是不能不有一個中華民國國民所應有的偏見，在邊區的時候，延安人通常以客人的禮貌待我們，但是有機會，我總要聲明自己不是客人，以國民的資格，參觀自己的國土，能說自己是客人麽？能談得到「客」觀麽？假如談民主，那麽我們才是眞正的主人呢！主人自有主人

的看法，自帶有主人的成見；也自然免不了對我們的僕役有所指指有所讚許，所以在這點上，我只力求其公正，免得做一個糊塗的主人，純粹的客觀，與超然的中立，是事實上難於做到的，而且我也不想這樣做。

再說到寫作的方法，也不可能有百分之百的客觀。事實只是事實，我們參觀者所得的，不過是一些印象，而所謂印象，那就是對方的「印」壓在我腦中之「象」，這裏就夾雜着個人頭腦的好惡愛憎。同樣的材料有各人的觀感，所得的結果，自然沒有一二如因那樣精確無訛。我所能夠告訴讀者的，不過是我所見的延安，只要我不指鹿爲馬，不顛倒黑白，在我就算盡職了；我不能勉強別人必須同意我的看法，也不能爲了別人的喜歡或不喜歡而犧牲自己的觀點。承認他人有和自己一樣的批評判斷的權利，同時也尊重自己的判斷，這是我們民主主義者最忠實的立場。

關於延安那面的情形，我相信自己已盡最大限度的公正報導了一些。我希望這些報告，能夠給讀者描繪出延安的一幅粗糙的輪廓。此外，在報告中，也時常插進一些感想。批評本不是記者分內之事，不過爲解釋事實而發的常識批評，有時也是必要的。我覺得過去我們見到的關於邊區的報導，往往免不了兩極端的溢美與溢惡。一種說邊區什麼都不好，一種說邊區像個神聖的天堂，什麼缺點都沒有。這兩種說法，顯然都太誇張。

事實是，邊區有好的現象，同時也有缺點：而且同一件事，也有好壞兩面的發展。專說它好而不指摘它的缺點，或專說它的壞處而不介紹它的優點，那都是不可以的。站在國民的觀點，我們希望他們的優點能發展而缺點能消滅：為的是邊區到底是我們中國地方，邊區人到底是我們的同胞，不能說他們的榮辱休咎與我們無干。自然，邊區有許多事情是特殊的，邊區人的思想感情也有和我們差異之處：但作為一個忠實的新聞記者，我覺得一方面須固執自己見解而同時也得體諒他們的環境。就以他們的生產運動來說，從技術工具上看，絕對是不夠資格的，但在那一種環境裏，我們不能不承認他們的工作是動人的。邊區目前「領導」在共產黨的幹部手裏，這是無可疑的，然而這不妨礙我們承認它能組織羣衆，尊重羣衆的感情，提高低層民衆的地位，給羣衆以平等的感覺。在這些事情上，我們必須體諒他們的情形，而同時固執自己的見解，才可以有冷靜公道的判斷。從另一方面說，也不能因為他們目前的成就，即立刻承認他們是完全成功。據我看來，邊區究竟還是小範圍的試驗，同時過去幾年的邊區都在閉關狀態之中，目前即有所成功，在公平競爭的場合，是否能有永久的保證，也還是問題。最公平的態度，是承認他們在中央政府領導之下，作為一個新社會的試驗區。隨時檢討他們的成果，作為施政者的參考。沒有比較，也就沒有警惕，邊區在多處是可以刺激那些自我陶醉的人的。

由於平時的閉關狀態，邊區人的思想感情和我們的確有相當距離，無知製成偏見，偏見的結果是重重的誤會，延安人對重慶人的看法，和我們過去看延安往往是同樣的生疏，因此我們不僅希望我們重慶人要多多研究延安生活，也希望延安人這樣做。我以為一個政黨，爲自己的政策辯護，批評政府的得失，這都是可以的，但是仇恨憎惡的種子，却不可以再向民間播種。自然，我們還不能忘記，增加了解與信任的最好辦法，是解除這種閉關狀態，就這一點說，我雖然自覺能力薄弱，觀察不週，但是記者個這一次的訪問延安却是成功的，因爲至少，我們是第一批看到延安的記者。假如拋磚可以引玉，我們就足夠自慰了。